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洛林 厉以宁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克崱 朱 民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国宝 张晓强
张卓元 陈 元 林毅夫 周文重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楼继伟 聂振邦 樊 纲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牛铁航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陈永杰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郑新立

副主编：陈永杰 牛铁航 王晓红

• 高层论坛 •

- 围绕发展方式转变凝聚改革共识 郑新立 (004)
- 城镇化进程中要处理好两大问题 陈锡文 (011)
-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以初次分配为重点 厉以宁 (014)

• 宏观经济 •

- 我国经济增长的中期趋势和应对策略 王一鸣 (017)
- 中国农村贫困的财政根源探究 闫坤 刘新波 (025)

• 世界经济 •

- 2012年度亚洲竞争力评估结果及其分析 课题组 (037)

• 国际投资 •

- 服务全球化趋势及中国选择 姚战琪 夏杰长 (049)

• 国际贸易 •

- 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发展现状及趋势 王晓红 李珏 王海 (060)

• 区域经济 •

- 首都经济圈规划与京津冀经济一体化 肖金成 刘保奎 (072)

• 产业发展 •

应对国际新挑战 完善我国能源战略 李晓西 (082)

• 调研报告 •

“三江并流”及相邻地区：现状、问题和对策 刘学敏 宋 敏 (092)

• 案例研究 •

华为：开放式创新打造世界一流高科技型跨国公司 王子先 (102)

• 全球化人物 •

2013年全球和中国经济展望
——专访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屈宏斌
本刊记者 牛铁航 (113)

• 智库言论 •

中国信息化发展的机遇 杨学山 (118)
保障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五个思路切换 贺铿 (119)
我国对外开放的四大机遇和四大举措 马秀红 (120)
对金融业的作用及利率市场化的认识 杨凯生 (121)
中国经济最后一次软着陆? 史蒂文·罗奇 (122)
人民币国际化应把握住伦敦机会 中国安邦集团研究总部 (123)

• 英文提要 (ABSTRACTS) • (124)

主管/主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运营单位：国经环球控股有限公司 (总经理：耿宏鑫)
出版：《全球化》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西安门大街22号2号楼503室，邮编：100017；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大街甲31号1号楼506室，邮编：100034)
投稿邮箱：qqh@cciee.org.cn 联系电话：010-66169330

围绕发展方式转变凝聚改革共识

郑新立

摘要：未来十年我国要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应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营改增”税制改革、科技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五个方面凝聚改革共识。

关键词：发展方式转变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营改增”税制改革 城乡一体化 金融体制改革

作者简介：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把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提出，到2020年使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各翻一番。去年，我国人均GDP已达6086美元。如果以2012年十八大召开为基期，经过10年努力，到2022年党的二十大召开时，实现人均GDP翻一番，届时人均GDP即可达到1.2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因此，未来10年，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区间，登上高收入台阶的10年。我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对世界经济格局将产生重大影响，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将具有划时代意义。

未来10年我国要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克服一系列重大难题，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改革来推动。当前各方面改革的呼声很高，但如何深化改革，改革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意见不一。围绕发展方式转变凝聚改革共识，从而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针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

制，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敢破敢立，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实践中，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检验改革是否正确的标准。同样，今后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也在于能否继续破除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建立起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

围绕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当前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凝聚改革共识：

一、围绕经济增长从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产能过剩是当前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矛盾。我国粗钢生产能力已达9亿吨，产量7亿多吨，占全球的近一半。水泥、铝材、平板玻璃的产能也占全球一半左右。造船能力超过全球市场需求的总和。发电设备、汽车制造能力超过全球的30%。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的产能占全球产能的50%左右。风电设备制造能力超过国内需求一倍以上。产能过剩是长期以来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重投资、轻消费的结果。面对全球经济危机造成发达国家市场疲软、进口需求下降的冲击，我国出口增长受阻，使产能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投资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衡，已成为当前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中最为扭曲的关系。理顺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提高居民消费率，降低投资率，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

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从认识上入手。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认识跟不上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工作的理念、政策和习惯自觉不自觉地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短缺”，而市场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过剩”。计划经济供给短缺、需求过剩的主要原因是投资和生产的计划权限集中在政府手中，企业缺乏生产积极性，产品匮乏，无法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受利润的驱使，投资具有无限扩张的冲动，而居民收入的增长即购买力的增长，却受到掌握分配权的市场主体的制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透彻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能力无限扩张与广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必然带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即生产过剩的危机。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推行福利政策，加强经济预测和宏观调控，使生产过剩的矛盾得以缓解。当前它们又走向了反面，过重的社会保障负担使政府财力难以承受，许多国家陷入了财政债务危机。我国从1993年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距今刚刚20年时间，对市场经济规律尚缺乏深刻认识，在经济指导方针和调控政策上，

往往把解决短缺问题作为主要矛盾，不顾市场需求盲目扩大投资，而对如何解决好分配问题、扩大居民的购买力重视不够。虽然国家也采取了许多措施限制低水平重复建设，但不足以抑制追求盈利的投资冲动。30多年来，我国投资率不断上升，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以致造成目前产能严重过剩的局面。改革开放之初的“六五”时期，由于我们纠正了前30年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大幅度降低了投资率，提高了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年均达52%，使这一时期成为居民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之后，居民消费率一路下滑，已降低到近几年的34%，下降了18个百分点。同期投资率则由25%上升到49%，甚至超过最终消费率。投资与消费关系的扭曲已达到难以维持下去的程度。党的十七大曾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把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任务，但5年过去了，这种扭曲比例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严重了。十八大重提这一问题，特别是提出要建立释放消费需求潜力的长效机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高度重视。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提高居民消费率，使广大人民从经济发展中更多受益，是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最好的贯彻落实。不仅要扩大居民个人消费，包括改善住、行条件，增加教育、医疗、文化、旅游、休闲等方面的消费，而且要扩大公共服务消费，尽快改变公共服务供不应求的状况，解决城市停车难、进养老院难和入幼儿园难的问题。要把为人民提供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作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重要内容。通过授予特许经营权、营造市场机制等方式，引导社会资金更多地投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改善消费环境。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步形成橄榄型收入结构，是扩大消费的前提条件。国务院几个部门最近联合下发了关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文件。落实好文件精神，切实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成为加快经济增长由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的关键所在。

二、围绕加快第三次产业发展，

推进“营改增”税制改革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国民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它制约着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并加大了就业的压力。2011年，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

为35%，远远低于全球平均62%的水平，比发展中国家平均50%的水平仍低15个百分点。如果能用5-10年的时间，使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可新增就业岗位1.1亿个，就业压力将大大缓解。

造成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理论根源，是来自第三产业不创造价值的传统经济理论。在计划经济时代，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对我们影响很深。这就是只有物质生产部门才创造财富，所谓物质生产部门，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业。除此之外的服务业是不创造价值的。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只统计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不统计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活动。虽然改革以来这种陈旧的脱离实际的理论已经被打破，对统计制度也进行了改革，承认服务业也创造价值，但是其影响仍然存在。在发展规划和政策中，对发展第二产业给予鼓励支持，但对第三产业实行高税率、高地价，甚至用水、用电价格也要比工业贵。对第三产业实行的营业税的税负比第二产业的增值税平均重1/3左右。第三产业经营者大部分是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由于税收的起征点过低，加重了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的负担，抑制了群众的创业热情。

根据去年进行“营改增”试点城市的经验，税负降低之后，第三产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特别是物流、研发等服务业领域，创业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希望国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在第三产业的各个领域和全国范围内推广“营改增”政策。同时，要进一步提高对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的税收起征点，以放水养鱼、培植财源。在香港，占企业总数70%的小微企业是免税的，从而营造了创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值得借鉴。

三、围绕加快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改革科技、教育管理体制

我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物质资源消耗的增加来实现的，这不仅给能源资源供给带来很大压力，而且生态环境已难以承受。最近在我国东中部地区频繁出现的大面积雾霾，就是这种粗放的生产方式长期累积的结果。改变这种局面要靠产业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由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转变，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变。实现这两个转变，必须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带动产业升级。同时，要培养创新型人才。这就需要深化科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几年来，各级政府和企业、科研机构、大学都加大了对科研开发的投入，技术成果开始成批涌现。2011年，我国在国内申请的技术专利的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但是发明专利较少，质量有待提高。2010年和2011年，我国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与美国相比，分别为1:6和1:3.6，照此速度发展下去，到“十二五”末，有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特别是出现了一批创新型企业 and 专利申请大户，在技术上已经进入世界前列。2009年，华为公司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在全球企业中居第一位。2011年，中兴公司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居世界第一位。民营企业申请专利数量占全部专利申请量的67%，已经成为自主创新的主力军。国有企业和大学拥有巨大的创新潜力，仍有待发挥。去年，国资委制定了《关于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的若干规定》，第一次提出要把企业创造的技术成果的价值列入资产保值增值考核的范围之内，这是管理理念上的一个大的进步。马克思早就预见，随着技术进步，在生产资料技术构成中，技术的比重将不断提高。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中，只考核有形资产，不考核无形资产，充分证明了管理理念上的落后。相信这次对国有企业考核指标的改变，对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将起到重要作用。我们期待着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成果大批涌现，在自主创新中起到主力军的作用。

大学集中了大批科技创新人才特别是年轻人才，应当成为科技创新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地。但是，由于受几千年封建科举制度的影响，高分低能、知识老化、循规蹈矩、不求创新，成为我国大学与发达国家大学的主要差距。在2011年全球大学专利申请量的排名中，我国没有一所大学能进入前50名，而美国则有30所大学入围。由此可见一斑，我国的大学同美国的大学相比，在创新能力方面有多大差距！

改革教育体制，实行简政放权、优胜劣汰，是提高大学科技创新能力、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惟一选择。改革以来，我们在工业领域能够出现一批创新型企业，关键在于对国有企业实行了简政放权、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当前，对大学实行这种机制的条件也已经成熟。主要是随着大学招生人数的不断增加，预计到“十二五”末，大学招生将形成买方市场，即由过去的大学选学生，变为学生选大学。好的学校能吸引到优质生源，差的学校可能会因招不到学生而关门，或转为技工学校。随着大学自主招生规模的扩大，学校管理的自主权也将不断扩大，围绕培养创新型人才，各类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方式将会创造出来。在美国，评价大学办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学校的专业、院系对

相关产业发展的影响度。如斯坦福大学的电子系，就是硅谷的技术来源地，他的科研成果影响和带动了全球电子信息业的发展。我国的一些大学，连对世界先进技术的跟踪都不行，更谈不上什么创新了。有一个工业类大学，请10多年前的一个毕业生回校讲课。这位校友翻开一本教科书，发现有30多个概念已经落后于生产实践，而教授们仍在向学生灌输。如不深化教育体制改革，难以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只有站在全球科技进步的最前沿，成为研究型大学，并以科研带动教学，才能培育出创新型人才。也只有立足于国内培养创新型人才，才能建成创新型国家，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四、围绕缩小城乡差距， 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

未来10年，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区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取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包括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根据国际经验，凡是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一般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城市化水平达到70%左右；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赶上第二、三产业的水平；三是农民人均收入赶上城镇居民的收入。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只有50%多一点，农民工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农业劳动生产率只及第二、三产业的28%；农民人均收入只及城镇居民的31%。未来十年，我国如果没有城乡发展差距的缩小，甚至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是不可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三农问题有可能拖住国家现代化的后腿。

当前，解决好三农问题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一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出路。到处都存在招工难，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因为那里的工人月工资只有我国的1/4左右。如果不抓紧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创造好的政策环境，等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全部转移完以后再考虑这一问题，我们将失去历史的机遇。二是社会资金大量富余，正急于寻找投资出路。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只能靠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如果拒绝社会资金进入，单靠农民自身的积累，农业现代化将遥遥无期。三是市场对优质绿色农产品需求旺盛。靠数以亿计以农户为单位的小生产，不可能生产出消费者信得过的品牌产品。解决农产品价格波动问题，关键在于搞好产需衔接。而小生产者不可能准确预测市场需求，只能盲目跟着市场价格跑，周期性价格波动也就难以避免。建立社会化、现代化大农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社会进步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目前的

条件已经成熟。

安徽省小岗村今年春节前将几千亩地整理好，准备节后招标转让经营权。其中，赞成把土地经营权转包出去的农户，包括了30多年前主张搞家庭承包按手印的人。他们算过账，承包地让别人种，比自己种收入更高，而且自己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后，从事多种经营或出去打工，又能挣一笔可观的收入。政府有关部门应顺应这种趋势，积极引导，保证土地在流转中用途不改变，以确保粮食安全。

五、围绕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十八大提出，要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内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配置资源主要是资金的配置，因为资金配置到哪里，人力、设备、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就跟着流到哪里。资源配置的优化关键在于资金配置的优化。

我国金融资本的规模巨大。银行M2已达90多万亿元，金融资产达120多万亿元。主要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资金流动性差，周转率低，需要资金的企业难以获得资金支持。根据调研，2011年上半年，以小企业为主体的温州市，企业平均获得贷款的利率为25%。这么高的利率，企业是难以承受的。

去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了今后金融体制改革的六项任务：包括放宽准入、建立地方性监管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和贷款担保制度、完善以用汇为主的外汇管理体制、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等。但是，由于至今尚未出台一个综合配套的改革文件，大家只能等待。又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利率市场化已率先突破。合理的改革顺序应当是把市场准入放在最前面，其次是完善监管和风险担保体系，第三步才是利率市场化。因为前两步改革可形成充分竞争格局，并规避市场风险，从而为利率市场化创造前提条件。现在利率市场化已自发突破，前两步改革尚未推出，必然出现垄断利益、寻租行为和潜在风险。制定一个金融体制改革的周密配套方案，并有序推出，已成为当务之急。

责任编辑：刘英奎

城镇化进程中要处理好两大问题*

陈锡文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城镇化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事实上，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重大成就。按照常住人口计算，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与2011年相比提高了1.3个百分点，增加城镇常住人口2103万。这些数字也表明，从内在的增长动力来看，中国的城镇化还有非常大的余地和潜力。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也有许多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我重点讲两个与“三农”有关的问题，希望能够引起政府和广大社会公众的关注和重视。

一、必须重视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的供求关系问题

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在过去的研究中，关于人口城镇化对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影响，我们关注的并不够。这些年来，虽然一方面粮食产量快速增长，并实现了“九连增”——粮食总产量从2003年的4.31亿吨增加到了2012年的5.9亿吨，9年之内增加了1.59亿吨。这个增幅不能算不高，但从实际情况看，仍然明显赶不上社会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速度。因此，这些年农产品的进口数量在不断增加。

2012年中国粮食进口首次突破7000万吨，达到了7233万吨，其中谷物和谷物粉进口1398万吨，与上年同比增加了156.7%；大豆进口5838万吨，同比增加了11.3%。此外，2012年进口食用植物油845万吨，与上年同比增加了28.7%。以粮油为主的食品进口快速

* 本文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财办副主任陈锡文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年会（2012-2013）”上的演讲，略有删节。

增长表明，现阶段如果没有农业的更快增长，不要说支撑城镇化，就算是保持社会的正常运行都会面临较大的困难。

为什么在城镇化阶段，人们对食品需求会快速增长呢？第一，人口在继续增长；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消费水平提高了，食品需求会有明显的增长。但更重要的是，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之后，生活方式的转变带来了饮食结构的巨大变化，对农产品需求也有巨大的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数据，每一个城镇居民平均一年消费的农产品，除了粮食低于农民之外（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粮食80公斤，农民120公斤），其他农产品消费都明显高于农民。比如，城里人与农民相比，蔬菜要多吃28%，植物油多20%，猪牛羊肉多51%，家禽多136%，禽蛋多87%，水产品多将近两倍。

迄今为止，已经有两亿多农民进入了城镇，过去我们对这块需求增长重视不够，以后应该认真加以研究。但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城镇化不发生停滞和逆转，就一定要有比较稳定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稳定的供给。所以，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供给。

当然，并不是说都要追求粮食自给。2012年中国粮食总产量5.9亿吨，但进口量是7233万吨，进口量占国内需求量的12%左右，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必须处理好农民的城镇化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用的城镇化数字都是常住人口的城镇化，但实际上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现在还不到35%。也就是说，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之间大约有16、17个百分点的差距。也就是说，有两亿人进了城，但并没有成为城里人，这是未来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

如果农民不能进城，农业难以现代化，城市也难以持续稳定发展。农民进城就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我认为中国这方面解决得比较好的是城镇提供的非农就业机会，正是由于有持续增长的非农就业机会，才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农民进城。但进了城之后，怎么样才能使他们变成真正的城里人，最起码应该解决好三个问题：

一是农民工进城之后的住房问题。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2011年进城农民工的住房，52%是依靠用人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这不能称之为家庭住房；47%是农民租住的城

中村、城乡结合部的农民住房。在城镇拥有自有住房的农民不到10%，大概是7%左右。而全部农民工，在其所在地加入了住房公积金的比重还不到3%。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要解决现在2亿多、将来还会增长的农民工住房问题，对于中国的城镇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需求。

二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进城之后，如果没有和城镇职工、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那他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目前，这方面的差距非常大。根据有关方面的调查，2011年全国农民工加入了城镇养老保险的占16.4%，加入了城镇医疗保险的占18.6%，加入了工伤保险的占27%，加入了失业保险的占9.4%，平均水平不到20%。到底一个农民工全部加入城镇的各项社会保障需要多少钱呢？有关部门对2010年武汉市进行调查的结果是，如果一个企业用了一个农民工，按照当地政府的规定，该保的都保，企业平均每个月要给每个职工交516元，职工自己每月交166元，也就一个月要交682元钱，一年要交8184元钱。如果全国进城农民按2亿-3亿人计算，投保、参保的资金缺口巨大。如果这件事情不抓紧做，农民工真正的城镇化会越来越困难。

三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进城农民工子女随迁之后，教育问题迫在眉睫，必须解决。目前情况下，城镇接受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中，有相当部分来自农村。很多大城市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教育资源不够，要重新配置。对于农村来说，进城随迁子女仅仅出来10%，今后还有多少农村孩子要进城随迁？所以，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迫在眉睫。而且，解决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就学问题，接着就必须解决高中怎么办、大学怎么办的问题，一连串的问题都在等着。所以，我们今后推进城镇化，一定要按照十八大提出的，注重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使城镇化更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而不要过多地探究城镇化率的提高，因为城镇化率的口径各国之间很不相同，你说自己提高了，但实际和国际上无法比较。

责任编辑：刘英奎

· 高层论坛 ·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以初次分配 为重点*

厉以宁

对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以初次分配作为重点；另一种意见认为，应以二次分配作为重点。我的意见是，应以初次分配为重点，二次分配也重要，但首先是初次分配。

一、初次分配不公平的根源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分配。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分配。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市场是不完善的，原因有很多。

一是，历史原因，包括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各地区受到不同传统文化的影响，各地区习惯势力大小不同等等。二是，在中国经济生活中，行业垄断因素严重阻碍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三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初次分配的工资级差、工资标准、工资的地区差别等等，都做了规定，到现在这一规定还依然保留了相当大的部分。四是，劳动力市场上买方、卖方，也就是雇主和受雇者，力量极不对称，买方强势，卖方弱势，这种状况依然存在。五是，如果从劳动力市场结构来分析，可以大体上分成高级劳工市场、低级劳工市场。在高级劳工市场上，工资高、福利多、升迁容易，

* 本文为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年会（2012-2013）”上的演讲，略有删节。

被称为“好职业”；在低级劳工市场上，情况恰恰相反，工资低、福利少，几乎没有升迁的机会，被称为“坏职业”。这是二元市场劳动力结构，一般的工人如果要进入市场，只能进低级劳工市场，就形成了不公平的待遇。因此，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市场基础性条件下的均衡工资率。

农民同样处于这种严重的非均衡状态。一是，农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因为虽然农民有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但没有产权，土地不能用于抵押、转让，土地的流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外因素的干扰，农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土地的寻租行为一直没有中断，而农民恰恰是土地寻租行为的受害者。二是，农民工可以在城镇和企业中工作，但他们的身份和市民不同，他们更是弱势群体。雇方和被雇方双方地位的不对称性，在农民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三是，农民养殖了牲畜、家禽，种植了农产品，但他们在销售中处于弱势，和他们打交道的大公司显然处于强势。即使农民组成了专业合作社，但是和大型企业相比，同样处于弱势。四是，二元劳工市场的存在，使得农民进城打工、求职一直处于受歧视地位，而且农民社会资本几乎为零，在城市里基本上没有可以拉他一把、扶他一把的亲戚朋友。

二、重点改革初次分配的建议

上述表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所形成的初次分配存在不公平。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初次分配上，具体提出六点建议：

第一，尽快健全完善市场，早日形成生产要素的供方、需求方以及商品生产者之间公平竞争的环境。打破行业垄断，消除所有制歧视，对那些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初次分配的规律、规则，包括工资标准、工资级差等等，要认真审查，该取消的取消，该修改的修改，以贯彻市场调节作为初次分配的基础条件原则。

第二，让农民成为清晰的产权主体、明确的市场主体。让土地的流转在各个产权主体、市场主体之间有序地进行，制止土地使用中的寻租行为，保证农民有财产性收入。最近，我带领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浙江杭嘉湖地区调查，那里的土地确权工作做的比较好，农民有多种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在浙江全省，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之比大概是3：1，或者是3点几比1，而在杭嘉湖地区，这一比例是1.9：1。差距缩小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这是改善初次分配的重要条件。

第三，在劳动力市场上，应该让买方和卖方的地位趋于平等，消除不对称行为，工会应该管起来，工会的管制促进初次分配趋于完善。

第四，在二元劳工市场存在的情况下，应该促使低级劳工市场向高级劳工市场转变，提高职工的受教育程度，使他们有更好的机会能够升迁。

第五，要鼓励农民和低收入家庭的成员自行创业，创办小微企业，这样可以使初次分配的情况得到好转。

第六，当前，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要让有能力上学的人和家庭困难、没有机会上学的人得到同等教育机会。最近，我带领政协调研组在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调查，该旗把边远山区牧民家庭的孩子全部集中到城市住校，进行义务教育，称作教育特区。这个旗并不富裕，但学校的宿舍、食堂、教室都非常好。这就提高了初次分配的条件，因为小孩子能够上学了，将来进中专或高等技术学院学习，完全可以增加自己提高收入的能力。我在这里谈一个理论问题，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中出现了一个利润共享的原则。该理论认为，所有的财富是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共同创造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利润全部归物质资本投资所有，人力资本投入只能够在工资成本中取得报酬的一部分？这不合理！共享是什么意思呢？物质资本投入者和人力资本投入者共同分享利润，利润中有一部分也应该分给一般的职工，尽管分的数量不多，但毕竟是改善初次分配的条件之一。

二次分配怎么样呢？二次分配也很重要，但在中国现阶段，二次分配的重点应该放在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上。如果实现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情况就会好转，因为中国现在的问题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是初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充。而我们中国的一些情况是，初次分配已不公平，二次分配却在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据我们调查，城市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初次分配为2.9:1，二次分配为3.3:1。我们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是3.3:1？因为城乡社会保障待遇是不一样的，教育资源、文化资源、卫生资源的分配都是城市占优势。所以，如果采取利润共享分配方式，不但初次分配不公平可以改善，二次分配的差距也能够缩小。

责任编辑：刘英奎

我国经济增长的中期趋势 和应对策略

王一鸣

摘要：从中期看，我国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仍有许多有利条件，但受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速将趋于回落；经济增长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对中期稳增长提出了新的挑战；应对策略，是要将经济工作的中心转向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在继续完善需求管理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强供给管理，强化市场功能，促进平等竞争，着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关键词：经济增长 阶段性变化 中期趋势 稳增长

作者简介：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在我国经济增长趋势分析中，对“中期”还缺乏明确的时间界定。通常情况下，“短期”主要是指季度或年度，“中长期”主要是指5年或更长的时间段。从这个时间尺度上把握，“中期”大致可以界定为3年。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3年，“中期”大致覆盖“十二五”时期的后3年。今后3年，我国经济增长正处在阶段性变化之中，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增大。分析这个阶段的经济走势，研究应对策略，不仅有利于增强短期“稳增长”政策的针对性，而且对于更好地把握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有效应对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本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态势

本世纪以来，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扩大开放效应和深化改革的推动下，我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上升期。经济增速由2001年的8.3%上升到2007年的14.2%。但随着经济增速不断加快，各种矛盾也逐步凸显出来，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的“三过”现象，通胀压力也明显增大。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我国在2005年将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财政政策。2007年年中又将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200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

控的首要任务，将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随着宏观调控效应逐步显现，在2007年2季度经济增速达到本世纪以来季度增长率最高点14.8%后，2007年3季度以后，季度经济增长率就逐季放缓，这既有利于缓解“三过”问题，也是宏观调控期望达到的目标。到2008年上半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向金融危机演变，外需拉动作用逐步减弱，加之国内接连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和经济的周期性回调，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增大。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等美国五大投行倒闭为标志，国际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性危机，并从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迅速扩散，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与此同时，我国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出口订单大幅回落，加剧了经济下滑态势，2009年1季度经济增速回落到6.6%。从2007年2季度到2009年1季度，8个季度经济增速下降了8.2个百分点。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底我国出台了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以遏制经济增速下滑态势，2009年2季度开始，经济增速强劲反弹，但随着一揽子计划的能量逐步释放，2010年1季度后经济增速又开始放缓，从2010年1季度的11.9%逐步放缓至2012年3季度的7.4%，11个季度放缓4.5个百分点。在2012年5月起陆续采取“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后，当年第4季度，经济增长企稳回升的态势基本确立。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7.8%，比2011年下降1.5个百分点，为199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

总体上看，2007年后经济增长态势的变化大体呈现为不完全对称的“W”型，经历了两次放缓和两次回升。第一次放缓要早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随后在一揽子计划作用下经济增长强劲回升；第二次放缓比第一次放缓要更加温和，到2012年4季度重新确立回升态势。从内在动因看，不同于以往的经济波动主要是受周期性调整和短期需求变化的影响，这一轮经济增长态势变化已隐含着结构性因素和潜在增长率变化的作用。特别是第二轮放缓，虽然有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部需求收缩的背景，但更重要的是原来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减弱，潜在增长水平已趋于下降。

2012年第4季度经济增长7.9%，经济增长确立回升态势，但这并不表明经济又将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而是相对温和的回升。从目前多数机构的预测看，2013年我国经济增长增速略高于8%，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速，很可能是围绕8%左右的潜在增长水平上下波动。我国经济正在由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向8%左右的“新常态”。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中期趋势

从中期看，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仍有许多有利条件，但受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速将趋于回落。

（一）从需求面看中期经济增长趋势

从需求方面看，今后3年，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需求减弱，投资增速将有所放缓；居民收入增长和社会保障水平提高，消费增长将保持平稳；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外需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所减弱。

1. 投资需求将有所放缓。从中期看，经过“十一五”时期特别是2008年实施一揽子计划以来，东部地区的铁路、公路、港口和机场等基础设施规模较大，中西部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短缺程度明显，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已有所减弱。金融危机后外需市场大幅收缩，制造业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继续扩大产能的空间缩小，企业的投资意愿也将减弱。总体判断，随着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需求减弱，投资增速将有所放缓，大约拉动经济增长4.0~4.5个百分点，比“十一五”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

2. 消费需求将保持平稳。从中期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提高，我国消费需求将保持平稳增长。特别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将进一步释放农业转移人口消费潜力。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1.27%，城镇人口约为6.9亿人，但其中有2.5亿农业转移人口尚未完全市民化。据统计，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5161元，农村居民现金性消费支出4734元，两者的比值是3.2:1。换言之，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将使其平均消费需求扩大3.2倍。总体上看，消费需求将保持平稳，大约拉动经济增长4.0~4.5个百分点，基本保持“十一五”时期的平均水平。

3. 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国际金融危机将引发全球增长方式、供需关系和市场结构深刻调整，世界经济由危机前的快速增长期转入深度调整转型期，短期内难以重现危机前快速增长态势，有可能进入一个相对低速增长期，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明显减弱。从中期看，我国贸易顺差将有所收缩，外贸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0~-0.5个百分点。

（二）从供给面看中期经济增长趋势

从供给方面看，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引发储蓄率、劳动力供需条件等宏观经济变量逆向调整，将导致资本、劳动等基本生产要素供给条件发生较大变化，加之技术进步的贡献短期内难有明显上升，土地和能源供给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加剧，使支撑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各种条件发生结构性变化，从而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产生影响。

1. 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向下调整。2011年我国储蓄率高达51.8%，比1978年提高13.9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42个百分点。今后一个时期，决定储蓄率变化的因素主要是人口抚养比上升和体制政策调整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减少。实证分析表明，储蓄率与人口抚养比呈逆向变化关系，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约下降0.8个百分点。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抚养比提高，储蓄率将趋于下降。与此同时，社会保障覆盖率提高，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居民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预防性储蓄趋于减少。这些变化将促使高储蓄率向下调整，并直接引致投资率下降。

2. “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但随着“80后”、“90后”等独生子女一代进入劳动年龄和他们的父母进入退休年

龄,劳动年龄人口在越过峰值后将出现绝对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12年我国15-59岁(含不满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69.2%,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表明劳动力供需形势将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从近年来农民工中青壮年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看,青壮年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趋势更为明显。

3. 全要素生产率难有明显提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很多,如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体制变革,但对处在高速增长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劳动力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我国第二、第三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通常是第一产业的5~7倍,但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率明显下降,其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已逐步减弱。与此同时,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逐步缩小,技术引进的“外溢效应”也在减弱,而自主研发又受到人力资本和体制条件制约,短期内难有大幅提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明显增大。

4. 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约束持续强化。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明显强化。以能源为例,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煤左右,而事实上2009年就突破了这一目标,2010年达到32.5亿吨标煤左右,比2000年的14.5亿吨标煤翻了一番多。2000-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1.7亿吨,即使今后10年将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控制在1亿吨以下,到2020年也将超过40亿吨标煤,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综上所述,随着储蓄率和投资率向下调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资源约束还将加剧,潜在增长水平将趋于下降。根据最新数据测算,在考虑供给因素和资源环境约束的情况下,今后3年我国的潜在增长水平大约在8%左右,已经难以保持过去30多年年均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

三、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和面临的挑战

如同其他经历过高速增长的国家一样,我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对中期稳增长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 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经济体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高速增长后,势必要出现一个经济减速和调整转型的变化。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到,在高速增长持续二三十年后,多数国家增长速度从第三个10年开始明显下降,到第四个10年,大多数国家则进入了低于4%的增长时期^①。还有的学者对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经济减速进行实证研究。日本、韩国都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的转变过程,日本的拐点大致发生在1969年,韩国大致在

^① 江小涓,2004,《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挑战与战略》,《经济研究》第10期。

1988年。如果以这两个年份为界分别统计日本和韩国前10年和后10年的平均增长率，日本由10.4%下降到6.3%，韩国由10.0%下降到7.6%，分别下降了3.1和2.4个百分点^①。日本在经历1973年的石油危机，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高速增长过程基本终结。

我们利用Conference Board世界经济数据库（前身为麦迪逊数据库）进行大样本统计，对高速增长国家经济减速时的人均GDP区间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5000国际元以下出现经济增长急剧放缓的占14.4%，5000~10000国际元时为40.4%，10000及以上为45.2%。绝大多数经济增长急剧放缓出现在4000~15000国际元之间，约占全部国家的3/4。依据Conference Board数据库，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7371国际元，根据预测，2015年将超过11000国际元。这意味着今后一个时期将是我国经济减速的高概率区间。

经济高速增长国家的增速下降，一些国家表现为突变式下降，另一些国家表现为渐进式下降。从各方面因素看，我国具有更多渐进变化的条件。首先，我国具有一个尚未充分开发、潜力巨大的内需市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空间较大。其次，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大，低成本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国内产业转移而继续保持，各区域在不同产业层次上发挥动态比较优势，使我国经济增速下降表现出更明显的渐进变化特征。第三，城镇化发展潜力巨大。2011年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1.27%，但仍明显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可以继续创造基础设施和住宅等巨大的投资需求，以及农村转移人口和农民工市民化形成的巨大消费需求，并对经济增长形成较强的拉动作用。

（二）中期稳增长面临的主要挑战

我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但也要看到，随着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中期稳增长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1. 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增大。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市场扩张速度明显放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我国在中高端技术领域，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难以与发达国家抗衡；在低端技术领域，由于低成本优势减弱，又面临要素成本更低的新兴经济体追赶竞争，对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提出更加紧迫的要求。

2. 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产能迅猛扩张，在满足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有一部分通过扩大出口实现平衡。随着国际市场扩张速度放慢和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出来，不仅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风电设备、太阳能光伏等新兴行业领域也面临较大的过剩压力，“去产能化”任务十分繁重，继续依靠生产能力的大规模扩张支撑经济增长的空间明显缩小。

3. 生产要素成本加快上升。随着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支撑我国30多年经济高速增

^① 王庆，《2020年前的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不是会否发生，而是如何发生》，摩根斯坦利研究报告，2009年9月20日。

长的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原有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开始减弱。近年来，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加快，土地供给日趋紧张，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大幅下降，继续依靠大规模增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已经越来越困难。

4. 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日益显现。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新态势，我国企业研发能力不足的问题明显暴露出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大多没有研发活动，即便是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研发规模和研发水平也偏低。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技术创新和品牌的产业体系已越来越不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如不加快提升研发能力和产业技术进步，部分已有的技术路线和生产能力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5. 面临的财政金融风险有可能增大。在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速放缓后，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幅也会随之大幅回落。与此同时，过去一个时期扩大债务和信用规模，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增大了潜在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规模贷款已形成一定程度的隐性财政负担，金融系统的风险也在逐步聚积，在增速放缓后，各种潜在风险可能会暴露出来。

四、稳增长的中期应对策略

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潜在增长水平趋于下降，要求将经济工作的中心转向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与此同时，要在继续完善需求管理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强供给管理，强化市场功能，促进平等竞争，化解制约提高要素生产和配置效率的制度性因素，着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一）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从宏观层面讲，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主要是提高国民经济投入产出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高经济增长效益，主要应体现在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增长上，也应体现在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增加上。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并非不要数量和速度，而是要实现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统一。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否则提高质量和效益就无从谈起，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民生就缺乏物质基础。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要求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是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的速度。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要求切实改变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的做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粗放特征比较明显，经济增长过多依靠投资拉动，投资率长期偏高，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制造业产能相对过剩，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如果不尽快扭转这种高投入、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发展方式，发展成本就会越来越高，路子就会越走越窄，即使通过增加投入把速度提升起来，也是不可持续

的。因此，必须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改变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的做法。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要求着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去劳动生产率提高主要得益于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随着劳动力转移规模减小、速度下降，劳动生产率提高速率减缓，继续增加劳动力投入又受到劳动力市场供需形势变化的制约。因此，必须下决心加大科技和人力资本投入，发挥科技进步对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作用，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驱动。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要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近年来，我国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但单位产出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仍然偏高，环境污染仍然较重，经济发展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仍然过大。必须下决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充分利用资源环境约束的倒逼机制，把资源环境压力转化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转变的动力。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要求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条件下，创造比以往高速增长时期更高的效益。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速度效益型”特征比较明显，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增长都建立在经济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基础上。在经济增长转入新常态的情况下，创造比以往高速增长时期更高的效益，迫切要求提高要素生产和配置效率，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对加强供给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二）更加注重加强供给管理

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原有的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以提高要素生产和配置效率为核心的供给管理的重要性则日益凸显。应该看到，一方面，虽然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仍有较大空间，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过去一个时期积累的债务和金融风险将逐步暴露出来，进一步改善民生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挤压政策空间。另一方面，在潜在增长率水平趋于下降和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的情况下，再像以往那样，过度依靠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不仅难以提升经济增速，还可能引发通胀或资产泡沫，从而使经济运行陷入“滞涨”风险。

因此，在继续稳健审慎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积极有效扩大内需的同时，必须根据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化，从体制变革和科技创新入手，采取更有力的措施，通过放松管制、激活市场等制度创新，促进平等竞争，强化市场功能，化解制约提高要素生产和配置效率的制度性因素，改变供给低效和刚性，提高供给效率和弹性，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大规模投入驱动，转向主要依靠提高要素生产和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轨道上来。从中期看，需要着力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

1. 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更加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把应该由市场承担的功能交

给市场。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合法财产权益，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以更好地发挥我国资源要素潜力和综合配置优势。全面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破事实上存在的“玻璃门”和“弹簧门”，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促进要素高效配置，使企业的创新潜能充分释放出来，市场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

2. 加强企业创新研发能力建设。推进企业主导和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鼓励科技要素向企业流动，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加强研发平台建设，加大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技术向企业转移机制，推进传统制造走向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宽进严出”的教育体制，积极探索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机制，强化创新驱动的教育和人才基础，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建立有利于创新潜能充分发挥的体制环境，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使全社会创新潜能充分迸发出来。

3. 推进产业兼并重组。这一轮经济放缓，供给面下降幅度要比需求面大，反映了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然而，产能过剩也是倒逼结构调整和产业兼并重组的有利时机。应坚持市场化导向，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结构调整的重点，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落后产能，推进产业重组、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优化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促进产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提升产业整体素质。

4. 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面向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重点突破制约提升制造业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信息咨询和创意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研发、设计、标准、营销网络、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环节，促进制造服务化。积极吸纳国际服务外包，通过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吸纳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到生产性服务企业就业，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提升制造业价值链的支撑作用。

5. 支持企业“走出去”建立生产基地。支持钢铁、有色、建材等原材料生产企业到海外建立生产基地，逐步将直接进口能矿资源转变为更多进口能源资源密集型原材料；鼓励有自主品牌的机械、电子和消费品制造企业到外海建立零部件、配套件加工组装基地，推进我国制造业向精深加工化、服务化主导转变。支持企业建立全球生产营销网络，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化经营和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中国农村贫困的财政根源探究*

闫坤 刘新波

摘要： 本文根据2011年中央最新扶贫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当前农村贫困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了农村贫困的成因，并挖掘农村贫困的财政本质。同时以基本公共服务作为重点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农村贫困方程，探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结论显示，如今中国农村贫困是因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而导致的能力贫困。只有通过财政再分配“抽肥补瘦”的功能，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农村贫困的发生。

关键词： 基本公共服务 农村贫困 财政本质

作者简介： 闫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刘新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博士后。

一、引言

2011年11月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宣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但接近期美元汇率估算，日均约为1美元，刚刚达到世行1990以最贫困国家为基础测定的贫困线。标准调整后，扶贫人口规模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到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比例约为13.4%，占全国人口比重近1/10。可见，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依旧非常严峻，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农村贫困的成因和本质，从而使农村扶贫工作治标更要治本。

最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确定扶贫工作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健全公共财政体系研究》（批准号：10AZD020）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批准号：10BJY05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组组长：闫坤。

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与过去的扶贫工作目标相比,新的扶贫工作目标两次使用“平均水平”作为标准,将扶贫工作目标具体化、数量化。从扶贫工作内容看,未来扶贫工作将包含两个层面,一是通过继续保证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以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通过财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保证扶贫对象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服务供给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新的扶贫奋斗目标首次明确了财政对减少农村贫困的主要责任,如何在工作中贯彻落实新的扶贫思想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关于财政与农村减贫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和使用。研究显示中国财政扶贫资金投入规模有限,效率也不高,瞄准性差,并没有全部用于农村贫困治理(肖鹏,2006;李小云等,2005;汪三贵等,2007;倪志良等,2007;辛波等,2005)。二是公共需求与减贫。世界银行(2003)指出,没有好的公共服务,人类在福利方面就不可能广泛改善。迟福林(2008)认为公共服务不到位是贫困产生、积累和代际传递的重要根源。任强(2009)提出了“公共服务贫困”的概念,同时指出“公共服务贫困线”是随着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三是财政分权对政府减贫的影响。一些研究认为财政分权通过提高公众参与度、增加政府责任感以及改善政府治理水平,可以加大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入,进而有助于政府减贫(Jutting等,2004;Zhuravskaya,2000;Faguet,2004;续竞秦,2009)。也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对政府减贫效果存在非正面影响,公共支出往往会偏向富人(Crawford,2008;Mookherjee,2005)。张克中等(2010)利用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省级数据发现,增加亲贫式支出是减少贫困的重要手段,但在财政分权程度很高的省份,亲贫式支出的增加并不一定能改善非收入贫困状况。Johannes Jutting等(2004)总结了19个国家财政分权与减贫的关系,认为在一些制度基础较差、政治冲突严重的落后国家中,财政分权可能加剧贫困的发生。

然而上述有关财政与减贫的研究还不够系统。首先,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只是贫困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其次,财政分权并没有直接作用于政府减贫,而是通过决定公共支出水平和支出结构,以公共服务为载体,间接的影响扶贫效果。所以加大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都还只是结果和表象,而非财政扶贫的本质。此外,大量研究证明了收入分配恶化正在抵消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林伯强,2003;万广华,2006;胡兵,2007等),但关于收入分配以何种途径影响农村贫困的研究还非常少。

二、基本公共服务与农村减贫实证研究

(一)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在此我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构建农村贫困方程: $P=(GDP, INCOME, PUBLIC\ GOODS)$ 。

方程中P表示农村贫困程度，GDP代表经济增长，INCOME代表农村贫困人口的个人收入，PUBLIC GOODS代表基本公共服务。对方程进一步分解，2008年中国将低收入人口合并计入贫困人口，在此之前对农村贫困的衡量分为绝对贫困人口标准（P1）和低收入人口标准（P2），考虑统计口径统一问题，本部分将分别以这两个贫困标准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两次回归分析。解释变量从经济增长、收入和公共服务三个方面选取，包括GDP增速、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性投入与全国财政支出比值、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总额、农村义务教育生均投入、农村医疗卫生经费总额、农村个人医疗卫生投入、农村医疗卫生经费投入增速、农村个人医疗卫生费用占城市个人医疗卫生费用比值、农村社会救济费用、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及城乡个人收入比值，使用SPSS11.5软件进行估计，经过筛选剔除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指标，保留6项指标，分别是GDP增速（GDP），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性投入与全国财政支出比值（EDU），农村个人医疗卫生费用占城市个人医疗卫生费用比值（MED），农村医疗卫生经费增速（HYG），农村社会救济费用（REL），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INS）^①。

（二）模型估计结果

1. 农村贫困方程1：

$$P1=1.659-0.046GDP -0.188EDU -0.036MED +0.005HYG -0.005REL +0.54INS$$

(0.174) (0.506) (0.355) (0.461) (0.037) (0.088)

从方程1我们看到，GDP增速、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性投入与全国财政支出比值、农村个人医疗卫生费用占城市个人医疗卫生费用比值、农村社会救济费用与农村绝对贫困比例呈现负相关的趋势，也就是说保持经济增长、增加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缩小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与城市的差距，加大社会救济力度可以减少农村绝对贫困的发生。农村养老覆盖率与P1正相关，是由于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还很低，绝对贫困人口的参保率更低，因此在农村内部养老保险等于加大了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所以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现阶段还不能发挥减少农村绝对贫困的作用。农村医疗卫生经费增速与P1也是正相关，说明在医疗卫生经费的增量中，农民自己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较高，负担过重，变向减少了农民收入，即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因病致贫的概率非常大。

农村社会救济费用与P1存在明显的线性负相关关系，社会救济对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效果明显，每增加1亿元农村社会救济投入（原始数据农村社会救济投入指标以亿元为单位），可以减少0.005个百分点的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农村

^① 方程估计结果详见附表；文中所使用数据均来自历年各类统计年鉴。

绝对贫困人口脱贫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授之以鱼”，即直接给予现金救助的形式。这是因为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或者为老、弱、病、残，或者生活在自然环境极度恶劣的地区，不具备取得基本收入的能力，唯有政府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

2. 农村贫困方程2:

$$P2=7.408-0.208GDP -0.313EDU -0.244MED+ 0.035HYG -0.015REL+1.691INS$$

(0.033) (0.531) (0.030) (0.047) (0.016) (0.032)

从方程2的估计结果看，与农村贫困方程1的整体趋势相同，GDP增速、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性投入与全国财政支出比值、农村个人医疗卫生费用占城市个人医疗卫生费用比值、农村社会救济费用与农村低收入人口比例呈现负相关的趋势，农村养老覆盖率与农村医疗卫生经费增速与P1呈正相关关系。各解释变量对P2的影响与方程1的分析相同，在此不再重复。

根据回归系数检验情况（见方程下方），农村贫困方程2的估计结果要明显好于方程1。除了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性投入与全国财政支出比值以外，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性t检验的概率P-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0.05，通过了假设检验，它们与被解释变量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中国GDP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降低0.208个百分点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包括绝对贫困人口，下文略）比例；农村医疗卫生费用占城市医疗卫生费用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减少0.244个百分点的农村低收入人口比例；农村社会救助增加1亿元投入使农村低收入人口比例下降0.015个百分点。另外，方程2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绝对值都大于方程1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说明经济增长和农村公共服务提供对农村低收入人群的受益效果更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减贫难度更大。这主要受两方面原因共同影响，一方面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自身素质差，缺乏生产自救的能力，比如：老无所依者；另一方面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偏低，优先受益和受益最多的是农村人口中的相对富裕人群，无法满足贫困人口的真实需要，比如因病致贫更需要高标准的医疗保障。

（三）实证分析结论

通过对农村贫困方程P1和P2回归结果的比较，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从整体趋势上看，经济增长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都有助于推动农村减贫工作，但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处于深度贫困状况，对此经济增长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脱贫效果不够显著。二是，农村医疗卫生费用投入偏低，城乡差距过大，农民负担过重，是导致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投入。三是，养老保险覆盖率太低，不但不能促进农村减贫，反而加剧了农村内部的相对贫困。农村社保体系初步建立，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目前主要靠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缓解农村贫困。四是，随着全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农村义务教育作为基础教育已经不能直接有效促进农民收入，但是农村义务教育保障了农村贫困人口获得公平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五是，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是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农村贫困的财政根源分析

（一）农村贫困的财政根源

1. 公共服务短缺下的能力贫困。资源稀缺决定了不论在任何一个阶段，总有人处于一个需求不足的状态，但是在不同时期、不同体制下、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这种需求不足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村贫困表现为绝对物质贫困，一个普遍贫困的状态，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导致的贫困。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的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贫困变成一个相对的概念。贫富差距变大，富人可以尽情的挥霍浪费，穷人还在为生存而挣扎。与绝对物质匮乏相比，此时的贫困是穷人被剥夺的贫困，被剥夺的表象为收入分配的差距，被剥夺的内核是人的实质自由，也就是生存的权利，具体包括受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障以及政治诉求。正是这些基本权利的剥夺，造成了穷人缺少自我发展能力，沦入贫困的循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又是农民基本生存权利剥夺的表现形式，因此我们可以定义当前中国农村贫困是公共服务短缺下的能力贫困。

2. 财政再分配与农村贫困。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系统的论述了福利经济学理论。他从两个方面提出了增进福利的方法，一是增加国民收入；二是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他认为在国民收入总量不减少的前提下，税收从相对富裕的人转移给穷人可以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陈共，2007）。基本公共服务是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社会再生产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客观必要。政府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属于财政再分配的范畴。进而由公共服务短缺引发的农村能力贫困其实是财政再分配功能弱化的结果。因此在中国经历30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农村贫困的实质不再是绝对的物质匮乏，而是财政再分配问题。

（二）财政体制对农村减贫的决定性作用

1. 历史欠账太多，农民负担过重。从公共服务提供角度来说，农民负担就是农民对公共服务的成本分担，农民所承担的各种税费是对农村公共服务的价格补偿。因此可以说农民负担和农村公共服务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按照成本与收益的原则，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

和质量取决于农民为其支付的成本，如果农民负担比例高，公共服务的供给就应该充足一些。但是在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出现了农民负担偏重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短缺的矛盾。1952-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剪刀差从农业中提取了9716.75亿元，加上农业税共达10932.61亿元，农业新创造价值的1/5被国家无偿拿走（张磊，2007）。1994年分税制以后，地方财力困难，农民负担进一步膨胀，2000年农民承担的税费总额比1990年增加了1.9倍，农民负担占收入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到12%（赵云旗，2007）。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教育、医疗市场化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成本，增加了农民的隐性负担。因此必须加大政府农业投入，弥补二元经济对农民的历史欠账，统筹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彻底改变农民对公共服务“入不敷出”的局面，才能保障农民（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权益，减少农村贫困的发生。

2. 县乡财政困难直接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1994年分税制改革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省以下分税制没有建立，财权不断上移，事权划分又过于笼统。分税制以前县级财政基本可以自给，分税制以后县级财政的自给率明显下降，1994年县级财政支出缺口从上年的86.39亿元猛增到726.91亿元。1993—2006年县本级财政收入仅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94%下降到50%左右，扶贫重点县的情况就更糟，近两年县本级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足50%，一半以上的财政支出都要依靠其他途径来弥补。^①另一方面，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高度重叠，省以下各级政府对主要财政支出项目都有不同比例的负担（见表1），县级政府负担了教育、医疗和支农支出的大部分责任，如果再加上乡级负担比重，县乡两级政府支农负担率为61.6%，教育负担率为63.7%，医疗卫生负担率为46%。可见事权划分没有考虑公共服务的受益范围，也没有对应财力的保证，由此而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低效和不足。

表1 2005年地方财政主要支出项目分级情况 单位：%

主要支出项目	省级	市级	县级	乡级
基本建设支出	39.07	37.11	22.45	1.37
支农支出	17.41	21.00	44.98	16.61
教育支出	16.85	19.45	50.66	13.04
医疗卫生支出	23.24	30.79	41.83	4.14
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41.03	37.17	20.83	0.97
主要支出项目平均	27.52	29.10	36.15	7.23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2005》数据整理得到。

① 根据历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数据整理得到。

3. 转移支付均等化作用有限，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转移支付的主要功能是弥补财政缺口和地区性公共物品辖区间的外部效应，以及支持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中国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不尽合理，更多的保护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利益。首先具有明显均等化作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太小；再者当年为调动地方改革积极性而设立的税收返还制度一直存在；应该侧重于基础性项目和公益项目的专项转移支付却几乎覆盖了所有的预算科目，拨款方式也没有按照因素法和公式计算，主要通过政府间讨价还价决定，对财政包干体制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另外，专项拨款需要一定的地方配套资金，这对发达地区比较有利，贫困地区需要拨款，但又没有相应的配套资金，原本的收入又变成了负担。近年来众多学者对转移支付均等化效果的实证研究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些结论，尹恒等（2007）利用2000多个县级地区1993-2003年的数据对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分税制后，上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不但没发挥均等化县级财力的作用，反而将原有的差距扩大，造成了近一半的县级财力差异，税收返还和专项补助的非均等作用最强。周美多、颜学勇（2011）利用27个省份1999-2004年的县级数据，测算了历年省内转移支付均等化效果系数，结论认为东部省份以及一些中西部省份的转移支付在缩小省内县际间财力差异上效果较差。张恒龙、葛骅（2012）对中国3大类转移支付1994-2006年财政均等化的绩效进行分析，计算结果显示转移支付均等化效果总体上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中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实践效果有悖于制度设计的初衷，无形中加速了地区和城乡差距的扩大，使得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一直处在发展的劣势当中，这种相对差距的蔓延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相对贫困问题。

四、中国农村减贫的财政政策探讨

正如阿玛蒂亚·森（Sen）研究认为，单方面的增加收入并不一定能提高福利水平，关键看收入是否保障了人们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根据Sen的理论我们为中国农村贫困下一个描述性的定义：由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短缺造成的农民自身发展能力低下，以至于无法取得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生活必需品的农民低收入现象。与过去的农村大范围的绝对物质贫困不同，当前中国农村贫困是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导致的能力贫困，其本质问题在于财政再分配没有充分发挥“劫富济贫”的功能。因此要彻底缓解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必须从财政体制入手，通过完善财政分配制度，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促进农村贫困人口自身发展。

本研究认为财政促进农村减贫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补偿式扶贫、维权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补偿式扶贫以弥补巨大的历史缺口为目标，依靠政府不断加大对“三农”的

资金投入逐步缩小二元经济产生的历史差距。维权式扶贫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保障农民生存权和受教育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基础教育和就业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作为中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具体内容尚未清晰界定,其类型、水平和质量在公民中有很大的差异。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缺失从这一角度上说属于权利贫困,保障这些基本权利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因此要通过财政体制改革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培训和社会保障不足问题。开发式扶贫依旧是以经济增长为目的,通过税收优惠加快生产建设,逐步形成贫困地区的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补偿式扶贫和维权式扶贫与开发式扶贫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前两者是后者的基础,为后者提供保障,后者为前者提供经济支持。

(一) 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力度

1998年公共财政体系确立,政府开始重视对农业的投入,当年财政支农合计比上年增长50.7%,此后财政支农规模继续逐年扩大,但财政支农合计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1978-1988年,财政支农合计占财政支出比重年平均为10%,1989-1998年,该比重年平均为9.5%,1999-2009年,该比重年平均下降到8.5%。此外,财政扶贫资金占财政支出比重从1998年的2%下降到2009年的0.6%,^①这些都表明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和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必须始终抓紧抓好。回顾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当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估计农村落后城市至少5-10年的水平,要缩小城乡差距不仅需要决心更需要行动。“三农”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提高支农合计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是减少农村贫困的根本保证。

(二) 以税收优惠带动农村发展

中国通过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解决了农村普遍贫困的问题,虽然目前的贫困现象更多的是分配格局造成的,但是经济增长配合分配格局调整会更有利于减少农村贫困。

^①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数据整理得到。

而且只有欠发达地区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投入农村扶贫工作，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给需要工作机会的贫困人口，才能提供更多的农村公共服务弥补历史缺口。借鉴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经验，东部地区的迅速崛起离不开政府的税收优惠。欠发达地区投资环境差、开发与建设难度大，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发展，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必须借助政府行为创造发展机遇，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更加离不开税收优惠政策。具体优惠措施可以考虑：通过对不同地区的试点城市，实行有针对性、有计划的、有差别对待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刺激地区经济发展；通过增值税、营业税等主体税种的税收优惠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力度；通过对地方特色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调整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通过延长税收优惠期限，强化人们对欠发达地区投资的信心，激发人们的投资热情。

（三）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保障贫困人口和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水平，能够帮助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使他们通过获得比较高的收入而脱离贫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只有在弱势群体（困难群众）享受到基本公平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因此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农村减贫的必经之路，可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全面协调。

首先，通过事权调整，缩小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缺失的主要原因是县乡财政困难，县乡两级政府一方面没有财力支撑，另一方面又承担着大部分农村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要改变这一局面，要么调整财权，增加基层政府的可支配财力；要么调整事权，减少基层政府的事权范围；要么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对财权和事权同时调整。任何一种调整都存在巨大的交易成本，而且需要一个博弈过程，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以事权调整作为改革的切入点较为合理。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转移支付规模不断扩大，从1994年的272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06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12.42%。地方政府支出总额的一半来自于中央转移支付，庞大的转移支付体系使得中央政府已经具备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实力。^①尤其农村地经济发展滞后，即便是在发达国家，都要依靠中央政府的支持。因此减少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将农村义务教育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上划中央，县乡政府只负责任执行和管理，不仅可以保证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还有利于统一标准，加快城乡统筹和全国统筹。

其次，改革政府政绩考核标准。虽然各界一致强调要保护弱势群体的发展利益，但是如果如果没有对应的政绩考核制度，就不会真正地付诸行动。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① 汤学兵、张启春，2011年，《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江海学刊》第2期。

一直以GDP作为官员考核与提拔的标准。当经济发展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时，经济增速确实是多数居民的共同偏好，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不再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已经演变成“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服务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适时的将公共服务改善情况纳入到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当中，方能正确引导政府作为与不作为。当然公共服务绩效作为政府绩效考核一直未得以实现也存在技术原因，公共服务种类繁多，供给成本和效果受到多方面条件的影响，虽然众多学者和部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至今还没形成一套被社会广泛认可的、科学的、公开透明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过程，不能因此停止前进的脚步。我们可以考虑一些学者的建议，先将群众满意度作为干部考核任免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由于目前公共服务尚处于总量不足阶段，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缺口还非常大，短期内也可以将公共服务供给数量作为政府考核指标，配合群众满意度一同考量政府政绩。为了克服盲从现象，需要事先明确各类公共品的发展计划，比如某年某县计划改造农村义务教育危房面积多少平米。完成了发展计划并得到了群众普遍认可的视为优秀，对没有完成计划或群众普遍不满意的实施行政问责。

参考文献：

1. 陈共，2008，《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8，《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3. 闫坤，2006，《中国县乡财政体制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4. 闫坤等，2008，《中国农村减贫财税政策研究》，中国财经出版社。
5. 张磊主编，2007，《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演变（1949-200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6. 阿玛蒂亚·森（Sen），2001，《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
7. 庇古（A. C. Pigou）著，朱泱、张胜纪、吴良健译，2009，《福利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8. 吕炜、刘畅，2008，《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社会性支出与贫困问题研究》，《财贸经济》第5期。
9. 续竞秦，2009，《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以财政农业支出为例》，《农村经济》第12期。
10. 闫坤，2008，《分税制改革的评价与展望》，《中国财政》第18期。
11. 闫坤等，2007，《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经济研究参考》第58期。
12. 尹恒、康琳琳等，2007，《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管理世界》第1期。

13. 周美多、颜学勇，2011，《省内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基于1999~2004年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

14. 张恒龙、葛骅，2012，《转移支付的类型、资金分配结构与财政均等化绩效——来自中国的省际经验分析》，《经济经纬》第1期。

15. 张克中、冯俊诚、鲁元平，2012，《财政分权有利于贫困减少吗？——来自分税制改革后的省际证据》，《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2期。

16. 赵云旗，2007，《中国当代农民负担问题研究（1949-2006）》，《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

17. Crawford, Gordon,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Limits to Poverty Reduction: Findings from Ghana.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6, Issue 2, July 2008, pp. 235-258.

18. Balisacan, M and F. Nobuhiko,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litics Revisited: A Developing-Country Case. Economics Letters, Vol.79, Issue 1, April 2003, pp. 53-58.

19. M. Govinda Rao, Richard M. Bird, Jennie I. Litvack.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Case of Viet Nam. Asian Economic Journal, Vol.12, Issue 4, December 1998. pp.353-378.

20. Zhuravskaya E V., Incentives to Provide Local Public Goods: Fiscal Federalism, Russian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76, No.24, April 2000. pp. 337 - 368.

21. Jean-Paul Faguet. Does Decentralization Increase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to Local Need? Evidence from Bolivi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516, 2004.

22. Johannes P. Jütting, Celine Kauffmann , Ida McDonnell , Holger Osterrieder, Nicolas Pinaud, Lucia Wegner, Decentralisation and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xploring the Impact.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 ,NO. 236, 2004.

23. Joachim Von Braun, and Ulrike Grote. Does decentralization serve the poor? IMF-conference 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0, 2002.

附录:

图1 Coefficients^a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1.659	2.043		.812	.476
GDP增速		-.046	.026	-.306	-1.774	.174
义务教育		-.188	.250	-.098	-.753	.506
卫城乡比		-.036	.033	-.108	-1.092	.355
卫生增速		.005	.006	.064	.844	.461
社会救济		-.005	.001	-.709	-3.609	.037
养老覆盖		.540	.216	.222	2.496	.088

a Dependent Variable: P1

图2 Coefficients^a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7.408	3.294		2.249	.153
GDP增速		-.208	.039	-.429	-5.401	.033
义务教育		-.313	.416	-.058	-.751	.531
卫城乡比		-.244	.043	-.244	-5.640	.030
卫生增速		.035	.008	.166	4.461	.047
社会救济		-.015	.002	-.736	-7.822	.016
养老覆盖		1.691	.309	.209	5.478	.032

a Dependent Variable: P2

责任编辑: 晨乔

2012年度亚洲竞争力评估结果 及其分析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

摘要：为客观、科学地反映亚洲经济体及上市企业竞争力情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发了亚洲经济体及上市企业竞争力评估指数。2012年度亚洲经济体竞争力排名结果为：“亚洲四小龙”占据榜单前4位，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分列第1-4位；紧随其后的是澳大利亚、阿联酋、巴林、新西兰和日本，分别位列第5-9位；中国的综合排名与上一年度排名持平，在亚洲经济体中仍位列第10。2012年度亚洲上市企业竞争力排名前10位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日本丰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日本电报电话公司、中国移动有限公司、韩国三星电子有限公司、澳大利亚力拓有限公司、日本三菱股份有限公司、日本日产尼桑汽车公司、日本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关键词：亚洲竞争力 经济体竞争力 上市企业竞争力 评估指数

作者简介：王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经济学博士。

对亚洲而言，2012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在世界经济复苏一波三折、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深化、美国“财政悬崖”持续发酵、亚洲内部张力和不稳定性加大的背景下，亚洲经济一方面延续了2012年就已经启动的通胀治理进程，另一方面经济减速的阴霾始终笼罩在亚洲上空。各经济体内部需求不很稳定，普遍面临增长动力不足的突出问题。亚洲竞争力，无论是经济体还是企业，都受到很大影响，这引发了人们对亚洲经济发展可持续性以及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中断的担忧。但就全球而言，亚洲地区，特别是亚洲新兴

* 课题组组长王军；课题组成员：黄志龙、刘向东、徐长春、张焕波。

经济体依然是全球经济中少有的亮点，亚洲正逐步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为了客观、科学地反映亚洲经济体及上市企业竞争力情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受博鳌亚洲论坛委托，开发了亚洲经济体及上市企业竞争力评估指数。该项研究系统描述了亚洲竞争力的基本格局，展示了亚洲竞争力的整体风貌，明确了影响亚洲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因素。这为各经济体和企业更好地制定竞争力发展战略，不断提升竞争力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基本路径；对推动亚洲经济体和企业优势互补、加强合作，无疑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2012年度亚洲经济体竞争力评估结果及其分析

从影响亚洲经济体竞争力的内外环境来看，2012年，全球经济局势纷繁复杂，全球经济延续了上一年的低迷状态，仍在低位徘徊。欧美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仍在寻找应对化解高额债务风险的办法，并再次启动新一轮货币宽松刺激方案，但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成为大选年的关键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情况甚至比2011年还要糟糕些^①。尤其是饱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的欧元区有可能自2009年后再次陷入负增长的状况。

欧洲债务危机多次反复、旷日持久，尽管欧洲稳定机制（ESM）业已生效，欧洲银行业联盟也达成初步共识，但这些举措也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西班牙银行业问题恶化和欧元区经济整体陷入衰退的负面影响，财政整合的步伐则由于德国和南欧国家之间巨大的分歧而推进缓慢。因此，国际社会认为，欧洲不排除陷入失去的十年的可能，欧元区分裂的风险仍然存在。

美国经济尽管保持了增长，但“财政悬崖”则成为悬在美国经济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QE3效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加上美国总统大选导致的党派之争和“桑迪”飓风的影响，将使得美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

日本经济受到中日领土争端的重创，增长前景不容乐观。金砖国家经济在2012年可谓跌宕起伏，前8个月大都面临货币贬值、资本外逃的压力，尽管8月份以来随着美国QE3的实施，资本外逃和货币贬值压力有所缓解，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持续存在。

如果将目光转向亚洲，虽然亚洲的经济仍在支撑着全球经济的增长，但是亚洲国家集体面临着较大的经济下滑风险。由于长时间受欧元区债务危机和美国经济疲软拖累，

^①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 Coping with high debt and sluggish growth, October 2012.

亚洲地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受创严重。

2012年，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所放缓，这主要是受到外部不利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其中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处于衰退的边缘，而美国经济则复苏乏力。更为重要的是，亚洲经济的主要动力——中国和印度的增长势头减弱，这也给地区经济增长带来一些阻力。2012年上半年，整个亚洲地区的实际GDP（年同比）增长率平均为5.5%，虽然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却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当前，亚洲经济体可能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相比于其他地区，亚洲经济的增长活力仍在，特别是当全球各大央行纷纷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措施的时候，而整个亚洲面临的物价压力仍较温和。虽然说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放缓态势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亚洲经济体良好的债务状况和积极的创新活动，仍能够将亚洲经济带向一个较为温和增长的轨道上。尤其是从金融机构的融资风险看，亚洲市场的公司目前普遍比拉丁美洲和欧洲市场的公司拥有更低的债务权益比率。在经历过上世纪90年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银行拥有较为健康的资产负债表，而不会像全球其他地区银行那样遭遇去杠杆化的压力。

从2011年以来，亚洲主要经济体是否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否仍然保持良好的竞争活力，是否还能在政府行政效率、基础设施水平、社会发展进步及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方面进一步有所改善，备受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的瞩目。对此，我们在亚洲经济体竞争力2011年度排名的基础上，使用相同的指标体系，跟踪分析亚洲主要经济体2012年度的竞争力变化，以此诊断亚洲主要经济体的竞争力状况，以便对亚洲乃至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做出预判。2012年度的亚洲经济体竞争力评估仍然是涵盖37个亚太地区经济体，通过使用五个维度的指标体系，既包括经济总量、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水平等存量指标，也包括经济增长前景、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等增量指标，分析它们在经济社会方面所做的改变。

亚洲经济体竞争力综合评估指数由五个维度构成，即商业行政效率、基础设施状况、整体经济实力、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五个方面。综合评估指数主要用于评价亚太地区37个主要经济体未来竞争力状况，描述37个经济体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力地位，从而为各国政府、企业和组织找出与标杆国家或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明确一国或地区经济、社会、政府等领域改进的方向。

从地理区划上讲，亚洲共有48个经济体，加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三个经济体，共有51个经济体，由于中国澳门、阿富汗、朝鲜、文莱、缅甸、马尔代夫、黎巴嫩、巴勒斯坦、老挝、伊拉克、不丹、也门、塞浦路斯、叙利亚以及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16个经济体的经济规模较小或者历史数据难以获得，暂时没有包含

在现有评价体系之中。因此，2012年度的亚洲经济体经济竞争力排名中，我们仍然沿用2011年度评估对象，即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37个亚太地区的经济体。

从2012年度亚洲经济体综合竞争力评估指数排名看，位列前4位的仍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即传统意义上的“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分列第1-4位；紧随其后的是澳大利亚、阿联酋、巴林、新西兰和日本，分别位列第5-9位；中国在37个经济体中的排名与上一年度排名持平，在亚洲经济体中仍位列第10。

表1 亚洲经济体2012年度竞争力综合评估指数排名表

经济体	2012/37		2011/37	经济体	2012/37		2011/37
	排名	得分	排名		排名	得分	排名
中国香港	1	63.83	3	格鲁吉亚	20	41.39	16
新加坡	2	63.09	1	约旦	21	39.02	20
中国台湾	3	58.39	2	阿塞拜疆	22	38.94	25
韩国	4	58.09	5	越南	23	37.63	24
澳大利亚	5	57.67	8	印尼	24	36.79	30
阿联酋	6	54.73	14	亚美尼亚	25	36.40	22
巴林	7	54.50	9	菲律宾	26	36.35	27
新西兰	8	54.24	7	蒙古	27	36.23	28
日本	9	54.10	4	伊朗	28	35.56	19
中国	10	53.16	10	斯里兰卡	29	33.88	26
以色列	11	52.95	6	印度	30	33.60	32
卡塔尔	12	52.47	12	吉尔吉斯斯坦	31	32.85	29
科威特	13	51.49	21	尼泊尔	32	31.31	36
沙特阿拉伯	14	49.72	15	孟加拉国	33	30.15	34
哈萨克斯坦	15	46.35	13	巴基斯坦	34	28.17	35
马来西亚	16	45.37	11	塔吉克斯坦	35	27.62	31
阿曼	17	44.43	23	东帝汶	36	26.93	33
土耳其	18	43.39	17	柬埔寨	37	20.14	37
泰国	19	43.05	18				

1.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交通、金融和旅游中心之一，中国香港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在商业行政效率、基础设施状况、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领先优势。中国香港拥有国际一流的基础设施，稳健的宏观经济环境，这两项指标在37个经济体中均排在首位，同时也有高效的商业行政效率。与此同时，在社会发展和创新教育方面也位列上游。在整体经济实力方面，中国香港除保持显著的增长外，其经济向好的表现带动总体就业人数屡创新高，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准。作为国际著名的自由港实施零关税政策，中国香港的总体税率很低；无论出口占GDP比重还是进口占GDP比重都

高达200%以上，这有助于使其保持国际进出口及转口中心的地位，使得中国香港的综合竞争力在亚太地区37个经济体中跃居第1位。同往年一样，中国香港略显不足的是人力资本投入和创新产品研制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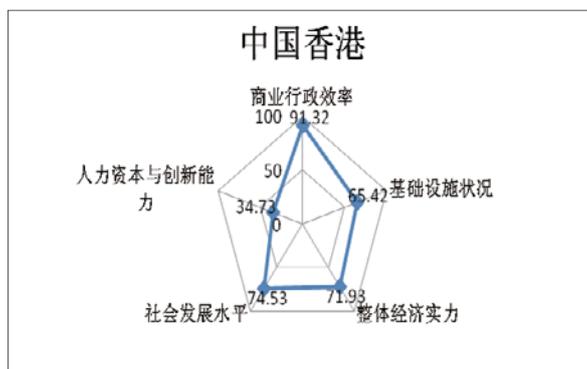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香港竞争力分项指标雷达图

新加坡仍然是东南亚地区最富活力的经济体。新加坡拥有高效的商业行政效率，其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保持了国际一流水准。从整体经济实力看，由于受全球经济衰退影响，依赖外贸出口和转口贸易的经济体遭受打击较大，其经济增长出现较大幅度的放缓，但新加坡保持了较低的失业率，总税负也不高。在社会发展方面，新加坡继续小幅度改善，尤其是在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和传染病诊治等方面都一定幅度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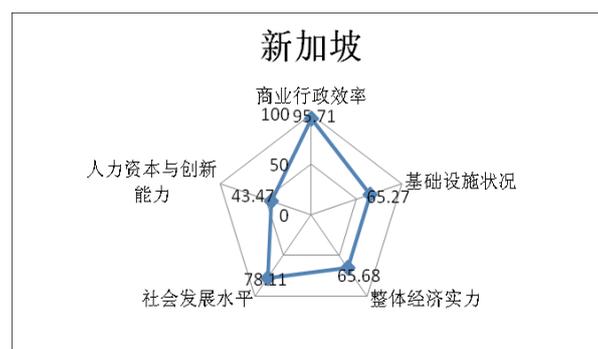


图2 新加坡竞争力分项指标雷达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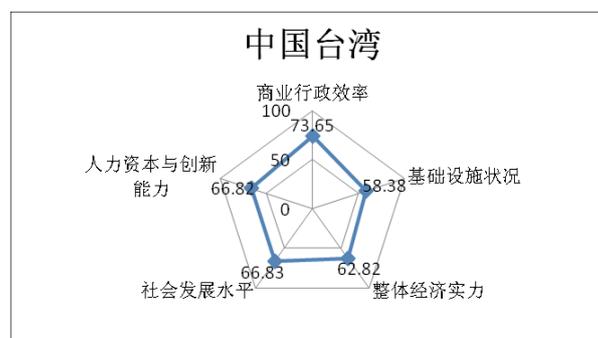


图3 中国台湾竞争力分项指数雷达图

中国台湾的比较优势在于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制造业。其人力资本和创新产出继

续保持较高的水准。80%以上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是保证其具备创新活力的基础，人均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从整体经济实力看，中国台湾经济实力仍然很强，同样表现良好的是其基础设施水平。与往年相比，中国台湾商业行政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韩国综合排名仍维持在第4的位置。韩国的强项仍然表现在人力资本投入和科技创新方面。在商业行政效率方面，韩国政府改善了企业设立的审批程序和所花费的成本，并相应减少了商业合同执行程序，这促使其企业竞争活力大大增强。而在社会发展方面，除了外科医疗服务方面仍显紧张外，在基础教育、传染病诊治、健康卫生等方面均保持良好水平。从整体经济实力看，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韩国经济增速也下降了，但经济健康状况却有所改善。通胀率和失业率保持在低位，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保持良好，经济运行的风险并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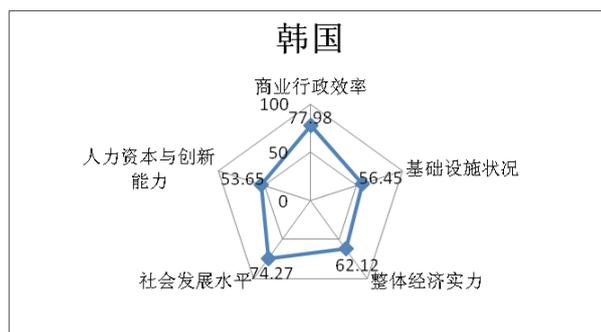


图4 韩国竞争力分项指数雷达图

2. 传统发达经济体

从经济增长看，2011年日本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自2008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政府公共债务负担非常严重，存在较大的债务危机风险，因此整体经济实力日本排名下滑。日本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水平，从人力资本与创新角度看，日本企业科研经费投入始终保持较高强度，其国际专利申请总量在亚洲遥遥领先，高科技产品和创意产品出口能力较强。日本的竞争劣势表现在商业行政效率相对较低，企业设立的审批程序比较繁杂，所花费时间和成本都比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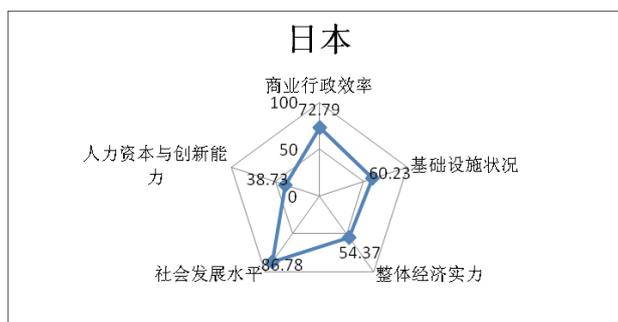


图5 日本竞争力分项指数雷达图

以色列这个被称为创业的国度，主要是以科技立国，在引领创新方面具有独特的魅

力和优势，加上常年的高强度教育的投入，培养了很多科学家和工程师。以色列的劣势仍没有得到改善，尤其是在政府的商业行政效率和经济发展环境方面。以色列经济表现欠佳，主要是受全球需求集体疲软，以及叙利亚战乱局势和伊朗核问题等区域影响，对欧盟、美国、亚洲等主要区域的出口出现大幅下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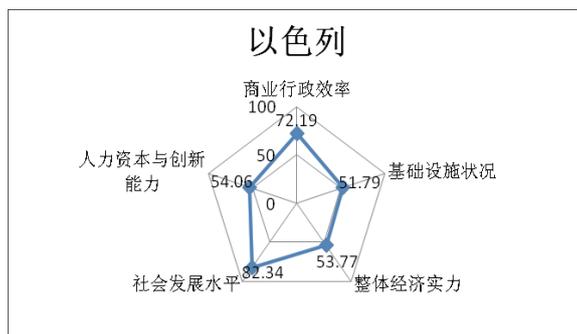


图6 以色列竞争力分项指数雷达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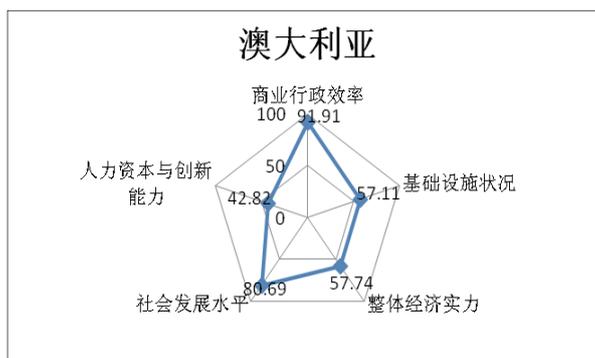


图7 澳大利亚竞争力分项指数雷达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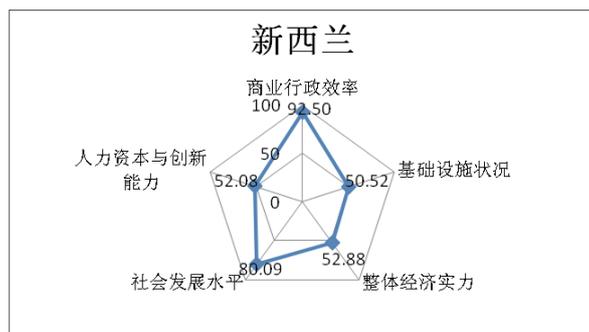


图8 新西兰竞争力分项指数雷达图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经济比较发达，行政效率较高，基础设施完善，有良好的社会发展条件和创新环境。从商业行政效率看，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鼓励创业，吸引投资，企业设立所花费的时间较少，新设企业成本较低，商业审批程序很少。在基础设施方面，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始终保持高水平，新西兰基础设施的改进幅度不大。在人力资本和创新方面，新西兰加大了对教育的公共支出，高等教育入学率得到显著提升，澳大利亚在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以及吸引技术移民方面具有传统优势，使其在人力资本和创新方面表现良好。而在社会发展方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无论在传染病控制、医疗服务，还是基础教育和交通安全方面都日趋成熟，社会发展水平保持在较高水平。从经济表现看，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速度要好于新西兰，而从经济健康程度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经济健康程度均表现良好，通胀率和失业率还都比较适中，政府债务也处在较低水平，外贸表现尚属正常。

3. 亚洲的金砖国家

中国综合排名仍维持在第10位。受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以及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的影响，最近两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年均通胀率也从2011年5.4%的较高水平快速下降。尽管地方债务风险需要警惕防范，但政府整体债务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占GDP比重仅在25.8%，无主权债务危机之虞。再加上51.3%的国民储蓄率，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仍被看好，经济风险尚在可控范围之内。近年来，随着投资的不断累积和完善，尤其是大规模的公路和航空设施建设提升了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排名。与此同时，受益于国家开始重视收入分配并加大在住房医疗以及环境卫生等方面的投入，社会进步巨大而明显。而在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方面，受外需下降影响，导致中国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出口较大幅度下降，中国的表现稍显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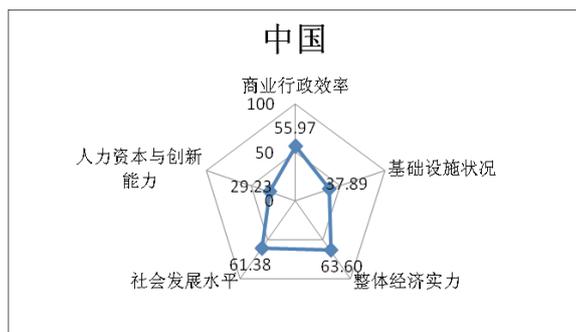


图9 中国竞争力分项指标雷达图

印度的综合排名有一定提升，由上一年度的第32位提升至第30位。近年来印度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期，2011年保持近7%的增长速度，而且在基数较小的情况，未来发展前景也很可观。从整体经济实力看，除通货膨胀率处于8.6%的高位外，印度经济健康状况相对良好，政府债务尚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失业率也保持在4%左右的水平。因长期以来基础设施投入较少，公路、航空、电力等方面的改善程度不大，基础设施水平在亚洲仍然停留在中下游水平。印度企业设立的审批程序和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均较多。作为美国信息技术外包的主要转移国家，印度在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方面有明显改善，无论是高等入学率还是高科技产品出口都比上年有了较大的进步。印度在社会发展方面与上年

变化并不大，说明印度政府对社会发展滞后的严重性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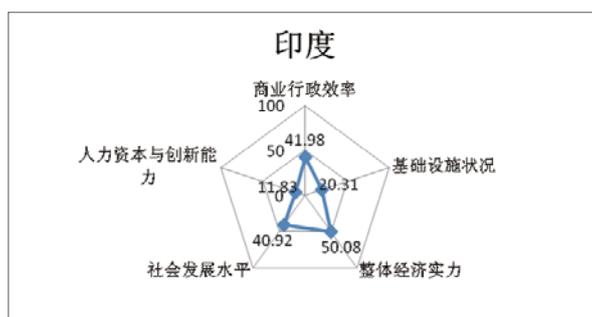


图10 印度竞争力分项指标雷达图

4. 东盟新兴市场

受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东盟新兴市场的发展也出现放缓迹象，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盟新兴国家在亚洲经济体竞争力中的排名，除新加坡外，东盟其他成员国竞争力呈现分化走势。2011年度表现最为抢眼的马来西亚经济增速出现放缓迹象，在亚洲经济体综合排名下滑至第16位；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分别位于第19位、第24位和第26位。

5. 西亚、中亚资源输出国

2012年度亚洲经济体竞争力排名中西亚和中亚的资源输出国表现抢眼，其中尤其是以阿联酋表现尤佳，在综合排名中位于第6位，紧随其后的是西亚资源输出国巴林，卡塔尔、科威特、沙特和哈萨克斯坦分别位列第12-15位，阿曼和土耳其分别位列第17、18位的中游水平。

二、2012年度亚洲上市企业竞争力评估结果及其分析

从影响亚洲企业竞争力的内外环境来看，在过去的一年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美国经济在力保就业中缓慢复苏，日本经济在政治动荡中走向低迷；国际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市场震荡加剧，市场预期持续走低，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受此影响，企业发展依然笼罩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之中。因主要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下游，亚洲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加明显。在出口受阻、进口压力增加的背景下，亚洲企业在投资、消费和出口等方面的主要指标都表现为恶化，企业融资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产品库存加大，价格下降明显，生产周期延长，企业竞争力受到很大影响。

具体而言，首先，亚洲投资环境恶化，对企业竞争力产生较大影响。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间接对亚洲经济体产生影响，并进一步对企业投资环境产生影响，使企业发展的三大动力之一受到抑制，对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其次，亚洲企业库存增加，产能过剩，企业的市场环境出现了大幅滑坡。影响企业生产的一大因素就是市

场，企业产品卖不掉就必然制约企业的生产，制约企业的竞争力。长期以来，亚洲企业增长对出口依赖较大，欧债危机、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导致亚洲企业市场萎缩，出口增长回落，产品销售不出去，产能过剩加剧，严重影响了亚洲企业竞争力的提高。第三，亚洲企业贸易环境恶化，出口受到大幅抑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消费能力下降，进口能力下降；受振兴经济需要的影响，发达经济体普遍实行了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等计划，出口能力增强。这样，亚洲企业不仅本土市场受到发达国家的挤压，而且传统市场迅速减小，出口需求明显萎缩。

为了客观、科学地评估亚洲企业竞争力情况，限于各企业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把评估对象设定为亚洲上市企业。鉴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企业与亚洲经济联系的紧密性，我们把澳新上市企业也列入评估对象，以更全面地反映亚洲经济的真实状况。我们从亚洲39家证券交易所、大洋洲2家证券交易所中选定全行业（不包括金融业）目标企业22949家。剔除掉无数据或数据不全的企业，最终确定参加排名目标企业为17529家。

表2 亚洲上市企业综合竞争力前10名

公司名称	经济体	行业	排名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能源	1
日本丰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	汽车及配件	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能源	3
日本电报电话公司	日本	电信服务	4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电信服务	5
韩国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韩国	半导体	6
澳大利亚力拓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	材料	7
日本三菱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	生产资料	8
日本日产尼桑汽车公司	日本	汽车及配件	9
日本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日本	汽车及配件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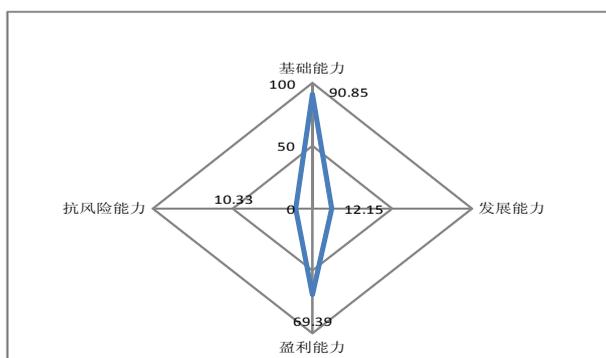


图1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竞争力分项指标雷达图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在亚洲企业综合竞争力排名中位列第一，综合能力、

基础能力、盈利能力得分都相对较高，居于前列。就四项分项能力而言，其基础能力和盈利能相对更强，而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则相对薄弱。四项指标的排名依次是基础能力、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二的是日本丰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就四项分项能力而言，其基础能力和盈利能也相对更强，而抗风险能力和发展能力则相对薄弱。其中，基础能力最强，然后依次是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基础能力和发展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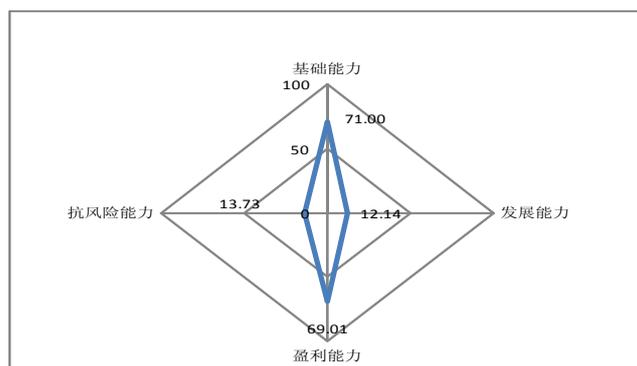


图12 日本丰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竞争力分项指标雷达图

综合竞争力排在第三的是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就四项分项能力而言，其基础能力和盈利能力也相对更强，而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则相对薄弱。在四项能力排名中，盈利能力最强，其他依次是基础能力、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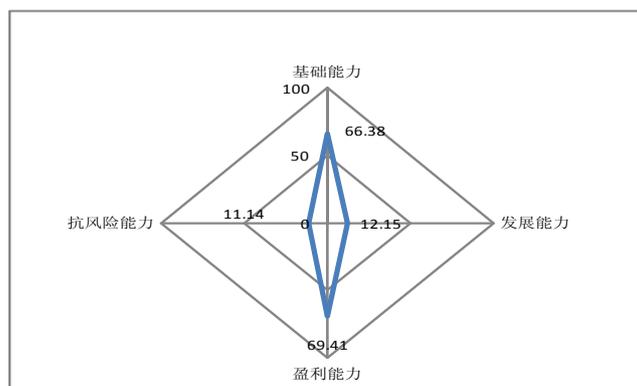


图13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竞争力分项指数雷达图

综合竞争力排在亚洲第四的是日本电报电话公司。就四项分项能力而言，其基础能力和盈利能也相对更强，而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则相对薄弱。四项能力指标中，盈利能力得分最高，其次是基础能力、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综合竞争力排在亚洲第五的是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就四项分项能力而言，其基础能力和盈利能也相对更强，而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则相对薄弱。四项能力指标中，盈利能力得分最高，其他依次是基础能力、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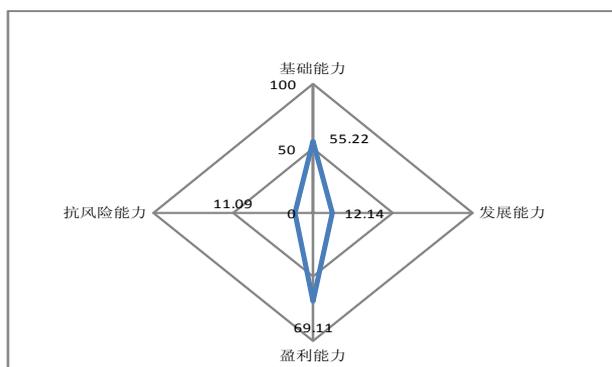


图14 日本电报电话公司竞争力分项指数雷达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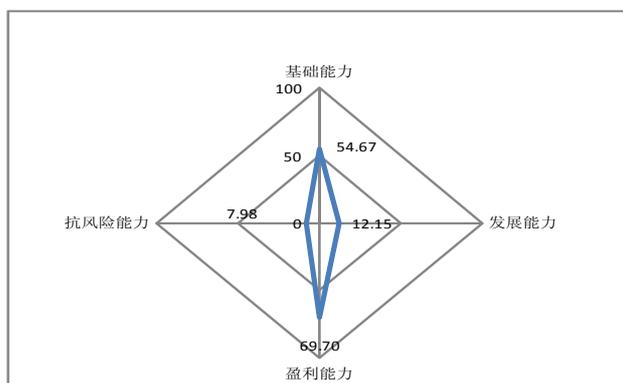


图15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竞争力分项指标雷达图

总起来看，亚洲企业综合竞争力前十名的企业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都具有较强的基础能力和盈利能力，而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这说明亚洲企业仍是成长中的企业，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待进一步发展。

从综合能力前300名的排名结果看，决定亚洲企业竞争力排名主要在于企业的基础能力和盈利能力，而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对综合排名的贡献较小，特别是抗风险能力整体较弱。这说明，亚洲企业在基础能力方面占优，在盈利能力方面整体表现较好。与此同时，也说明亚洲企业在发展能力、抗风险能力两个方面整体表现相对较差。

从前300名综合竞争力排名来看，中国公司表现优异，共有42家企业榜上有名，其中在前10家中占据2位；中国香港公司也表现不俗，共有19家企业进入前300名，其中在前10家中占据1位；中国台湾公司有15家企业进入前300名。

责任编辑：晨乔

服务全球化趋势及中国选择

姚战琪 夏杰长

摘要：改革开放后，中国服务业国际化指数显著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逐渐向服务业集聚，非传统服务业利用外资快速增长，同时，中国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服务业外商投资规模和占比保持较快增长。在服务全球化进程中，由于中国服务业发展薄弱、全球化战略缺位以及经验缺乏使中国企业面临较多挑战，“走出去”成为中国企业适应服务全球化的必然选择。政府应加强对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总体规划和政策指导，企业应发挥比较优势，优化对外投资动机，培养适应国际化要求的复合型人才。

关键词：服务全球化 全球化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 非传统服务业

作者简介：姚战琪，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服务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服务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一、中国参与服务全球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目前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渐加快，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近百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历经了商品全球化时期、制造全球化时期、服务全球化时期（江小涓，2008；林航，2009），在服务全球化时代，资本、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推动了服务全球化的进程，跨国公司通过组建全球一体化的生产组织体系，不但在纵向产业之间的企业内分配全球分工链条，而且在不同国家企业之间展现横向产业分工，跨国公司成为推动全球贸易的主导力量。那么，中国参与服务全球化的程度到底如何？中国服务全球化相对于制造业全球化差距到底有多大？并且这种差距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以及服务业长期的发展滞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趋势有何变化？

(一) 服务业外商投资增长较快，推动中国服务业国际化指数显著提高

我们通过测算服务业国际化指数来衡量中国服务业国际化和服务全球化程度，即结合中国在全球服务业发展中的相对地位和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测算中国服务业参与服务全球化的程度。我们通过以下指标测算中国服务国际化指数和制造业国际化指数：

$$\text{服务（制造业）贸易国际化指标} = [\text{服务（制造业）贸易额} / \text{贸易总额}] / [\text{服务业（制造业）GDP} / \text{总量GDP}]$$

$$\text{服务业（制造业）外商投资国际化指标} = [\text{服务业（制造业）FDI} / \text{总量FDI}] / [\text{服务业（制造业）GDP} / \text{总量GDP}]$$

根据笔者的测算，可以发现1983-2011年中国服务贸易国际化指数的均值仅为0.29，而服务业外商投资国际化指数均值达1.02（见图1）^①，服务业外商投资国际化指数远远大于服务贸易国际化指数，虽然中国服务贸易增长较快，但服务贸易国际化指数较低。这表明服务业外商投资占中国外商投资总额的比重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大体相当，而服务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大大低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我们认为，虽然服务业外商投资国际化指数略大于1，并不表明中国外商投资全球化程度已经很高，只是相对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服务外商投资的份额与其大体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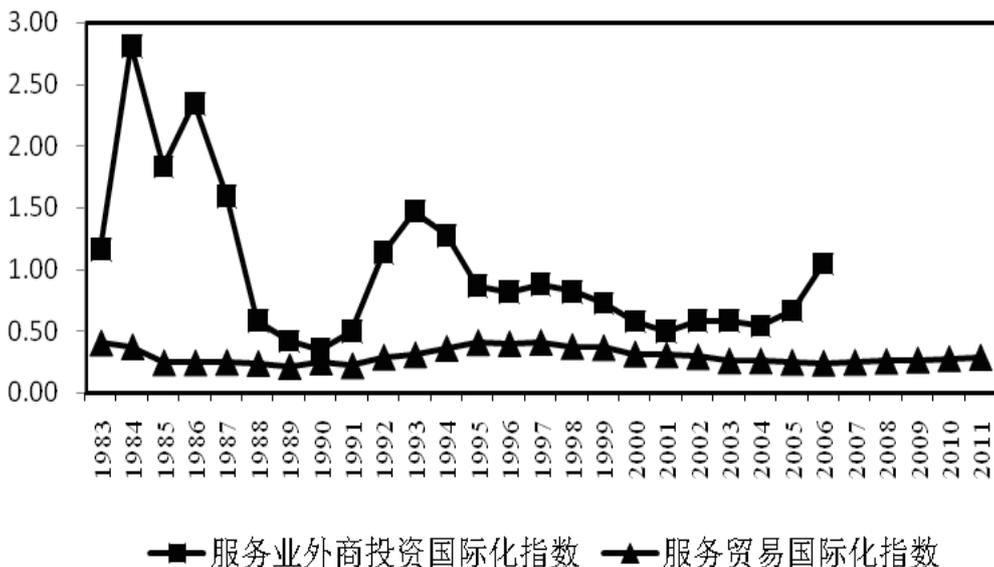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服务业国际化指数对比

① 为了保持数据的连续性，本文使用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和总量FDI均为合同利用外资额，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和总量FDI为实际外资额，同时，《中国统计年鉴》不提供2007年及该年后中国合同利用外资额，因此本文仅计算1983-2006年服务业外商投资国际化指数。

（二）制造业国际化指数远大于服务业

根据笔者的一项研究，1983-2011年制造业贸易国际化指数均值为2.94左右，服务业贸易国际化指数均值远远小于制造业（见图2）。虽然服务业外商投资国际化指数远远大于服务贸易国际化指数，但是服务业外商投资国际化指数低于制造业，1983-2011年制造业外商投资国际化指数均值为2.46，而服务业外商投资国际化指数均值为1.02。因此，与制造业相比中国服务业参与国际化的程度较低，这与中国制造业已深入地参与全球分工以及制造业已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的发展事实完全相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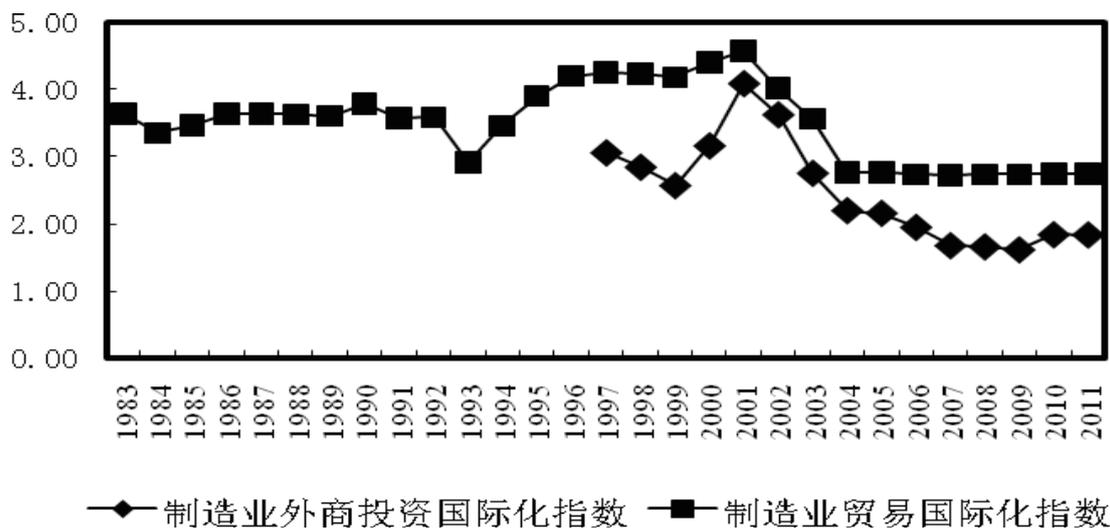


图2 中国制造业国际化指数对比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逐渐向服务业集聚，已突破了传统的对外投资动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制造全球化逐渐向服务全球化转变，历经过渡期以后，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进入服务全球化时期。在服务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成为全球贸易的主导力量，服务外包成为当前服务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涉足服务行业的大量知名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离岸中心、服务交付中心或子公司多种形式在内的运营机构以开拓中国市场。同时，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进一步加快。

1. 服务业对外投资是中国服务业进一步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迫切需要。当前中国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艰巨任务，国内资源相对短缺，迫切需要企业“走出去”，优化投资产业结构，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带动国内信息、证券、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提高中国服务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 服务业对外投资是提升中国服务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最大优势是成本优势，但国内劳动力成本已开始上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内服务业竞争优势，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扩大生产规模，能有效降低成本，服务业企业经营国

际化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3. 服务业对外投资是顺应服务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服务业对外投资能拓展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

(四) 外商投资在中国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投资占比增速较快

表 1 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在第三产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 单位：%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占比	占比	占比	占比
2006年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48.71	19.03	20.74	9
	内资	47.44	19.56	21.36	8.94
	港澳台商投资	68.51	11.78	11.81	7.91
	外商投资	65.05	10.82	11.89	12.24
2007年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47.26	19.4	21.16	9.34
	内资	45.84	20.08	21.8	9.22
	港澳台商投资	66.52	11.08	13.7	8.7
	外商投资	64.52	10.29	11.87	13.32
2008年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45.98	19.75	21.18	9.69
	内资	44.7	20.45	21.76	9.44
	港澳台商投资	64.89	9.66	13.32	12.12
	外商投资	62.27	10.43	13.11	14.19
2009年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43.41	20.58	22.56	9.39
	内资	42.65	21.03	23.01	9.04
	港澳台商投资	60.33	12.36	12.72	14.58
	外商投资	54.85	11.49	15.56	18.09
2010年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43.09	20.45	22.91	9.67
	内资	42.32	20.91	23.37	9.33
	港澳台商投资	61.15	10.93	12.12	15.8
	外商投资	54.55	11.8	15.9	17.74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第三产业统计资料汇编》历年相关数据计算。

1. 外商投资在东部地区占比最高，高于其他地区。从第三产业对外开放的区域分布角度看，2010年，服务业外商投资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占比分别为54.55 %、11.8 %、15.9 %、17.74%（见表1）。外商投资在东部地区占比最高，这

与中国东部地区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完善的投融资体系、多元化的产业链和便捷的基础设施密切相关。

2. 外商投资虽然集中于东部地区，但服务业外商投资在东部地区占比逐渐降低，而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占比不断提升。东部地区吸收的外商投资在第三产业外商投资总额中的占比不断下降，由2006年的65.05%下降到2010年的54.5%；外商投资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占比分别由2006年的12%、11%、12%提升到2010年的18%、12%、16%。外商投资在东北地区 and 中部地区投资占比增速较快，表明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进入不断调整期，中国出台的服务业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具有积极作用，明显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二、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服务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一）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逐年增加，仍以传统服务业为主

从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规模角度看，近年来服务业对外投资迅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服务贸易出口。2005年服务业对外投资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已开始超过50%，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逐年增加，目前服务业对外投资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从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结构看，仍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传统服务业为主，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所占比重相对较高，而这些对外投资的主要服务行业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带动程度较弱。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规模和结构有显著变化，金融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迅速增长，所占份额不断攀升，从2010年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角度看，金融业占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比重为12.5%，对外投资金额为86.3亿美元，低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后者对外投资比重和金额分别为44%和302.8亿美元；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对外投资比重和金额分别为9.8%、67.3亿美元，8.2%、56.6亿美元，2.3%、16.1亿美元，0.7%、5.1亿美元，0.5%、3.2亿美元，0.3%、2.2亿美元。

（二）服务贸易逆差较大，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不平衡

自1992年以后中国服务贸易处于逆差状态，并且逆差绝对额较大。在2004年时出现1982年以来的逆差最大值，当年服务贸易逆差额为95.5亿美元，该年后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有所减少，但2008年后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迅猛增长，根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2011年服务贸易逆差额达到549.2亿美元，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行业主要集中在运输服务、旅游和保险服务以及专有权利使用和特许费等领域。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

1. 对中国服务贸易行业结构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服务贸易失衡现象较明显。旅游、

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业是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主体（石占星，2009），通讯服务、建筑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咨询服务在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中的份额次之，而金融、保险、广告及宣传、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所占份额极小，在中国历年服务业贸易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最少和出口额最小的产业是电影和音像业。服务贸易行业进口结构与出口结构基本相似，运输、旅游业仍是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的主导产业，电影及音像业在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最小。

2. 对2000-2011年期间中国服务贸易分类结构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中，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以绝对优势位于出口首位，虽然其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处于下降趋势，但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仍超过50%。从中国服务贸易进口角度进行分析，服务贸易进口份额最大的产业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其次是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所占份额最小。

3. 在2000-2011年期间，在中国服务贸易十二大行业中，仅有个别行业表现出较强的产业间贸易发展态势（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行业），其余十大产业表现明显的产业内贸易，这表明中国存在明显的服务业模式结构失衡等问题。

（三）服务业外商投资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对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推动作用较弱

笔者对1983-2011年服务业外商投资、国内生产总值与服务业增加值之间进行协整分析的统计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的相关系数小于国内生产总值与服务业增加值的相关系数，即服务业外商投资对服务业增加值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远远小于国内生产总值对服务业增加值的影响（姚战琪，2012）。同时，统计结果表明，服务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统计关系的显著程度高于其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统计关系。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之间较小的相关系数表明二者之间的显著性水平较低，因此，服务业外商投资对服务业增加值的推动作用较弱是国内服务业发展滞后和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的反映。

（四）服务业外商投资集中于利润较高的非传统服务业，必须推动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由量向质的根本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对第三产业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由2005年的1240.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2895.4亿元，增长133.35%，年均增长26.67%。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过多地集中于房地产等利润较高的非传统服务业^①，在

^① 中国非传统服务业主要是指除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住宿、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服务业之外的其他服务业。

2002-2010年期间，从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看，平均有45.13%的服务业外商投资流向房地产，因此，外商投资对非传统服务业的较大需求推动了中国非传统服务业的增长。虽然入世后中国服务业吸收外资广泛分布在商业服务业、通讯服务业、建筑业、分销服务、教育服务、金融服务、社会服务、旅游服务、娱乐体育服务以及运输服务等产业，但商业服务业，特别是房地产业一直是中国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的主导产业，其实际外资金额占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平均比重将近一半（聂平香，2011）。因此，在促进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增长的同时，须不断推进利用外资由量向质的根本转变。

三、服务全球化进程中影响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分析

（一）中国服务业发展薄弱限制了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分工的深度

中国服务业发展较快，2011年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41.5%提升至2011年的43.1%。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上升速度较快，从1978年的12.2%上升到2011年的35.7%，中国第三产业吸纳就业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中国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但是，目前中国服务业发展基础较薄弱，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都远远低于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一些体制和机制性因素极大地制约了中国服务业的快速和持续发展，当前中国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时遇到较多挑战，因此迫切需要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分工与合作的深度，改变和调整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另外，中国服务业在参与全球化分工体系进程中，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商投资仍割裂了中国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产业关联，该地区仍处于较典型的以外资推动为主的发展模式，即以低成本加工制造业为主要特征的“两头在外”发展模式导致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度被削弱，从而造成该地区产业链的延伸尤其是向当地服务业增值部分的延伸受阻。

（二）中国多数企业全球化战略缺位使得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较多风险

当前，在欧债问题仍未解决和全球经济发展前景依然难测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呈现强势增长势头，虽然中国企业全球化投资规模快速增加，但海外资产存量及影响仍然有限，中国企业仍未形成全球化的制胜之道。获取高端技术与全球性品牌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一项重要目标，正是中国企业对技术升级和品牌突破的强烈需求推动了对欧美发达地区企业的并购，但是中国大部分企业并未充分适应服务全球化的角色升级，从而并购目标不明确。主要是由于中国企业将并购目标主要聚焦于价格低廉的被收购企业，限制了正确并购目标的筛选范围；不擅长充分利用目标地区成熟的第三方机构，造成并购信息获取渠道狭窄；全球化战略缺位使中国部分企业尚未形成与“有的放矢”的主动性并购目标相匹配的筛选机制。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后的整合过程中将面临三大

挑战：组织与管控体系整合、人力资源与团队整合、企业文化整合。

（三）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长期挑战制约了中国国际竞争力

中国企业依靠其自身的发展潜力和竞争优势，展开了对其他国家进行投资的浪潮，特别是部分具有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的首选之地，但是由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形势并不稳定，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导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较多风险，特别是随着海外工人的不断增多，突发事件日益增加。例如，2012年2月2日，令世界瞩目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进程中发生的重大抢劫事件，造成29名中资公司工作人员遭受在苏丹八年来的第三次被劫。而大多数发达国家为了保护该国在海外的投资利益，都制定了比较完备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例如，作为全球跨国并购超级大国——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极其频繁，对外直接投资额高居全球榜首。为了保护该国企业对外投资和规避政治风险，美国政府建立了双边“代为求偿”制度（徐旭红，2012）。因此，中国必须尽快制定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相配套的安全战略显得极为重要。

（四）中国企业经验缺乏限制了产业深入参与国际分工

中国大部分企业在“走出去”的进程中不但面临与国外企业竞争的市场环境，而且外国企业大量涌入使国内企业在国内市场面临与国外企业展开激烈竞争的格局。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进程中面临以下风险：

1. 技术缺乏。中国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业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需要较长时间积累和完善，才能提高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

2. 缺品牌。目前中国拥有国际知名品牌的企業较少，开发国际市场具有极大难度，在国际上拥有较强国际知名度的中国品牌乃至亚洲品牌较少。

3. 缺乏国际市场网络和匮乏国际营销经验。国内企业在国外开展并购的主要目标是获得国际品牌的使用权和国际市场的销售网络，而不是通过自己拓宽市场网络。

4. 缺乏熟悉国际市场、了解市场行情、掌握国际经验、熟悉国际规则的人才。国内大多数企业最缺乏的不是资本和市场，而是国际化人才。尽管中国政府加大了企业“走出去”的推动力度，但是许多扶持政策需要不断完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没有明确的行业导向和产业政策，缺乏企业最为需要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审批管制政策和外汇管制政策需要不断补充和完善。

5.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佳，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并存。中国大多数企业由于缺乏核心竞争力导致在国际规则和标准竞争中不占有利地位。

四、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是适应服务全球化趋势的现实选择

100多年的国际分工引发了商品全球化、制造全球化和服务全球化三次全球化的浪潮，“走出去”也成为中国众多企业适应服务全球化趋势的必然选择。目前，服务业已经成为对外投资的主流，全球对外投资的天平已经显著地向第三产业倾斜。当前，尽管服务业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对外投资的主流，但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从全球范围角度看，服务业“走出去”呈现以下趋势：（1）服务业“走出去”面临的重大挑战应作为政府制定“出口促进”政策和措施的主要依据，政府提供国际市场营销方面的服务和信息是促进服务业“走出去”的最有效措施。（2）服务业“走出去”具有吸纳高层次人才的巨大潜力，特别是与商务相关的服务业对人才的素质要求较高，因此推动服务业“走出去”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产业结构具有积极作用。（3）直接面对国外客户是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重要服务方式。服务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服务的非物质性以及客户与服务商的密切接触的显著特征，决定了服务供应商一般采取直接提供或出口等经营方式向需求者提供服务。（4）中国企业“走出去”是突破当前贸易壁垒和缓解本币升值压力的有效手段。企业“走出去”能降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降低对外贸易顺差，改善与贸易伙伴国的经贸关系。（5）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是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有效途径。即中国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便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和研究机构聚集区进行研究与开发性投资，通过利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获取该国先进技术。（6）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能够改变出口产品的结构和方式，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增强国际竞争能力。（7）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助于稳定矿产资源的供应渠道和价格水平。

进入“十二五”时期，中国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利用外资水平提升，进出口总额位居全球第二位，境外投资明显加快，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中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引导国内各类企业有序地开展境外的投资合作，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深化沿海开放、扩大内陆开放以及加快沿边开放。同时，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在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同时，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走出去”是中国企业利用互利互赢的战略内容，“走出去”有利于中国企业更贴近外部市场，有利于快速促进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在全球范围内吸纳高素质人才，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

五、服务全球化背景下增强中国竞争力的重大举措

（一）增强中国服务业竞争力是推动服务贸易良性发展的根本举措

近年来中国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较快，但是由于现代服务业对人员素质要求较高，而且多属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在计算机信息服务、技术咨询、专有权利和电影音像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业上则起步晚，发展慢，水平低，因此必须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和谐发展。目前中国应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仍不足，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符合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需要，将有力地推动中国产业优化升级。生产性服务业应该成为发展中国现代服务业的重中之重，这一点已得到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普遍认可，各地应高度重视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

（二）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对外开放，引导外商投资中国高技术服务业

目前，中国高技术服务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可在信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知识服务业等技术含量较高的领域，鼓励外商扩大在中国的技术扩散，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加强其与国内经销商和下游企业的产业关联。另外，引进国际先进的设计、物流、研发、营销等生产环节的服务业，提高这些领域的服务水平，为中国整体制造业的升级创造条件（刘绍坚，2008）。扩大中国高技术服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承接境外高端服务业转移，不断完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引导外商投资中国高技术服务业。

（三）大力推动服务业对外投资，优化对外投资动机

根据《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逐年显著增加，服务业外商投资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服务业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是获取战略性资源，以战略性资源为主的投资动机推动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长期稳定发展，缓解了国内资源的约束等问题。但是从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发展外商投资的微观动机角度来看，应着重以整合全球资源、获得先进技术和优化自身结构为根本动机，从而推动中国服务业和其他产业稳定快速增长。例如在科技资源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设立高科技企业和研发机构，开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四）加大对服务业基础设施及专有技术与人才的投入，培育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

首先，加强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从总体上提高中国

各地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其次，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突破人才瓶颈。当前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进程中存在严重的人才制约等限制因素，因此需要相关各方建立起相对应的人才培育机制。人才培养短板成为制约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例如，同为亚洲金砖四国之一的印度的人才的国际化程度要远高于中国。应重视国际化人才队伍培养，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培养一批国际化人才。

（五）完善中国对外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

目前中国对外投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已成为制约中国对外投资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政府应尽快建立并完善中国对外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简化对外投资过于繁杂的审批手续，取消多头管理制度，加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贸易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尽快出台法律性文件，并以其取代现有的政策性文件，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纳入法制化轨道，使中国对外投资有法可依，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江小涓，2008，《服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理论分析》，《经济研究》第2期。
2. 林航，2009，《服务全球化时代：一个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及其应用》，《国际服务贸易评论》第3期。
3. 刘绍坚，2008，《中国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思考和政策建议》，《宏观经济研究》第9期。
4. 聂平香，2012，《入世十周年中国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评析及对策》，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http://www.caitec.org.cn/c/cn/news/2012-04/06/news_3209.html，4月6日。
5. 石占星，2009，《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天津商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6. 徐旭红，2012，《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长期挑战》，《中国企业报》2月7日。
7. 姚战琪，2012，《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财贸经济》第6期。

责任编辑：晨乔

· 国际贸易 ·

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发展现状 及趋势

王晓红 李珏 王海

摘要： 金融服务外包是目前全球服务外包规模最大的领域。本文界定了金融服务外包的含义，着重研究了我国金融服务外包的市场空间、接包商与发包商特点、区域布局等基本特点与发展态势，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加快发展我国金融服务外包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 金融服务外包 金融后台服务 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 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全球化》杂志副主编；

李珏，北京工商大学硕士研究生；

王海，北京工商大学硕士研究生。

根据2005年由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及国际清算银行（BIS）组织联合论坛上发表的《金融服务外包》（Outsourcing in Financial Services）报告，将金融业务外包定义为“受监管实体持续地利用外包服务商（为集团内的附属实体或集团以外的实体）来完成以前由自身承担的业务活动。金融服务外包可以是将某项业务（或业务的一部分）从受监管实体转交给服务商操作，或由服务商进一步转移给另一服务商（称为转包）”。金融服务外包通常是金融后台服务外包。金融后台服务则指与金融机构直接经营活动相对分离，并为前台业务提供支撑的功能模块和业务部门。如：数据中心、清算中心、银行卡中心、研发中心、呼叫中心、灾备中心、培训中心、档案管理中心、客服中心等。金融后台服务支持体系具有科技含量高、人才密集、吸纳就业量大、技术保障能力强等特点，日渐成为金融机构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金融危机之后，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的辅助性后台业务，如：数据处理、资金清算、应用开发、银行卡业务、呼叫服务等成为新

的外包热点。其实质在于，金融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将资源集中于相对优势领域，重组价值链、优化资源配置、增强核心竞争力，增强持续发展能力^①。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近年来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增长速度快、市场潜力大、吸纳就业能力强，是提高金融服务信息化、专业化、标准化、国际化的重要途径。

一、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市场空间巨大

（一）我国金融服务外包未来增速将超过全球水平

与印度相比，虽然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未来潜力十分巨大。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深化，金融业竞争日益加剧，都将带来金融外包的发展。毕马威调查报告显示，预计未来五年，我国服务外包市场将保持约26%的年复合增长率。麦肯锡研究显示，我国BPO市场规模超过200亿元，增长速度超过20%，国内金融BPO市场以超过23%的速度成长。

表1 2011-2016我国金融服务外包情况（百万美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我国金融服务外包 ITO	3506.1	4036.4	4545.3	5120.0	5800.7	6584.3
我国金融服务外包BPO	803.4	964.6	1126.7	1328.4	1580.5	1887.8

数据来源：IDC。

表2 2011-2016全球金融服务外包情况（10亿美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全球银行服务外包ITO	62.7	65.9	69.8	74.0	78.6	
全球金融服务外包BPO	21.3	22.3	23.7	25	26.8	28.7

数据来源：IDC。

- ① 金融服务外包主要分为：（1）信息技术外包（ITO），指金融机构将其IT系统的全部或部分外包给专业信息技术服务公司，以长期合同的方式委托信息技术服务商向金融机构提供部分或全部的信息功能。主要包括：软件研发、信息系统开发和维护、信息技术设备维护、网络构建、网络管理、数据中心营运、备份和灾难恢复、信息技术培训、通信支持等。（2）业务流程外包（BPO），指金融机构将商务流程中的部分或全部非核心流程业务委托专业服务提供商操作，从而提高业务流程自动化的能力，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主要包括：会计服务、票据服务、银行卡业务、人力资源管理、呼叫中心、定损理赔、后勤保障等。（3）知识流程外包（KPO），指金融机构将金融后台服务外包的高端服务，涉及专业技能的知识密集型业务流程外包。主要包括：金融研发、金融咨询等。

从表1可以看出, 2012年我国金融服务外包ITO和BPO分别比2011年增长15%和20%, 预计2016年将分别达到65.84亿美元和18.87亿美元, 分别相当于2011年的1.88倍和2.35倍。从表2可以看出, 2012年全球银行外包ITO和金融外包BPO分别比2011年增长5%和0.47%, 预计2015年分别达到786亿美元和268亿美元, 分别相当于2011年1.25倍和1.26倍。

(二) 我国金融业快速成长将释放大量后台服务

目前, 我国拥有金融资产8.1万亿, 规模超过其他新兴经济体。2011年我国金融机构4293家, 其中, 银行3800家、保险公司152家、证券公司341家。2006-2008年期间, 我国金融业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超过30%, 我国银行业收入年复合增长率36%, 高于美国银行业(同期美国银行业年复合增长率-1.5%)。为了降低成本, 很多金融机构都在寻求专业服务外包。根据海辉软件资料显示, 企业如选择外包服务, 通常可节省30%—65%的成本开支和管理成本。

(三) 金融业前后台业务分离趋势为金融外包发展创造需求

当前, 我国金融业呈现出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前台业务和后台业务、标准流程业务和非标准流程业务加快分离的趋势, 原有自主运营的产业链正逐渐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国内金融机构开始更多关注自身核心业务的发展创新和整体经营效益的提升, 逐步形成了金融机构专注核心能力、服务供应商提供其他专业服务的金融产业链生态环境。以数据中心、清算中心、银行卡中心、研发中心为主的金融后台服务与金融机构前台经营分离, 正成为金融业未来发展的趋势。

(四) 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为金融外包发展创造条件

IT技术、互联网技术的空前发展, 尤其是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服务外包提供了新的增长空间, 使金融业务打破了空间、地域的限制, 为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服务外包提供了技术基础。金融业信息化的广泛应用, 金融机构信息系统、流程改进等, 为金融服务外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市场机遇。此外, 基于移动通讯服务和3G服务也将为金融外包带来新的机会。如工、农、中、建等银行都开通了手机银行。通过手机可以查询银行卡的账户、信用卡账单、还款、转账、买基金、电话缴费等服务, 这些新的业务增长点为外包业务创造了新的需求。同时, 随着客户对新产品、新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 推动了金融机构的产品和渠道创新, 加速了金融机构外包的进程。

二、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发包市场状况

(一) 我国金融服务外包以境内发包商为主

近年来, 境内金融外包市场逐步成熟, 发包主体涵盖了银行、保险、证券、财务公司、信托等金融业各个领域, 其中主要集中在银行业和保险业。表3显示了一些金融机构

外包项目的情况。

表3 部分国内金融机构外包项目

编号	金融机构	外包项目	服务供应商
1	国家开发银行	核心IT系统集成	文思信息
		系统集成与开发	神州数码
2	中国光大银行	应用软件开发及维护	软通动力
		IT咨询	
3	招商银行	系统开发、升级及维护	文思信息
4	中国民生银行	银行卡业务	银联数据
5	中国人寿	文档影像数据处理	浙大网新
6	中意人寿	寿险理赔解决方案	华道数据
7	安邦保险	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软通动力
8	英大信托	系统开发及实施、IT规划	软通动力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外包服务供应商网站的信息整理而得。

（二）银行业发包状况

从我国银行的不同类型看，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据较大的后台服务外包比例，其次是国家开发银行和四大国有银行。从外包业务类型看，银行外包业务主要集中在ITO和BPO领域，KPO涉及范围还比较窄。银行ITO业务主要包括软件开发、银行信息系统管理、系统备份、灾难恢复、应用系统开发和维护等；银行BPO业务主要涉及信用卡外包、财务外包、人力资源外包、后勤保障外包、呼叫中心外包等。银行KPO业务目前主要包括数据信息分析、研发外包等。

（三）保险业发包状况

我国保险业务增长速度较快，未来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市场，将会释放巨大的外包需求。目前保险业外包以ITO为主，BPO、KPO业务将伴随着保险业的迅速发展而得到广泛应用。保险业的IT，主要集中在保单出单系统、财务系统、风险管理系统等IT系统的建设规划。保险BPO业务主要包括新契约录入、保单打印、保单送达、定损、理赔等非核心业务，核保等核心业务并未选择外包。保险KPO业务主要涵盖保险精算、保费调整等。

（四）证券业发包状况

伴随证券业的快速发展和证券市场的激烈竞争，特别是中小证券公司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会选择将越来越多的后台业务外包给专业服务供应商来处理，证券业外包将是未来金融服务外包的一个发展趋势。现阶段，我国证券业外包主要涉及ITO

和BPO, KPO业务较少, 具体内容包括, 集中交易系统等软件系统的开发和维护、呼叫中心、结算、各类增值服务以及业务培训、证券托管服务等外包。

三、我国金融服务外包接包市场状况

(一) 承接金融服务外包以在岸为主, 离岸为辅

表4 2010年我国服务外包企业最佳实践前20强

排名	企业名称	业务类型
1	文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在岸、离岸相当
2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离岸为主
3	海辉软件(国际)集团	离岸为主
4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在岸、离岸相当
5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离岸为主
6	东南融通	在岸为主
7	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离岸为主
8	华道数据	在岸为主
9	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离岸为主
10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在岸为主
11	索迪斯	在岸为主
12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在岸为主
13	新宇软件(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	在岸为主
14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岸为主
15	成都颠峰软件有限公司	在岸为主
16	北京华盛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岸为主
17	大展集团	离岸为主
18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在岸为主
19	中讯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离岸为主
20	大庆市华拓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在岸为主

数据来源: 中国外包网。

1. 在岸市场占主导地位。目前国内金融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内客户,

这与印度外包市场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2010年金融BPO市场规模在岸与离岸之比为10:1，国内金融业IT合同有86%是本地发包商。在前20家国内金融服务提供商中，只有6-7家公司以离岸外包为主，其余绝大部分主要承接国内金融机构后台业务（表4）。

目前，我国金融外包支出约占金融业运营总支出的0.53%，而美国为1.86%，因此，在岸金融外包还有很大市场空间。随着国内金融机构关注核心业务的创新发展和整体经营效益的提升，越来越多地尝试外包。此外，与国际金融机构相比，国内金融机构信息化起点低，在金融业务流程方面仍存在人才、经验和技能缺口，也更多地采用与服务提供商的战略协作方式，这些都加快释放国内金融机构的外包需求。

2. 离岸市场逐步开拓。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加快，跨国公司金融机构转移速度加快，以及国内金融服务供应商能力的提升，未来时期，金融外包离岸业务规模将逐渐扩大。目前，我国金融服务离岸发包市场主要集中于日本、北美、西欧等发达国家，日本和美国是我国两个最大的离岸市场，其次是我国香港和我国台湾。目前日本离岸业务的80%左右是我国企业承接的。国内较具代表性的服务外包企业中，软通动力的日韩业务占65%，欧美业务占35%；大展集团的日本业务占1/3，其后依次为北美、欧洲和我国；东软对日外包业务占90%，欧美业务占10%左右。

（二）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结构以IT0为主，逐步向BPO、KPO延伸

表5 2010-2012年我国银行业IT应用细分产品投资规模

产品类别	年份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硬件投资规模（亿元）	314.9	335.5	345.1
增长率（%）	8.3	6.5	2.9
软件投资规模（亿元）	78.5	90.4	106.3
增长率（%）	15.4	15.2	17.6
服务投资规模（亿元）	275.1	348.2	440.4
增长率（%）	34.6	26.6	26.5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

从业务类型来看，金融IT0市场规模最大，业务范围最广，已遍及整个金融业；金融BPO发展速度较快，规模仅次于IT0；金融KPO将成为新的增长领域。从表5可以看出，2010-2012年，我国银行业软件和服务投资规模合计分别为：353.6亿元、438.6亿元、546.7亿元，均高于硬件投资。从图1可以看出，2010-2012年我国银行业IT应用市场结

构中，服务、软件市场所占比重为：52.9%、56.7%、61.3%，高于硬件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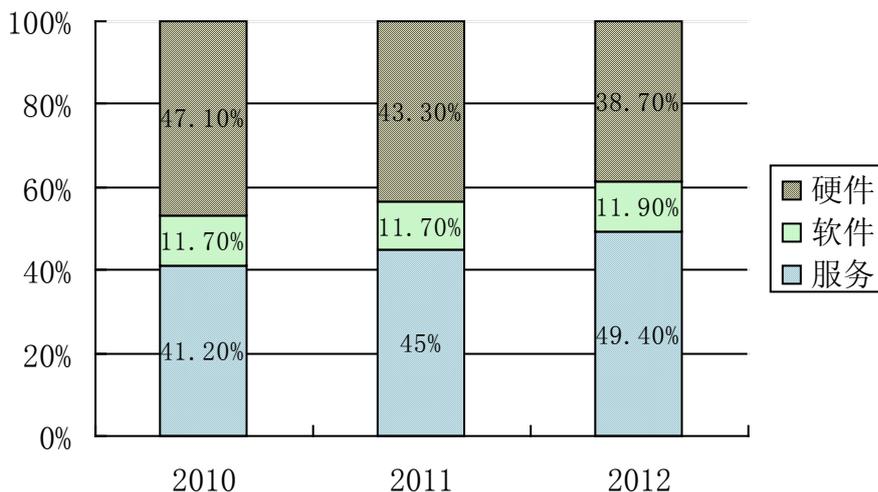


图1 2010-2012年我国银行业IT应用市场结构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

（三）我国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发展状况

1. 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呈现金字塔结构。目前，我国金融服务外包企业主要有三种类型：（1）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公司，如：埃森哲、HP、IBM、FDC、TCS、凯捷、Unisys、Infosys、Wipro、塔塔、萨蒂扬等；（2）本土金融服务外包公司，如万国数据、华道数据、银联数据、文思创新、浙大网新、东软、博彦科技、中软国际、海辉软件、软通动力、东南融通、中讯软件等；（3）国内外金融机构的自建中心。由此形成了金字塔型结构，最上端以国际巨头为主，中间层次则以我国本土企业为主，第三层次则是众多的中小型国内企业为主。

2. 跨国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示范效应明显。随着外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进入我国速度加快，将带来国际服务提供商的跟进。跨国服务提供商通常具有很强的业务流程咨询能力、IT系统实施能力，外包项目以涵盖复杂环节的整体流程外包为主，发包商与接包商形成了长期稳固的战略合作关系。跨国服务提供商带来了成熟的外包运营模式和管理理念，对本土服务商产生示范效应，提升了整体服务质量。2003年11月，我国光大银行将管理会计系统的开发外包给联想IT服务，引进全球ERP市场占比最高的SAP公司产品，功能包括总账、应收应付、资产管理、成本中心会计、内部订单、利润中心会计、薪资管理等，实现了财务流程标准化和成本管理。2004年初，光大银行又将信用卡外包给美国第一资讯公司，服务内容包括：信用卡机具维护、市场营销策划、个人资信调查、制

卡、人员招聘、培训考核、透支催收等，开创了国内信用卡系统外包开发的先河。

3. 本土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市场开拓能力增强。一方面，以文思创新、软通动力、博朗软件等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明显增强。文思创新2011年第四季度大中华区主营业务净营收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46.5%；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主营业务净营收占公司总主营业务净营收比例分别为36%、12.6%和3.3%。软通动力国内业务占55%，海外业务占45%左右。他们依靠同欧美等跨国IT企业的合作，获得了产品本地化、软件测试等离岸业务，从而获得更多的欧美离岸外包机会。从企业文化、语言能力、服务交付标准等各个方面，积极同欧美市场对接，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欧美金融机构认可。从市场前景来看，美国企业倾向多国外包的动机，为我国供应商进军欧美市场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以华道数据、万国数据等为代表的一批企业，通过专注国内市场不断充实自身的竞争优势。这类供应商长期同国内金融机构保持良好合作，建立了牢固的地位与影响力。在发展国内市场的同时，将逐渐开拓海外市场，支撑企业新的成长。万国数据是国内起步最早、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专业化服务公司，是我国灾难恢复服务外包的领军企业。目前，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地运营管理多个数据中心，开创了国内银行、证券、保险外包服务先例。2007年，万国数据将市场扩展到港澳、日韩、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发展离岸数据中心业务。

表6 2010年国内部分外包服务接包商对比

		中软国际	海辉软件	文思创新	软通动力
区域覆盖	我国VS海外	69% VS 31%	13% VS 87%	45% VS 55%	56% VS 44%
行业覆盖	政府	√			√
	金融	√	√	√	√
	电信	√	√	√	√
	商业流通	√		√	√
产品覆盖	咨询	√		√	√
	解决方案	√	√	√	√
	IT服务	√	√	√	√
	BPO	√			√
收入规模	收入（百万美元）	242	146.6	211.6	197
	员工数	10940	5521	11044	9285
	人均收入（美元）	22121	26553	19160	21217

数据来源：陈昊飞，《我国IT软件与服务外包行业黄金十年》，见《我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报告》，2011年8月。

4. 金融外包价值链不断攀升。我国金融外包企业逐渐拓展价值链高端业务。如，中

讯软件公司通过长期承接日本大和证券等金融机构的外包业务，由简单编码逐步扩展到需求分析、概要设计、系统维护领域，并形成了面向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性的解决方案。从表6可以看出，一些金融服务提供商已经逐步通过服务创新提高附加值，主要表现在拥有更先进的服务理念、更多元化的服务模式、更强的交付能力，以及提供更高附加值的咨询业务。从技术等级来看，目前国内共有1719家软件与外包企业获得CMM / CMMI认证，仅次于美国，是印度获得认证企业总数的2.6倍。

四、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区域布局状况

近年来，国内各大银行、国际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设立后台服务中心，促进了金融外包快速发展。全国有17个城市提出建设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其中北京、上海、杭州、苏州、深圳、广州、大连、成都、西安、武汉、天津、济南、南京、重庆等城市发展较快，并逐步形成特色。北京、上海以承接高端金融业务和研究为主；大连、深圳、广州主要承接日、韩等国和我国香港的金融服务外包；天津、杭州、南京以承接国内金融服务外包为主；成都、重庆、西安、武汉、长沙、济南、昆山等城市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这些地区的发展经验是，政府政策大力支持，通过建设金融服务外包园区或基地，引进和培育金融外包企业，培养金融外包人才，推动金融外包快速发展。

表7 我国部分金融后台服务中心

城市	金融后台服务中心
北京	央行清算中心、中银银行卡中心、国开行/光大/农行数据中心、建行北京生产基地、建总资金清算系统灾难备份中心、人行征信开发生产基地、工行呼叫中心、国寿/阳光保险研发中心、新华08综合金融信息服务平台、泰康人寿后援中心、新华人寿电话服务中心
上海	招行/兴业信用卡中心、上海银行后台中心、交行/工行/花旗/浦发/建行数据中心、中行华东信息中心、中银联信用卡运营中心、人行支付系统中心、农总数据处理中心和同城数据备份中心、平安/国寿/国华人寿/华泰/大地保险后援中心
深圳	大太平洋产险电话销售中心、招商银行呼叫中心、交行后台中心、平安保险数据中心、中行（香港）微缩处理中心、渣打后勤中心、南洋商业银行
广州	汇丰环球运营业务中心、花旗客户服务及运营中心、东亚电子资料处理、人行广州清算中心、建行集约化中心

佛山	友邦保险亚洲后援中心、人保数据中心、电子商务营销中心和呼叫中心、汇丰银行环球营运中心
天津	渣打天津科营中心
昆山	中银商务华东中心
成都	平安/泰康人寿/太保后援服务中心、工行电子银行中心、招行/交行信用卡中心、光大银行成都科技研发后台服务中心、太保IT数据容灾和后援增值服务中心、建行/农行客服中心、易方达基金后台中心、中行西南信息中心
西安	北京银行灾备中心
重庆	农行西南信用卡中心
武汉	招行信用卡武汉呼叫中心、央行金融开发中心、交行信用卡中心和客服中心、银联商务后台中心、建行/国开行/民生银行/泰康人寿/长江证券/天风证券/农行后台中心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外包服务供应商网站的信息整理而得

五、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规模小、竞争力弱

目前，我国在金融服务外包方面落后印度大约5—10年，表现在金融服务外包提供商的人员规模、营业规模等方面。

从人员规模来看，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平均人员规模200人左右，超过1000人的企业仅220家，占企业总数的2.5%，最大的东软集团拥有员工1.6万名。而IBM、HP、埃森哲等达到上万人、几十万人的规模，如，IBM拥有20万名员工。印度软件外包企业3000多家，从业人员50多万人，其中前10家服务外包企业人员规模在1万人以上，Infosys拥有员工数量超过12万人。

从营业收入来看，2010年度评选的我国服务外包企业最佳实践50强中，服务外包企业最高营业收入不超过50亿元；而IBM、HP等营业收入均超过200亿美元。排名靠前的印度金融IT0外包企业年营业收入为30—40亿美元，Infosys、Wipro等年收入超过50亿美元^①。

图2可以看出，2010年东软集团、文思创新、中软国际、浙大网新和海隆软件等国内领

^① 数据来源：中国外包网。我国服务外包企业最佳实践五十强白皮书，2010年。

先软件外包企业与印度软件外包龙头企业Infosys的收入比较，可见营业收入差距较大。



图2 Infosys与我国软件外包领先企业收入比较

资料来源：国联证券，《我国外包行业深度研究报告》，2011年，P23。

（二）以承接低端业务为主

总体上看，国内金融服务外包供应商目前尚不具备承接高技术含量外包业务的能力，大多业务处于价值链低端，金融ITO主要涉及软件开发与维护、硬件远程支持、应用外包等业务。目前承接的金融ITO业务主要包括：设备管理、应用系统开发、软件开发设计、灾备中心建设等业务；BPO业务主要包括：后勤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数据中心、财务中心、呼叫中心等，多数业务技术含量低、附加值较小。

（三）提供服务能力较低

从能力上来看，美国金融服务提供商主要体现在对金融买家业务转型提供战略性咨询服务等高端业务；从业务范围来看，美国金融服务提供商基本能够提供全业务的外包支持。而我国金融外包企业组织和管理尚不成熟。在服务模式上，服务提供商被动地接受任务和提供服务；在交付能力上，提供商往往不能为金融机构提供全面业务范围的外包服务，尚不具备为金融买家业务提供咨询和支持的能力，还没有出现提供全方位业务范围的金外外包提供商。此外，当前金融业尚缺乏对外包服务商进行综合管理的制度和供应商评级体系，无法有效对外包商的技术实力、经营状况、社会信誉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定。

（四）金融服务外包人才缺乏

随着金融外包的发展加快，人才匮乏已经成为制约金融服务外包发展的瓶颈。人才总量存在较大缺口，尤其是缺乏精通外语、外包行业规则，拥有丰富金融知识、计算机

技能的专业性高端人才。一些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受限于自身规模，不得不放弃一些较大的外包项目。

六、政策建议

大力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对于做大做强金融业，提高我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扩大白领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应充分利用国家服务外包有关政策，加大地方配套资金和财政支持力度。

第一，促进在岸与离岸业务融合发展。利用我国金融业的巨大市场优势，鼓励金融机构分离服务业务，扩大在岸市场、积累经验、扩大规模，延伸和拓宽境外业务渠道。支持外资金融机构发包国内企业，鼓励外资金融服务提供商承接国内业务。第二，加强金融服务外包园区（基地）建设。在税收、土地、房租、用电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完善公共设施配套，加强园区信息服务、融资担保、教育培训、市场交易、知识产权等服务平台建设。加大对平台的财政投入和减免税政策支持。发挥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的作用，扩大承接离岸金融业务的规模。第三，加快培育金融服务外包品牌企业。积极引进金融外包跨国企业、企业总部，发挥其业务渠道、产业链、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模式等优势，鼓励分包、转包业务，带动本土金融外包企业发展。鼓励大型金融企业外包业务，设立业务交付中心等，鼓励金融外包龙头企业、骨干企业海外上市。第四，建立完善金融外包监管制度。建立金融服务提供商的资格审查和信用评级制度，通过综合财务资信状况、技术能力、管理成熟度、资源规模和对行业的熟悉程度及创新能力等方面来选择和评估服务商。金融机构采购管理和项目管理部门要逐渐提高服务战略组合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提高外包管理成熟度。第五，加强金融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和引进。充分利用金融机构、金融学院等教育资源，引进国外培训机构，加强国际交流，注重培养具有较强国际沟通能力、研究能力、运营能力的中高端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 宫冠英，2011，《金融后台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探讨》，《商业时代》第6期。
2. 张淼淼，2010，《北京金融后台服务区建设发展现状与对策分析》，《时代金融》第4期。
3. 王晓红、李皓主编，《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李庭辉，2011，《加快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发展的思考》，《新金融》第7期。

责任编辑：晨乔

· 区域经济 ·

首都经济圈规划与京津冀 经济一体化

肖金成 刘保奎

摘要： 本文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打造“首都经济圈”，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设想，阐述了首都经济圈的内涵和首都圈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性，讨论了首都圈的规划范围及面临的难题，提出了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 首都圈 规划 京津冀一体化

作者简介： 肖金成：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刘保奎：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打造“首都经济圈”，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设想。所谓“首都经济圈”是指以北京为核心，以及受北京辐射带动或影响的区域。北京已经确立了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但正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世界城市需要周边地区的支撑，首都经济圈的规划和建设是北京迈向世界城市的重要空间基础，同时也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过程。

一、首都圈的内涵

首都圈，顾名思义就是以国家首都为核心的都市圈。都市圈的概念最早源于20世纪初美国政府提出的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后来在日本被广泛应用，并将其称为都市圈。它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以经济较发达的中心城市为核心，与具有一定结构、功能且内在经济联系紧密的区域所形成的高度城市化的经济地域。因此，都市圈不只是一个地域范围的概念，还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经济实体和社会实体。这种一体化，

一方面要求核心城市必须拥有强大的辐射力，另一方面要求外围地区必须具备一定的接受能力。此外，还要求都市圈的核心城市与外围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空间形态等诸多方面必须紧密联系，往往表现为彼此间高强度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

都市圈的形成一般需具备以下六个基本条件：一是都市圈内至少有一个经济发达并具有强大辐射力的核心城市；二是核心城市必须有较大的经济腹地；三是都市圈内应具备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四是都市圈内核心城市与腹地城市之间应有密切的经济联系；五是都市圈不是行政区的简单迭加，而是经济区、社会区、生态区的综合集成；六是都市圈内应有较高的城镇化水平。

与一般都市圈相比，首都圈的特殊性在于其核心城市是首都而非一般意义的大城市。首都具有一般大都市所不具备的特殊的城市功能，如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等。因此，首都圈内各城市具有更加复杂的职能联系与分工。

打造首都经济圈有利于北京充分发挥首都优势，发挥北京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利于促进首都经济圈内各城市之间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带动京津冀乃至北方地区的发展；有利于推动我国东中西和南北方的区域协调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的最终目标是将其建设成为以京津为核心，具有世界影响力和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二、首都经济圈发展的国际经验

都市圈的产生远远晚于城市的产生，它是城市地域空间形态演化的高级形式，也是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出现的一种空间现象。从世界范围来看，都市圈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都市圈则是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伴随着欧美各国城市的快速郊区化才发展起来的。

都市圈的核心城市从本质上说是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一种形式，依托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利用发达的联系渠道，可以辐射带动圈域其他城市及农村区域的一体化发展。在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各种要素在核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是最基本的前提。形成初期，核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占主导地位，区域内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全部朝向核心城市，极化效应明显；随着都市圈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升级，金融等高端服务业逐步向核心城市集聚以获得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推动制造业由中心向外不断扩散，扩散效应开始发挥作用。而核心城市的产业“集聚—扩散—再集聚—再扩散”空间重组模式，正是都市圈的发展演化模式，即由向核心城市集聚转为向周边腹地扩展，形成圈层式空间结构。

西方发达国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其都市圈的发展也日益成熟。伦敦1800年就形成了由核心城市和城市郊区所组成的都市圈，圈域半径约13公里，总面积约200多

平方公里，总人口达260万人，到1971年形成了由内伦敦、大伦敦、标准大城市劳务区和伦敦都市圈四个圈层构成的圈域半径约40公里、总面积8382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500万的都市圈，成为英国的经济核心地区。1990年，法国首都巴黎都市圈的面积已经扩展到942平方公里，人口832万，如果把巴黎市和7个郊县看作巴黎都市圈，则巴黎都市圈占法国国土面积的2.18%，容纳了法国全国人口的18.8%，聚集了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8%、就业人口的21.6%和对外贸易额的25%。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加速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形成了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为代表的三大都市圈，其中东京都市圈是由内核区、中层区、外层区组成的半径100多公里、面积3.7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成为日本经济的核心地区。

都市圈的发展一般遵循“雏形期—成长期—成型期—成熟期”的演化规律。

——雏形期。工业化初期，不断修建的铁路使孤立的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农村地域之间建立起相互联系，随着资源的不断发现和开发利用，工业成为区域与城市经济的主导。城市不断扩展，其影响力逐渐突破了行政地域的限制，出现了以城市为中心、按生产要素接近原则形成的城镇组合，广大农村成为生产要素净流出的地区。伴随交通工具由马车向有轨电车的转变，开始出现“卧城”，形成都市圈的雏形。处于雏形期的都市圈，其空间结构呈现核心—放射状，城市沿主要轴线扩展，一般不具备圈层扩展的能力，都市圈的圈层结构不甚明显（图1-a）。欧美几个发达国家，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处于这个阶段。

——成长期。随着工业化不断深化，城镇体系在工业大生产组织的作用下发生重构，城市规模继续扩展，大城市逐步形成并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放射性快速交通系统形成，城市由向中心集中转为放射状向外扩展，产业和人口向郊区转移，郊外区域性中心标志即副中心诞生，都市圈进入成长成型期。此阶段核心城市扩散作用明显，从轴向扩展为主转向圈层扩展为主，扩展面形成并不断得到强化，副中心出现，都市圈呈现出典型的核—圈层结构（图1-b）。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多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这个发展阶段，人们开始追求休闲的生活方式，都市圈表现为空间蔓延和低密度开发，尤以美国最为典型。

——成型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经济与技术的进步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城市人口膨胀、地价上涨、交通拥挤、居住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严重，城市与郊区各自的比较优势被认识，郊区的生态价值以及经济价值被发现。伴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高速公路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人们的就业范围扩大，居住与就业岗位向郊区分散与转移，都市圈进入全面发育时期。中心城市发生结构和功能的重组，重化工业和制造业发生外移，在新的产业区集聚，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副中心逐渐强大并形成新的圈域，空间一体化联系加强，并出现多个生长点，都市圈

空间开始成型（图1-c）。

——成熟期。1980年代以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信息通讯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走强，生产性服务业崛起。传统中心城市的作用被一种多中心的模式所取代，借助于网络型高速路网和发散式轨道交通，一种城乡交融、地域连绵的大都市空间日渐形成。都市圈空间成长进入成熟期，生长点稳定发展，都市圈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都市圈与都市圈进行联合、融合、改造，在更高层次上提升发展，都市圈发展成为城市群，表现为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图1-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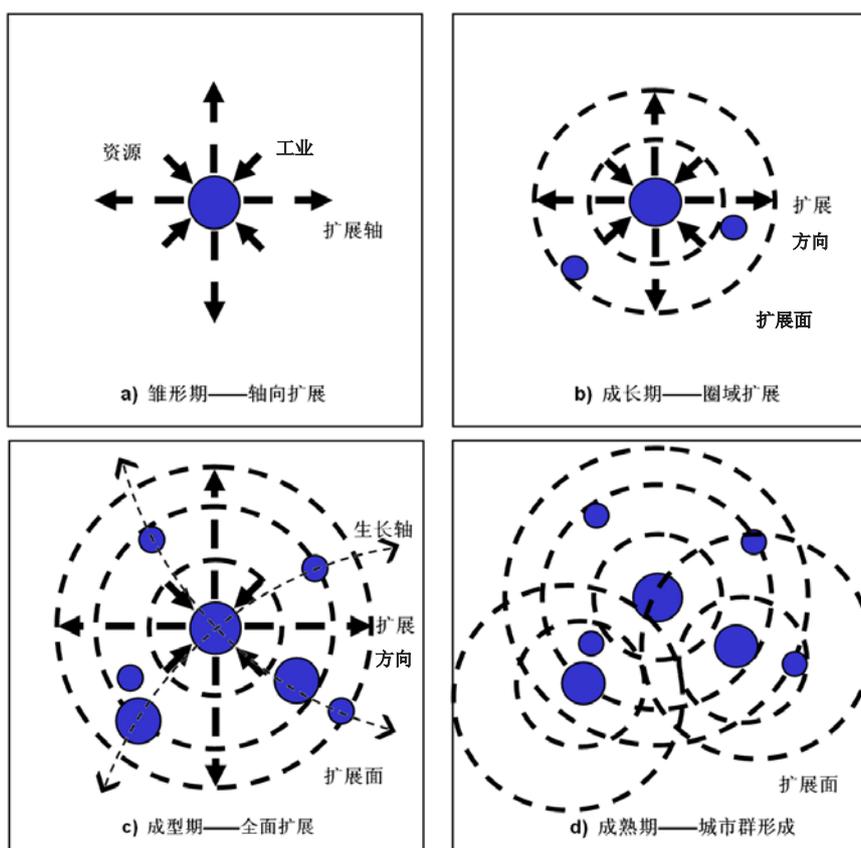


图1 都市圈空间成长过程示意图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以核心城市为龙头的都市圈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区域，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重要载体。从全球范围看，许多国家以首都为龙头，通过跨行政区域资源整合和功能协作形成“首都圈”，不仅有效缓解了首都由于功能过度集聚而带来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实现了首都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提升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而且充分发挥了首都资源的效能，辐射带动了周边区域共同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协同效应和经济势能，成为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区域。比如东京都市圈以占日本3.5%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30%以上的

银行总部、一半以上销售额超过百亿日元的大公司总部，贡献了日本经济总量的31.7%；巴黎都市圈以占法国2.18%的国土面积，贡献了30%的经济总量和25%以上的外贸额。

三、首都经济圈的空间范围

自从“十二五”提出构建首都经济圈以来，首都经济圈规划便列入议事日程。规划的前提是确定圈域范围，学者们提出了多种方案，如“1+4”方案，即北京+保定+廊坊+承德+张家口；“1+14”方案，即北京+14个河北省14个相邻县；“1+1+9”方案，即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廊坊+承德+张家口+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和京津冀都市圈的范围基本相同。得到认同的方案是“1+3+6”，即以首都北京为核心，包括天津市的武清区、宝坻区、蓟县3个区县，加河北张家口、承德、廊坊、保定、唐山、秦皇岛6个地级市。区域面积14.5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1.52%。其中北京1.64万平方公里，张家口、承德均在3.50万平方公里以上，保定约为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5617万人，约占全国的4.19%；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25568亿元，占全国的6.37%；人均GDP为3.57万元；三次产业比重为5.9:36.7:57.5，为“三、二、一”模式。

10个市县中，北京的地区生产总值位居首位，占首都圈总产值的55.2%，其次是唐山和保定，分别为17.48%和8.02%。从人均GDP水平来看，北京人均GDP高达7.59万元，是唐山的1.28倍、保定的4.12倍。在产业发展方面，圈内市县多以“二、三、一”产业结构为主，仅北京、蓟县、秦皇岛三个地区为“三、二、一”产业结构，其中，北京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达到71.5%，远远高于圈内其他城市，体现了北京非常突出的服务职能。



图2 首都经济圈范围示意图

四、首都经济圈规划遇到的难题

由于天然的地理毗邻关系，京津冀长期以来被寄予一体化发展的厚望，但由于经济

发展水平差异及行政区划分割等多种原因，导致三地之间长期处于不平衡发展的状态。按上述“1+3+6”的区域范围进行规划，将面临许多难题。

（一）北京市和天津市的关系难处理

国家对北京市和天津市的功能定位分别是：北京市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天津市是中国北方地区的经济中心。北京市突出行政、文化、信息、科技等功能，天津市强调经济中心功能。1860年，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后，贸易、金融和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逐步成长为我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和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在我国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后，经济地位虽有所削弱，但仍是本区域举足轻重的特大城市。作为京津冀地区的两大核心城市，东西呼应，成为京津冀地区经济的“双引擎”。在明确的分工框架下，两市若坚持协作互动、优势互补，则能达到合作共赢，进而推动首都经济圈的发展。但在区域经济关系上，由于受长期行政体制分割的影响，虽然经济联系十分密切，但两市合作却非常薄弱。

行政体制的分割所导致的区域经济的割裂，造成首都经济圈内各地区间的发展难以协调且极不均衡。河北6市与北京、天津山水相连，同属一个经济区，共用同一区域基础设施网络，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关系。按前述对首都经济圈范围的划分，舍弃天津，而将秦皇岛、唐山纳入其中，属于舍近求远，令人难以理解。

行政区域划分所导致的区域空间的割裂使区域经济的发展难以协调且极不均衡。各城市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与其他城市产生多方博弈，其结果必然走向不合作和封闭型“自顾自”发展。京津冀区域经济整体实力不强即是各自封闭发展的直接后果。在过去的发展中，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性差、效率不高且处于无序竞争的状态，而未来的区域合作在于消除行政体制的割裂，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不是强化这种分割。

（二）周边区域对核心城市难支撑

目前，北京与周边区域存在明显的发展落差，北京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而河北大部分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周边城市规模过小，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土地利用粗放，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建设资金筹集困难，社会服务设施也不完善，功能不健全。特别是与北京接壤的河北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市所辖的39个县中，有25个是国家和省级贫困县，低收入人口占总人口的20%左右。北京周边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使得北京的发展难以获得区域支撑。一方面制约了首都功能的疏解，加大了人口向北京集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周边区域面临着人才短缺、产业发展难以与北京有效对接等一系列问题。

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提

出“环京津地区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这些贫困地区分布于张家口和承德的燕山与坝上、京广铁路以西的太行山区（保定市范围内）、河北中南部的黑龙港流域。环京津贫困带地处京津冀众多城市的上风上水位置，是京津冀平原地区的生态屏障、城市水源地、风沙源重点治理区。长期以来由于过度开发和垦殖，区内干旱缺水、河湖断流、水土流失严重、土壤风蚀沙化、地表水源污染、草场退化，是我国生态保护最敏感地区之一。环京津贫困带的存在，不仅影响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还将威胁京津的生态安全。

城镇体系不健全直接影响了生产要素的转移和区域的整体协调发展，北京作为核心城市，聚集了人才、资本等主要的生产要素，发展迅猛，行政壁垒限制了产业要素的区域合理配置，难以形成合理的产业梯度分工，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周边地区在现阶段不仅不能疏解涌向北京的人口，而且大规模流入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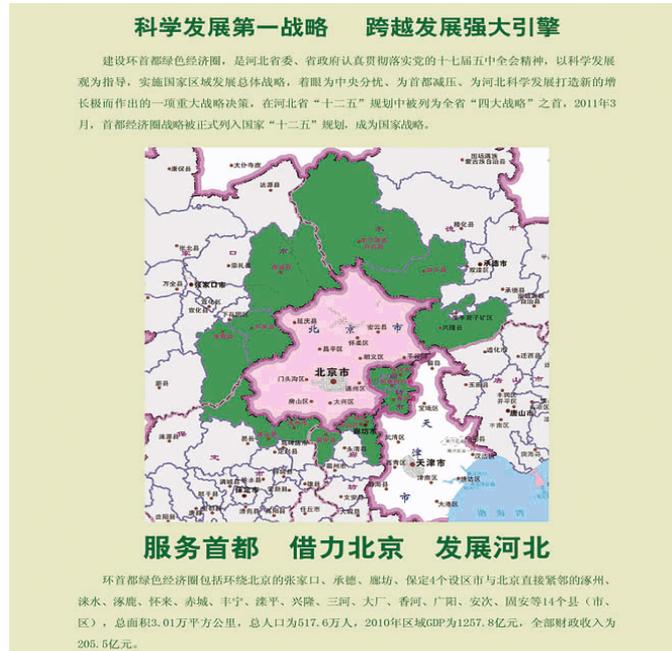
首都圈的主要空间联系是以北京为中心向外辐射的轴向联系，而除了北京，首都圈内的其他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比较薄弱，区域交通体系主要体现在轴向上发展，未形成各市间网络状联系通道。区域资源不能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得到最优配置，必然造成区域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北京的经济辐射功能由于没有有效的疏导途径而无法得到有效发挥，使首都圈地区发展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功能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难以形成，另一方面也导致北京城市功能过度集中，诸多城市问题随之产生。

（三）首都经济圈与环首都圈难耦合

2010年10月，河北省提出环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后改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2011年1月，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写入河北省“十二五”规划纲要。其范围包括环绕北京的张家口、承德、廊坊、保定4个地级市中与北京直接相邻的14个县（市、区），总面积3.01万平方公里，与北京加起来比东京圈还大1万多平方公里。2010年总人口为517.6万人，区域GDP为1257.8亿元。简称“十四县一圈四区六基地”。“一圈”即“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四区”即高层次人才创业园区、科技成果孵化园区、新兴产业示范园区、现代物流园区。“六基地”指养老基地、医疗健康健身基地、休闲度假基地、观光农业基地、绿色有机蔬菜基地、宜居生活基地。欲借助独特的区位优势，打造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通过增量快速带动全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减少与首都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差，对于实现京津冀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顾名思义，环首都经济圈的范围应是首都经济圈的面积减去北京的面积，而“1+3+6”的首都经济圈范围大大超出这一区域，使刚刚推出这一战略的河北省面临比较尴尬的境地。环首都经济圈能否在未来的首都经济圈规划中占有一席之地尚未可知，但

无论如何，其如何耦合确是摆在人们面前需要研究和正视的问题。



五、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若干建议

首都经济圈作为一个区域系统，客观上要求将各地区的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及区域布局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考虑，每个城市的发展计划必须经过调整与联合体的规划协调起来，从而确保首都经济圈的健康发展。首都经济圈规划不仅要与本区域内已有的规划实现有效对接，还要站在区域统筹的角度上，因地制宜，综合考虑，最大限度的发挥首都经济圈内部各城市的优势，并实现与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

(一) 优化首都经济圈的空间布局

都市圈形成的本质原因是大都市的辐射与带动，其原动力是都市本身，其范围大小，取决于辐射力和带动力，由内向外，由强到弱。很显然，其辐射带动最强的是北京市周边地区，其次是环首都经济圈区域，再其次是环首都圈之外的区域。当然，城市的辐射并不像水波一样呈同心圆状，很可能是沿交通线呈放射状。但无论如何，其逐渐减弱是客观规律。北京市的面积1.64万平方公里，加上环首都圈3.01万平方公里，共计4.65万平方公里，比东京圈3.7万平方公里还要大，很显然，东京的辐射力大于北京的辐射力，因此，北京市周围河北省各市不能被动地接受辐射，像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张家口、保定、承德、沧州、衡水等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也有自身辐射带动的区域，也有城市圈，应着力打造各自的城市圈，提高自身的实力和带动力，不要幻想北京市的

辐射和带动。作为北京市，应摆脱“单中心摊大饼”的发展模式，跳出北京规划北京，在河北境内打造“反磁力中心”，才能有效疏解北京市的人口压力、交通压力和环境压力，提高辐射力和带动力。

（二）京津冀三省市应共同打造京津冀城市群

未来一个时期是我国城市群形成的关键时期。首都经济圈作为都市圈的特殊形态，并不能突破都市圈的发展规律。从北京市的辐射带动情况及天津、河北各市的发展状况来看，正处于成型期向成熟期过渡的阶段，即由单向辐射向多向辐射转型的阶段，也就是进入城市群阶段。比如北京与天津两大都市各自的辐射范围已经不清楚了，唐山、保定的辐射范围已经被北京和天津涵盖了，这就是原来的“京津唐”改称为“京津冀”的原因所在。就像日本原有京滨、名古屋、阪神三大都市圈，最后耦合为东海道城市群一样，长三角、珠三角均在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一省两市”应在首都经济圈规划及合作的基础上着力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而首都经济圈则是京津冀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应着力打造“京东”、“京南”、“京北”新区

目前，北京空间结构仍旧是单中心格局，城六区承载了62%的城市人口，70%的经济产出，城市功能过于集中。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发挥首都功能，成为功能强大、生活质量高、宜居性好、辐射力强的首都经济圈，必须跳出北京行政区限制，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构建“多中心组团式”城市新区，从而缓解首都压力，带动周围区域的发展。在河北境内建设“京东新区”、“京南新区”、“京北新区”将是其可行的选择。

河北积极打造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应把着力点放在建设京南、京东和京北三个新区上，承接世界产业和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承接北京市的人口及部分城市功能。其他各县镇应积极接受北京市的辐射，与北京市各县镇进行对接，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四）加强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完善京津冀交通体系

共建交通网络体系应当成为区域一体化的先导和突破口。其重点之一是整合城际公路交通和城市道路交通，积极推进大运量的城际快速轨道交通建设，为核心城市有机疏散和区域重新集中创造条件。在减轻北京中心城区城市道路交通压力的同时，进一步改善京津冀城际之间的交通联系。二是以加强沿海经济带交通联系为目标，形成纵贯南北的综合交通体系，扩大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交通联系。三是加强航空港、港口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形成完善的航空港、海港体系。促进天津港、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的合作，加强港口后方铁路、公路、空运、水运建设，形成综合性、多功能的现代化交通集输运体系。

（五）建立生态和水资源补偿机制

承德市、张家口市和保定市是京、津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也是都市圈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的重点区域。但张家口、承德两市经济欠发达，而且生态环境的治理又是一项投资大、周期长、短期内难以见效的自然环境恢复工程，仅靠其自身的力量难以完成。生态建设属于典型的公益事业，过去长期存在“少数人投入，多数人受益”、“上游地区投入、中下游地区受益”等不合理现象。需要建立跨地区的生态和水资源补偿机制，通过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稳定的资金渠道，从法律、制度的角度对补偿行为予以规范化，从而实现张、承、保三市生态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曹传新，2002，《国外大都市圈规划调控实践及空间发展趋势——对我国大都市圈发展规划的借鉴与启示》，《规划师》第6期。
2. 张强、陈怀录，2010，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功能组织研究，《城市问题》第3期。
3. 薛俊菲、顾朝林、孙加凤，2006，《都市圈空间成长的过程及其动力因素》，《城市规划》第3期。
4. 宋迎昌，2005，《国外都市经济圈发展的启示和借鉴》，《前线》第11期。
5. 赵弘，2011，《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首都一体化视角下的“首都经济圈”战略研究》，《首都经济论坛》第26期。
6. 顾朝林，2012，《北京首都圈发展规划研究——建设世界城市的新视角》，科学出版社。
7. 袁朱，2006，《国内外大都市圈或首都圈产业布局经验教训及其对北京产业空间调整的启示》，《经济研究参考》第28期。
8. 赵弘，2009，论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城市问题》第5期。
9. 于一凡，2004，《城市交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简析法国巴黎大区交通策略的发展与变迁》，《国外城市规划》第2期。
10. 安静文，2011，《世界城市空间结构比较及其对北京的启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第3期。
11. 谢守红，2002，《湖南省城镇空间布局探讨》，《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
13. 左婷、刘晓敏、王志杰等，2009，《首都经济圈的贫困带成因与消除贫困的建议》，《区域经济》第5期。
14. 毕明，2011，《京津冀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第1期。
15. 樊杰著，2008，《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
16. 肖金成等著，2010，《京津冀经济合作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文政

· 产业发展 ·

应对国际新挑战 完善我国能源战略

李晓西

摘要： 本文在全面分析国内外能源新形势、认真分析已有能源战略的优长与不足基础上，将我国在2030年前的能源战略概括为实施“节能、绿色、结构、安全、改革”五指合拳的能源战略。

关键词： 能源形势 能源市场 能源战略

作者简介： 李晓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能源是支撑人类文明进步的物质基础，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能源始终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①。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持续发展。200年的化石能源时代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础，今后200年会如何？我国如何获取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如何能在世界能源市场上形成有保障的能源供给，如何在未来占领能源科技的高地，如何解决能源生产和使用中的资源与环境约束？需要我们纵观全球，剖析形势，明确战略，从长计议。

国家能源总体战略要明确的是国家能源发展的战略思路、战略目标，而能源的子战略则是要明确国家能源发展的战略重点。本文拟就这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能源国情世情面临新形势

能源形势总在变化中。当前以及今后若干年，能源形势都是严峻的。当然，挑战与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2，《中国能源政策白皮书2012》，新华社，10月24日。

机遇并存。能源形势可以概括为五个“新”：能源国际市场出现新动荡，能源利用与贸易遭遇新压力，能源供应资源约束和环境承载再现新瓶颈，能源管理体制面临新矛盾，能源技术与能源生产方式可能有新突破。

（一）能源国际市场出现新动荡

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早已渗透到能源领域，能源市场已成为全球化的市场。各国能源相互依赖加深，能源安全越来越超越消费国和生产国的界限，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全球化带来的全新的贸易、投资、信息、技术的流动，给国家能源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能源的战略属性和政治属性更加凸显。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快速增长与发达国家主导世界能源市场的矛盾将加剧，能源市场在发达国家金融资本操控下的波动将更加起落巨变；国际上能源供求间矛盾，将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步转移到新兴经济体与OPEC之间；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地缘政治、地区矛盾和产油国内部冲突的影响将扩大，苏丹、利比亚、叙利亚以及美欧对伊朗原油禁运等就是例证。石油生产难以稳定，全球石油市场更难稳定。能源国际市场新动荡的因素在加速积累，其苗头是石油价格在大起大落中冲向高线。美国能源安全的便车再不会为我们提供！美国“能源独立”后对中东、非洲的政治干预将加强，会利用石油武器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根据国家能源局编写的《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1》中转引IEA的分析，我国能源需求量在2008—2035年间会上升75%，到2035年，我国占世界能源需求会从目前的17%上升到22%。就我国建设的四大通道之一来说，我国原油进口90%来自海上，50%来自中东。中东局势复杂多变，马六甲、霍尔木兹海峡是否保持畅通，也有很大隐患。2012年，中海油以151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尼克森能源公司，中石化以15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塔里斯曼能源公司英国子公司49%权益，中石油收购法国苏伊士环能集团卡塔尔海上第4区块40%石油勘探开发权益等，均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①我国天然气进口主要来自中亚，能否有稳定的合作，涉及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博弈，也难保证稳定。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储备能力，均离世界平均水平有相当距离，安全形势比较严峻。总之，今后能源国际市场问题将更多，合作将更难。

新发现和新科技有助于促成世界能源总供给仍略大于总需求，但也不能不看到，总供求平衡下的结构性不平衡在加剧，尤其是对我国。因此，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存在新一轮的能源危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对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亚太地区的新兴大国，新的能源危机是真实的。

^① 李约翰，2012，《美国评估中国能源战略》，财经国家新闻网，10月08日。

（二）能源利用与贸易遭遇新压力

全球气候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地缘政治等对国际能源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世界能源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更加不稳定和不确定。发达国家竭力维护能源市场主导权，通过设置碳关税、“环境标准”等贸易层层壁垒，借助反倾销、反补贴等控制中国能源制品的出口。

光伏产业一直以来是我国新能源的优势产业，在新能源出口方面创造了巨大业绩。但是，光伏产品出口也遭到欧美国家的打击。2012年9月，欧洲光伏制造商联盟EU ProSun向欧盟提起贸易诉讼，指控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获得非法政府补贴。这次案件涉及到中国对欧盟价值210亿欧元，即至少1600亿人民币的巨大出口金额^①。2012年10月10日，美国商务部作出终裁，认定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倾销幅度为18%-250%。同时，还裁定中国输美的此类产品接受了15%-16%不等的补贴。这为美国针对此类产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双反”）基本扫清了道路。如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也作出同样终裁，美国商务部将要求海关对相关产品征收“双反”关税。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1年美国从我国进口了价值约为31亿美元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②。中国人生产光伏电池，把污染留给自己，把新能源的利用条件提供欧美，居然遭此对待。从这两起贸易案件中也引发思考。为什么欧洲会有那么大的光伏电池需求量？因为欧盟正在全力打造新能源的基础。我们能否学习欧洲，也把我国的大楼转变成小型发电厂，把利用光伏电池的市场扩大100倍？国家能否在扩大内需上有大战略，为光伏企业发展开辟新道路？这就会在支持新能源产业生产的同时，发展我们的新能源使用方式。这一战略问题需要我们研究解决。

事实上，近年来围绕气候变化而产生的排放权与发展权的谈判博弈更趋激烈，发达国家借经济与技术优势挤压新兴国家发展空间。我国不仅面临温室气体减排和低碳技术产业竞争的压力，而且，美国“页岩革命”为再工业化提供支持的同时，也会对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形成新的竞争态势。

（三）能源供应资源约束和环境承载再现新瓶颈

我国能源供应资源约束和环境承载的瓶颈众所共知，如我国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等。能源供应资源

① 司马岩，2012，《光伏再次遭双反，中国产业如何打破欧美贸易壁垒？》，《中华工商时报》，10月11日。

② 阳建、王宗凯，2012，《美终裁中国产品晶体硅光伏电池存在倾销和补贴》，新华网，10月11日。

约束的新瓶颈，是指“绝对瓶颈”与“相对瓶颈”的共同发力。“绝对瓶颈”是能源资源不可持续，对能源需求的供不应求；“相对瓶颈”是能源供求不协调、不稳定，时而短缺，时而过剩，在供求失衡中不断破坏着生产力。能源供应环境承载的新瓶颈不仅是指化石能源生产和使用中的新问题，关键还在我们如何对待，比如，是采用改良西门子法来生产多晶硅，还是采用落后技术来生产，对环境有截然不同的影响^①。

2000-2008年，我国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平均达到8.9%，远远高于同期世界不到2%的增长速度。2008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28.5亿吨标准煤，比2000年的13.85亿吨标准煤增长了一倍以上，将原来设想的2020年的能源消费总量提前了12年。……如果我国的能源消费增长维持在2000-2008年平均8.9%的速度，则2020年我国将需要79亿吨标准煤，占目前全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一半；2030年将达到186亿吨标准煤，是目前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117%^②。这显然是无法持续的。

能源开发、加工和使用在严重破坏环境。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开发，往往导致地下水系结构破坏、地表塌陷、水土流失、植被死亡。而我国未来煤炭规划区大部分集中在生态资源脆弱、水资源严重短缺的西北地区。目前全国96个国有重点矿区中，缺水矿区占71%。采煤土地复垦率仅12%，远低于发达国家65%的平均水平。矿井瓦斯80%直接排到大气中，利用率不到30%，严重影响着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氮氧化物排放量的67%、烟尘排放量的70%都来自燃煤。总投资超万亿元的数千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80%以上分布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45%为重大风险源。近两年我国已经成为二氧化碳最大的排放国。按照我国现在的能源发展趋势，未来我国能源利用产生的二氧化碳将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长量的主要部分^③。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环境污染将更趋严重。

（四）能源管理体制面临新矛盾

人们对能源发展提出诸多问题，如我国的能源资源配置有重大不足，能源企业可持续发展动力和能力不足，能源管理部门重项目、轻长远，能源价格没有完全反映资源稀缺性，节能减排的财税、金融等经济政策还不完善，能源消费和污染物排放计量、统计滞后，这些问题都需要追根求源。中石化提出：亏的越多炼的越多，赚的越多炼的越少；中石油认为：特别收益金能否鼓励勘探开发，不找储量如何能稳定产量？国电的观点是：电价、煤价倒挂，电力产业亏损；各地方纷纷询问：能源生产上到底应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

① 国家工程院，2011，《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研究—可再生能源卷》第178页，科学出版社。

② 同①，第5—7页。

③ 同①，第12—22页。

民进? 一次性资源全民开采、户户挖煤、村村采油行吗? 这些问题都需要回答。

诸多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和各自不同的背景,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在能源生产与利用方面,对政府的作用估计充分,但对市场作用认识不足。市场最大的作用,就是利于配置资源,有助于激励企业创新与发展,可促进供给侧、尤其是需求侧的两侧技术革命。政府在能源管理上面的重心与精力应放在哪里? 没有在市场力量基础上的分工,就会错位、越位和缺位,既付出很多,又没能达到预想目标。政府与市场如何各自做好自己的事? 这对管理体制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 能源技术与能源生产方式可能有新突破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预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他说:“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即将融合,并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一革命无疑将改变整个世界”。“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分散式生产、储存、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分配和零排放的交通方式,构成了新经济模式的五个支柱”。“在今后的几年中,中国需要就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作出重要决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风力涡轮机生产国,其太阳能光电产业生产总值更是占世界的30%,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国。但是,中国所生产的可再生能源科技产品几乎均销往海外。目前,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中国国内能源消耗总量中的比例只有0.5%。……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风力资源,只要中国政府提高补贴和改善输电网络,至2030年风力发展就可以满足中国所有的电力需求”。“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地位正如沙特在石油产业中的地位一样,中国每平方米的可再生能源潜力要远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国人需要关心的是20年后中国将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身陷于日薄西山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中继续依赖化石能源与技术,还是积极投身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与科技? 选择后者,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亚洲的龙头,引领亚洲进入下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①”!

人类社会已经历了薪木、煤炭和石油三个能源时期,人类社会已步入能源发展新变革时期。到2010年,100多个国家制定了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关的目标或政策。美国政府要求截至2030年,所有新建筑必须实现零排放。我国已经在行动,而且行动速度相当快,现在需要的是统筹规划,把短期发展与中长期规划结合起来,需要把能源战略与国情世情统筹起来,需要有持续努力的精神。如果说页岩气在美国是二十年的准备,十年的攻关,今天才突破,我国能源新战略就要站高看远,持续努力。能源技术与能源生产方式的新突破对中国是机会,但若缺乏战略,落后几步,也可能将是“中国制造”失去国际竞争力的开始。未来能源作为重要战略产业,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必将成为经济发展强大引擎。

^① 杰里米·里夫金,2012,《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出版社。

二、能源战略在新形势下须进一步完善

国家能源战略是筹划和指导国家能源可持续发展、保障能源安全的总体方略，我国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能源战略的研究。

早在1999年，中国计划出版社就正式出版了能源专家周凤起、周大地等所著的《中国中长期能源战略研究》专著，并获得了国家计委科技进步三等奖。2003年，适应新形势变化，国家决策机构再次组织专家进行了能源战略研究。2004年，国务院通过了《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提出了我国能源的国际化战略。2006年，中国社科院能源战略研究所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专题研究》一书。2007年，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中，提出我国能源战略的基本内容是：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依靠科技、保护环境、加强国际互利合作，努力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而在《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中，已把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保护环境、科技创新、深化改革、国际合作、改善民生”8方面概括为“中国能源政策的基本内容和能源发展方针，而不是“能源战略”。我们认为，这种定位是正确的^①。那么，能源战略是否需要单独提出？中国能源战略是什么？

环顾世界，以美日为首的发达国家对我国崛起的遏制与围堵更为加剧，我国周边的环境更加严峻，与资源国的合作更加不稳定，国内的能源资源不仅在中长期难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短期也出现了结构性的困境。进一步的思考是：战略问题应解决能源总供求问题，不仅是某一能源的供求问题；战略问题还应解决中长期的能源生产与消费问题以及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能源作为战略不仅仅解决的是经济问题，还要统筹考虑能源的外交、政治，甚至军事与战争问题。因此，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2007年《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中六方面的战略内容似乎强调的力度不够、概括的份量不足。

比如说，节约优先能否直接概括为“节能战略”，并进一步挖掘这一战略更多的含义？事实上，在国内相关文件中也有过“能源节约战略”的提法；至于“立足国内、多元发展”，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多元发展”是因石油能源的来源引致的，如果作为多种能源的比例规划和重点选择，就不如概括为“结构战略”。实际上，“结构战略”既包括着能源多元化中突出重点与阶段的思考，也包含着对能源产销的区域性布局的关注，包含着能源的开发战略；“保护环境”，无疑是正确的，但力度不足，如果提“绿色战略”更为引人关注，且内容将更为丰富，其容量超过提“能源环保战略”；“依靠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2，《中国能源政策白皮书2012》，新华社，10月24日。

科技”，显然非常必要，科技决定能源的未来，科技创造未来的能源。从长远看，最终解决未来能源问题，并不取决于对能源资源的拥有，而是取决于对能源高科技的拥有，取决于能源科技革命的突破性进展^①。但科技应是为能源战略服务的战略，应融合在能源各个子战略中，而不是独立的，比如说，中国有相当数量的页岩气，但如何降低开采和使用成本，就需要科研的创新与突破，否则不可能大面积投资，因此，不需要单独提出“能源科技战略”；“加强国际互利合作”，非常正确，提“能源贸易战略”也有道理。但我们更想立足自身、面临危机来规划，即更直接地解决为什么要合作，不予合作时如何办？破坏合作时如何处置？因此，让它成为“安全战略”的一部分更有警示的作用，更强调政治甚至战争局面下的统筹决策。而“改善民生”则应体现在能源战略的目标，更进一步则是概括在社会和国民经济发展目标中更为准确。总之，“白皮书”的提法都正确，理由都充分，但若根据时局变化，做进一步提炼与完善，可能有必要且更有利。

若以上理由能为各方接受，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出现一个“节能、绿色、结构、安全”的四大子战略。进一步，如果我们把2007白皮书“努力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这句话也考虑进来，那就必须进一步改革与改善能源供求管理体制，因此，会引出“改革”的战略。而这在《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中概括的8点中已特别列为一条。

综上，我们按照2007年决策部门提出的能源战略思路，并根据2012年能源政策内容新概括，提出能源的五大子战略。在多次比较与讨论后，我们以为这样的修改和完善，更能体现针对性和紧迫性，更能强调为经济中长期发展服务的可持续性。而且，都以两个字概括战略，“节能、绿色、结构、安全、改革”，上口易记，传广流远，便利相关方面共识共力。总之，我们希望努力以更简明的概括，更突出的分类，以强化战略意识和集中战略目标。

三、进一步阐释“能源五指战略”

全面分析国内外能源新形势、认真分析已有能源战略的优长与不足基础上，我们将我国在2030年前的能源战略概括为实施“节能、绿色、结构、安全、改革”五指合拳的能源战略。下面分述之：

（一）节能战略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节约与开发并重，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的能源发展总方针。中国的节能战略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政府在推进节能降耗工作中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1981-2011年，中国能源消费以年均5.82%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0%的增长。2006-2011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20.7%，实

^① 摘自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1月16日世界能源峰会上的讲演，新华网。

现节能7.1亿吨标准煤^①。

但是，我国节能降耗水平与先进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我国人均能源消费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连续6年（2006—2011）居世界第一，2011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到31.8亿吨标准煤，其中，原煤产量35.2亿吨，原油产量稳定在2亿吨，成品油产量2.7亿吨，天然气产量达到1031亿立方米^②。显然，如此大规模的供给能力，节能意义非同寻常。正因为如此，节约能源被专家视为与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同等重要的“第五能源”。

我们正在努力实施能源强度和消费总量双控制，但更重要的是，要在节能战略的推动下，结构节能、技术节能、管理节能、改革节能、法治节能、全民节能^③，切实推进工业节能、建筑节能、交通节能，努力构建节能型的生产消费体系，构建节能型国家和节约型社会。

（二）绿色战略

能源绿色战略，不仅仅指发展绿色能源，即发展包括可再生能源的新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还包括传统能源的绿色化。因此，我们在全力提高该比例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占更大比重的传统能源的绿色化问题。事实上，能源绿色战略可理解为能源在生产、消费过程中的清洁、低碳与可持续，既包括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煤，也包括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绿色化问题。

能源绿色战略的核心思想是：人类不应该通过减少绿色来获取能源，而应该通过增加绿色来获取能源。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能源的绿色生产、能源的绿色技术、能源的绿色消费、能源绿色战略中的执行主体。这里，绿色主要指广义的环境保护和资源生态可持续，而不仅仅指狭义的植物绿色。能源绿色战略的思想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便有所体现，其要求“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在环境保护、能源产业的各种规章制度中也均有规定。但今天，我们更加凝练思路与做法，聚焦社会对绿色能源，尤其是能源绿色的关注，比如，绿色消费就要回答，诸如电动汽车与天然气汽车（LNG）到底如何规划与发展？从光伏电池出口受阻看扩大国内需求，加快新能源建设速度等问题。

（三）结构战略

结构战略旨在解决能源发展的先后轻重及能源战略布局。调整能源结构是能源发展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2，《中国能源政策白皮书2012》，新华社，10月24日。

② 同①。

③ 夏义善主编，2009，《中国国际能源发展战略研究》第283—28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转变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举措。结构战略非常重要,其包括内容之多,立论之细,分析之深,几乎接近一部完整的能源规划。

首先,是能源多元化及各自贡献合理化。化石能源与新能源有结构问题,化石能源本身也有结构问题。页岩气、煤层气和页岩油等非常规资源开发的进展,对化石能源结构的认识有很大推动。2010年我国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70.9%,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分别占4.3%和8.3%^①。工程院的报告指出,煤炭在化石能源中碳排放强度最高,石油次之,而天然气排放强度较低。核电、水电、其他可再生能源可以近似为不排放温室气体。^②面对这个基本格局,我们要研究作为人均化石能源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面对化石燃料的燃烧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化石能源使用比重应否降低?降至多少为宜?可再生能源比重应提高多少为好?是否应坚持以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油气和新能源全面发展的结构战略?核电如何解决好核燃料和核废料处理问题?页岩气的开采如何防止污染水资源?风电建设如何解决好大规模储能问题?“少用煤多用气”有多大价值等?都是能源结构战略题中之义。

其次,能源的区域开发及产消的合理化也非常重要。以油气为例,海上开发是否应先南海、东海,后渤海、陆上?是否应先边疆后内陆?问题很复杂,但不能没有战略思考。水电建设是否也要从区域角度,提升为全国角度、大流域角度,甚至政经合一角度来分析?同样,作为一个大国,能源的城乡发展与协调,能源的国内外来源比重及调整,能源供需的逆向分布及能源运输中如何避免跨区间的迂回运输,也都非常重要。总之,结构战略是一个大战略,涉及面很多。国际能源博弈的较量,不是规模的对撞,是结构和质量的硬比较。

(四) 安全战略

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是必然选择,但要强调多元化:合作多元,来源多元,品种多元,通道多元。“中国可能扭曲全球石油供应、威胁其他国家能源安全”的论调仍然广泛传播,损坏着我国能源的外部环境。作为能源消费大国的中国,在目前世界能源治理框架下仍缺乏与大国地位相应的话语权。中国能源“走出去”,出去多少为好?是控股好、参股好、购买产品合同分成好?均要作为重大问题来研究。我国对进口油气资源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石油对外依存度从本世纪初的32%上升至目前的57%^③。而进口来源结构风险系数高,运输通道安全系数低,“价格避险”能力

① 刘铁男主编,2011,《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1》第26页,经济科学出版社。

② 国家工程院,2011,《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研究——综合卷》第22页,科学出版社。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2,《中国能源政策白皮书2012》,新华社,10月24日。

弱，获取海外石油资源的制约因素多，均是我国能源安全的忧患之处^①。我们在国外的石油投资有成功，也有不少失败，要会诊得出新策略，还要有应对突发事件的战略石油储备。

能源安全与其他子战略是紧密相关的，能源结构、开源提效、能源使用、能源进口、国内能源消费、能源战略储备，都是能源安全的重要因素。能源消费快速与能源生产后劲不足，能源消费结构不能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这是安全的致命内在隐患。我国作为一个被妖魔化为对世界有威胁的新崛起大国，既要强调对外合作，更要强调立足国内，要内外并举、多元发展。为了解决能源安全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形成与发展中大国相符的能源安全战略思想，形成中长期能源安全战略体系。作为发展中大国，能源安全是我国永恒的关注。

（五）改革战略

节能提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安全部署，都需要制度保障。因此，如何完善和改革能源管理体制，形成高效的、长效的能源运行机制非常重要。我们强调提出能源改革战略，所谓“改革”不仅指竞争性市场本身，还包括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

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国的能源体制已经突破了“政企合一、高度集中、行政垄断”的政府部门直接经营模式，初步形成“政企分开、主体多元、国企主导”的能源产业组织格局。但是总体上，政企分开没有真正实现；市场结构不够合理，有待进一步重组；价格机制尚不完善，仍然依靠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能源价格机制未能完全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供求关系和环境成本；行业管理仍较薄弱，能源普遍服务水平亟待提高；政府管理不够科学，职能越位、缺位、不到位现象普遍存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很难？重要原因在体制上。政府与市场关系摆不对，政府有积极性，企业没有动力，那就只会形成一大堆的口号，不能产生实际效果。

应设立能源统一主管部门，全面负责制定能源战略。用战略指导规划，规划落实战略。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政府决策，如国家重点能源基地如何建设与合理布局？中国所有核电站周围的人口都超过100万，如何保证安全？如何通过税收、价格、信贷以及财政支付等政策手段，支持能源产业发展与能源合理布局？大城市交通用油问题如何解决？中国要不要搞LNG的现货市场？能源行业的具体改革，能否以电力改革为突破口，取消煤炭价格双轨制，率先实现煤炭和电力两个行业的改革？油气行业改革亟待破题，市场竞争亟待加强，是否要提出油气行业需要脱胎换骨但不能粉身碎骨？

我们相信，在新一届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全党全民树立危机意识，勇于和善于应对挑战，把握机遇，同心同力，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我国一定会建设起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新体系。

责任编辑：刘英奎

^① 夏义善主编，2009，《中国国际能源发展战略研究》第169—17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 调研报告 ·

“三江并流”及相邻地区： 现状、问题和对策

刘学敏 宋 敏

摘要：针对“三江并流”及相邻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低、贫困幅面大、社会事业落后，及生物资源富集、区域生态环境脆弱等相关问题，提出了区域发展对策：该区域的发展亟待上升为国家战略；加快推进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探索生态富民互动模式；组建“国土守护员”队伍，实现“强边、兴边、稳边”目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生态农业快速发展；做大做强旅游产业，打造世界知名生态旅游品牌。

关键词：“三江并流 经济发展 生态移民 国土守护员 生态农业 生态旅游

作者简介：刘学敏，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教授、博导；

宋 敏，西安财经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后。

受地质构造运动的影响，整个横断山脉同青藏高原一起迅速隆起，构成中国西南四山夹三江的“三江并流”地貌，即自西向东分别排列着南北纵贯的高黎贡山、怒江、怒山（梅里雪山、碧罗雪山）、澜沧江、云岭、金沙江和玉龙雪山。这里地域相连，处于相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同时，经济结构同质，经济发展阶段一致，资源优势相同。本文以“三江并流”流域所在的23个县域行政单元为研究区域，其中，核心区14个，包括西藏的察隅、左贡、芒康3县；四川的得荣、巴塘、乡城3县；云南的泸水、兰坪、福贡、贡山、香格里拉、维西、德钦、玉龙8县。扩展区9个，包括四川的稻城、木里2县；云南的宁蒍、丽江古城、云龙、永平、隆阳、施甸、龙陵7个县（区）。本文除了特别标注的参考文献外，所用数据均为实际调研所得。

一、“三江并流”及相邻地区发展现状

（一）经济发展程度低，社会事业发展落后

该地区是中国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

在经济发展方面，2010年，该地区仅有保山隆阳区GDP过百亿元，达到107.33亿元，大部分县域不超过20亿元，最小的察隅县仅为2.58亿元。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29992元，云南为15749元，四川为17319元，而该地区没有一个县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仅有香格里拉县最高，为29179元，最小的福贡县仅为5600元，大部分县不及全国的一半。区域内财政普遍困难，大部分县财政收支入不敷出，多靠国家拨款维持，增加物质投入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弱，依靠自身财力的增长根本无法满足当地基础设施建设。

在社会发展方面，区域内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总体低于6.66年，仅达到小学毕业程度，最低的福贡仅3.71年，察隅、左贡、芒康的文盲率分别为64.00%、79.24%和78.21%，分别是全国文盲率的15.69倍、19.42倍和19.17倍。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云南省为12.6人。泸水、兰坪、福贡、宁蒗、永平、施甸和龙陵的万人拥有医生数极度偏低，仅有施甸县和龙陵县的万人拥有医生数高于云南省的平均水平。

（二）生物资源富集，耕地资源匮乏

该地区是中国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首先是林业资源。该地区云南境内森林覆盖率平均达68.6%，高于全省约26.7个百分点，高于全国约53.8个百分点。其中，贡山县最高，达到78.4%，怒江州4个县为73.2%。保山市施甸县最低，但也达44.8%。该区域云南部分国土面积占全省的10.38%，活立木蓄积占全省的24.63%；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0.41%，活立木蓄积却占全国的2.83%。总经济林面积达21531km²。

其次是生物多样性资源。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第四纪冰期时曾是欧亚大陆生物区系的主要避难所之一。该地区是南北交错、东西汇合、地理成分多样、特有成分突出的横断山区生物区系的典型代表和核心地带，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名列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17个“关键地区”的第一位。

最后是水资源和水能资源。由于每年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与青藏高原的冷空气在这里交汇并带来丰沛的降水，又因地处中国地势第一阶梯向第二阶梯过渡的地带，河床比降大，使该地区水能资源异常丰富。怒江州水资源总量达894.15亿m³，水能理论蕴藏量达2000万kw，占云南省总蕴藏量的11.6%，可开发的水能资源装机容量为1774万kw。迪庆州水资源总量为119.73亿m³，可利用量95.7亿m³，可开发利用水能资源在1370万kw以上。甘孜州水资源总量为1397.83亿m³，其中可利用水资源总量为881.8亿m³，占四川省河川径流量地表水资源总量的1/3以上，水能理论蕴藏量3729万kw，占四川省的27%。昌都地区水资源总量达771.1亿m³，天然水能总蕴藏量达3104.7万kw，占西藏的30%，目前已开发的水能资源仅占河流天然水能理论蕴藏量的0.06%。

但是，该地区耕地资源匮乏，且多为坡地。泸水、兰坪、福贡、贡山、香格里拉、维西、德钦、玉龙、宁蒗、隆阳和施甸的耕地面积分别为27.75万亩、47.36万亩、17.62

万亩、5.35万亩、18.50万亩、22.90万亩、14.13万亩、35.58万亩、40.11万亩、65.35万亩和35.11万亩；其中坡度超过25°的耕地面积分别为22.20万亩、8.42万亩、15.76万亩、3.31万亩、2.38万亩、22.46万亩、3.51万亩、9.85万亩、15.74万亩、1.94万亩和3.23万亩；坡度超过25°的耕地面积占耕地面积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80%、17.80%、89.47%、61.87%、13%、47.55%、48.75%、27.68%、39.24%、2.97%和9.20%。

二、“三江并流”及相邻地区面临的问题

（一）经济落后，贫困幅面大

首先，区域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该地区地处横断山区，境内山峦起伏，江河切割作用明显，山高谷深、起伏陡峻。地表平衡结构一旦受到干扰，极易发生土壤侵蚀、滑坡、泥石流，进而导致地表岩石裸露或沙化，植物生长环境和条件随之逆转，生态环境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也随之减弱或丧失。同时，区内大部分地区地处高海拔地区，气候严寒、年温较低，导致生物生长缓慢，原生生态系统一旦受到破坏，则恢复相当缓慢。区域内大部分地州的经济规模普遍很小，GDP占各自省份的比重低，财政自给率低，产业结构基本上还处于第一产业占优势比重的阶段，农业人口的比重偏高，因而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投入的劳动与初级资源比重大，资本与技术的比重小，造成经济的粗放型增长。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该区域地处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上就是经济发展的边缘区，位置偏僻，经济区位差。从地州首府到各自省会城市的距离看，最远的昌都县至拉萨的距离达1121公里，最近的康定至成都距离也有322公里。区域内运输设施以公路为主，运输成本居高不下；公路等级低，路况差，如香格里拉到昌都和康定都是三级公路；再就是断头路、回头路多，如德钦县与贡山县山水相连，但若从德钦到贡山则要绕行700多公里。

其次，林业产业发展呈现出“大资源、小产业”特征。区域内林业产业仍以种植业和初级加工产品为主，产业链短，高附加值林产品不多，社会化服务水平不高，资源综合利用率低。以怒江州森林资源为例，总量较大，但产业化发展层次低，林地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林业科技创新和推广投入不足，体系不健全，科技支撑不强，林业创新技术实用推广滞后，良种基地建设数量不足，良种供应能力比较低；林业龙头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高素质科技和管理人才不足，市场竞争力不强，企业融资渠道不广，企业发展动力不足；交易市场要素培育滞后，林产业集聚市场分散、规模小，林权交易平台建设滞后。

再次，贫困幅面大、程度深，生态移民难度大。因地处偏僻，区内地形破碎而峻陡，生态景观丰富但脆弱，耕地稀缺而分散，山地灾害多样而频发，使该地区成为贫困面大和贫困程度高的典型的边疆（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在怒江州，4个县均为国家扶

扶贫开发重点扶持县。全州贫困人口发生率约为35%，高出全省20个百分点，高出全国30个百分点。2010年末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005元，仅相当于当年全国平均水平的33.33%。全州还有人均纯收入低于1196元的贫困人口14.07万人（785元以下深度贫困人口5.89万人），占农村人口的33.8%。按照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新贫困标准，全州绝大部分群众处于贫困线以下。其中，90%以上的傈僳族、96%以上的独龙族、90%以上的怒族、89%以上的普米族农村群众和白族支系的勒墨人、拉玛人以及景颇族支系的茶山人还处于整体贫困之中，扶贫攻坚形势依然非常严峻。目前，全州还有61%的农业人口尚未解决安全用水问题，32%的自然村未通电，还有8.57万人需易地开发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有2.5万户贫困农户还居住在茅草房、杈杈房内。在迪庆州，1988个自然村中461个不通电，1027个不通公路，全州35万人口中，失去生存条件的接近10%。德钦县生活在海拔3000m以上的有90个村民小组1156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9%；生活在2800-3000米的有223个村民小组40913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4%。多数人居住在半山甚至高山区域，土地贫瘠，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比例远远高于云南省平均水平。

（二）区域生态环境脆弱，生物多样性稳定性差，森林资源锐减

首先，生态环境脆弱度高，自然与人为破坏严重。由于缺少耕地，当地居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以毁林开荒、陡坡垦殖等方式扩大耕地面积，靠广种薄收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有的甚至在离河谷近千米、坡度在60°以上垦殖。在怒江两岸随处可以看到，陡峭山坡上一块块大小不等的耕地仿佛镶嵌在成片的山林植被中，形成“大字报田”。而新开垦土地由于土层浅薄、肥力低下，氮、磷、钾等肥力要素含量较低，一遇大雨极易产生水土流失和泥石流，植被一旦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迅速破坏，恢复起来很难。又因陡坡耕作，屡屡发生人畜坠落事故。由于过度垦殖导致山林植被破坏程度越来越大，河流输沙量与日俱增，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有发生。由于南北纵列的高山深峡，地壳上升强烈，地形切深速率大等原因，造成区域内地形坡度大，岩石破碎，土层较薄。在地形、岩石、土壤、气候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再加上地质灾害频发，使得区内生境带幅较窄、破碎、稳定性差，较小的扰动就可能造成极大的环境灾难，而且很多一旦破坏就难以恢复。据统计，丽江水土流失面积达5479km²，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26.7%，且大多数区域至今未得到综合治理，局部区域生态功能十分脆弱。怒江州海拔1500-2000米之间的植被破坏严重，水土流失面积达3933km²，占全州总面积的26.75%，土壤侵蚀面积超过25%，全州现有657个滑坡、泥石流点，有4万多人因安全隐患急需搬迁。由于人类活动频繁，河谷生态恶化区已经成为生态环境最恶劣的地区，这些区域水土流失仍十分严重，局部地方生态环境仍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其次，生物多样性稳定性差、敏感性强，森林防火任务繁重。该区域整体地形破碎，部分区域海拔高，气候冷凉，植被恢复和演替过程非常缓慢，生态系统层次丰富、

结构复杂,但系统空间一般都很小,抗干扰能力较弱。境内分布的野生动物、植物物种数多,但每种种群数量及个体数量较少,表现面积都不大,使得区域内生物种群的适应性范围小、抗干扰能力十分脆弱,对自然和人为扰动敏感。一旦栖息地遭到毁坏或者遭到过度采集,一些极小种群的特有物种将不知不觉地灭绝。近年来,在野生生物资源的采集过程中,人们在利益的驱使下出现了过度采集、竭泽而渔的行为,致使珍稀生物资源的种群数量下降。例如,迪庆州近年来冬虫夏草、羊肚菌等高经济价值的野生生物产量均呈下降趋势。贡山县原先记录的兰科植物有76属265种,但近几年来由于受经济利益驱使,当地村民滥挖乱采及外来商贩大量收购野生兰花,致使野生兰科植物面临枯竭。据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提供资料显示,雪莲花中的绵头雪莲是一次性结实后死亡的菊科草本植物,是传统的藏医中草药用植物。以往的采集利用主要局限于当地人群,对资源的消耗不大。但是自从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以来,随着国内外游客的日益增加,市场需要量急剧升高,资源破坏严重,使其濒于灭绝。

最后,薪柴消耗量大,森林资源锐减。该地区各少数民族仍以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高消耗、重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工业生产方式为主。由于居民多居于山区,村落分散,交通不便,煤源缺乏,办电困难,家家户户饮煮、取暖、照明均离不开柴火,建筑用的大部分材料也取之于木柴。他们在脆弱生态区砍伐森林、毁林开荒、陡坡垦殖、刀耕火种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对森林、土地、植被造成了毁灭性破坏。怒江州仅农村生活用柴量每年就达300万 m^3 ,年消耗量占全部用材总量的65.94%。目前,海拔1500米以下的地区,原生森林植被已经荡然无存,1500-2000米之间的植被也破坏严重。香格里拉县城原始云杉林也已不复存在,即使在远处石卡雪山上有森林的地方,茂密程度已不如从前。

(三) 保护区管理体制不顺,政策体系不健全

首先,保护区的设立重叠交叉。保护区是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划定的区域予以保护。目前,该区域内的世界遗产地、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化遗址、森林公园等相互重叠,有的区域既被划定为世界遗产地、自然保护区,又被确定为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交叉重叠较多,这给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带来不便。重叠的保护区由于受若干机构管理,实行不同的管理体制,权限不明导致利益面前争先恐后、责任面前相互推诿,各管理部门间未能有效发挥管理者职能。此外,保护区重叠进一步割裂了当地社区、居民与自然资源的固有联系。在同一区域中,不同类型保护区的设立目的不同,依据的法律法规不同,当地社区居民因此享有的权利义务也有所差别。对自然资源利用不同限制的叠加使当地居民的权利空间大大缩小,他们愈来愈被隔离在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之外,进一步加深了贫困程度。

其次,保护区设立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地经济发展。保护区的保护与周边居民的生计之间矛盾突出,形成对资源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出现了很多破坏生态环境的

事件。该区域的部分特有少数民族属“直过民族”（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建国以来，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生产方式仍是传统农业方式，生产力水平低下，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产生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很大。在保护区设立之后，他们或者被禁止从事以前赖以谋生的生产，如狩猎、放牧、耕种等；或者在进行生产时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放牧区域限制农药化肥施用等；或以薪柴为主要生活燃料与自用材采伐指标受限，严重影响到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其经济利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失，而得到的补偿却十分有限。除此以外，林业收入也是当地农民增收的一个主要来源。天然林禁伐以前，他们能通过砍伐林木、装卸和运输木材、修建和养护林区公路获得劳务收入，维持家庭的正常开支。天保工程实施后，当地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大大减少，尤其是林区农民，甚至出现了返贫现象。这种强制性保护措施导致当地居民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

（四）人口素质偏低，人力资源开发机制不健全

该区域人口受教育程度和整体文化素质依然偏低，长期制约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人力资源的配置机制尚不健全、不完善。在劳动力市场建设方面，除了州级劳动力市场较为规范，区内县、乡两级劳动力市场发育尚不充分；人力资源流动性往往还是通过传统的人际关系传递信息进行流动与配置；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服务体系也不健全，往往只有劳务市场，人力资源市场没有得到重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与层次单一。

在劳动力利用方面，地方政府与企业 在制度创新和扩大就业方面的能力不强，难以形成“人尽其才”的社会环境；很多企业还没有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劳动能力、岗位与劳动报酬之间的关联度不强，劳动力正常的培训、晋升、加薪机制不健全；劳动者自身的经济主体意识弱，自主创业、自主择业的意识与能力差，难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由此导致区域目前人才闲置与流失现象较为突出。据调查，较高层次人才多数集中在州级、县级单位等经济相对繁荣的地区，这些人才往往因经费不足、待遇差、项目少等原因，造成工作任务不饱和而闲置，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部分人才虽然政治思想较好、业务素质高、管理能力强，却只能坐等得不到提拔任用，造成闲置；很多州市的人才外流现象较为突出，许多专业技术骨干纷纷到州外经济发达地区寻找发展机会。

三、“三江并流”及相邻地区发展的对策

（一）“三江并流”及相邻区域发展亟待上升为国家战略

“三江并流”及相邻地区是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南方大部分省区的“水塔”，是世界物种和遗传基因宝库，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生态区位极为重要，生态功能地位突出。加强该地区发展与建设，不仅关乎云南、四川和西藏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中

国长江流域广大地区乃至东南亚地区都将产生重要作用。

从目前的情况看,该地区目前仍处在国家层面规划关注之外。这里承担着生态安全、国防安全、巩固边疆、民族团结等重任,默默地为国家做着重要贡献,却长期处于政策边缘地带。由于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经济发展较差,在贡献的同时失去了一些发展机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从而造成目前发展能力较差、发展后劲不足的局面。如果不将其发展迅速上升为国家战略,就难以缩小与周边省份以及发达地区的差距,这里就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政策塌陷区”,就会彻底掉入“后发劣势”的陷阱中。

为此,这既需要云南、四川、西藏三省区自身的不懈努力,更需要国家从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高度给予全面的指导和支持。

(二) 加快推进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探索生态富民互动模式

生态移民是解决该地区发展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与居民脱贫矛盾的有效手段。对具备一定发展条件的,通过整村推进、整乡推进切实加快脱贫步伐;对就地难以发展的,实行易地搬迁,采取相对集中和分散安置相结合的方式,加快移民搬迁步伐。

进行生态移民必须要坚持尊重百姓自愿选择权,真正实现“迁得出”;完善移民配套设施,让移民能“稳得住”;加强对移民的技能培训,让移民“富起来”;重点完善移民区内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和生态家园。在生态移民迁出问题上,必须尊重当地移民的民族习俗、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在制定多种可行性方案的基础上,充分调查老百姓“搬到哪、怎么搬”的意愿。搬迁对象集中在以下三类群体:一是对山区内常年从事乡镇、县城务工、经商或有一技之长,且收入来源相对稳定,有条件且自愿在城镇定居的人口;二是居住分散、交通困难、信息闭塞、现代文明难以进入、生态环境恶劣,缺乏生存发展环境,难以形成主导产业,没有稳定收入来源,不易就地脱贫,具备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三是在地质灾害隐患区、存在严重威胁人身财产安全隐患的村户。

搬迁方式可因地制宜,选择就近集中安置、集镇及集镇周边安置和县城安置等多种方式。迁入地范围可根据山区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社会现状,围绕“住房、设施、产业、生态、发展”五个重点,按照“板块开发、整村推进、城乡统筹、科学发展”的思路整体推进,搬迁迁入地可以是:县城及县城附近、城乡结合区域;集镇及其周边地区;沿干、支线公路以及基础设施条件相对好的中心村;有开发条件的国营、集体林场区。

(三) 组建“国土守护员”队伍,实现“强边、兴边、稳边”目标

在该地区如何来保护承担守边建边任务的边境沿线居民的利益是必须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也是当地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根本利益问题。由于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水平较低,在生产资料拥有、生活质量水平方面,与其他区域农牧民差距较大,至今仍有很多居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边境地区,有些居民点至今不通路,不通电,点油灯,交通工具靠牲畜,信息传递靠人,但为了祖国守边的大仁

大义，他们甘守清贫、寂寞，不计个人得失，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付出，不畏艰险、寸土必争、忠于职守，为确保国防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地处边疆，许多边民世代守护国土，他们是不穿军装的护边员。“一个居民，就是一个流动的哨兵；一家农户，就是一个固定的哨所。”当地居民世代生活在边关，对辖区的情况了如指掌，地形熟、人员熟、情况熟、语言通，能及时掌握第一手边情信息。他们虽然不穿军装，却与共和国千千万万的边防军人一样，用满腔赤诚甚至鲜血和生命，守卫着祖国的边境沿线。怒江州的边境线长达449公里，拥有省级口岸和20多条通道，地处云南通往缅甸及东南亚的重要地带，是云南连接太平洋、印度洋、东南亚的重要枢纽。随着边境地区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些曾经的边防禁区成为双方经贸往来、共同开发的热点地区，边境旅游、探险等活动日趋频繁，出入境人员、车辆逐年递增，非法采挖药材、走私贩毒事件时有发生，边境管控难度随之加大，依靠传统的护边员队伍建设模式已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而，如何发挥当地居民的积极性、打造永不换防的哨兵，进一步凝聚军警民力量，构筑军警民大联动铸造的铜墙铁壁，在当前新形势下显得更加重要。

事实上，该区域的各级党委政府也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他们坚持以“一个支部就是一个战斗堡垒、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边民就是一个哨兵”为目标，发动边民主动加入守防的行列，一面面鲜红的国旗、党旗飘扬在家家户户的屋顶，格外引人注目。所以，只有增强居民国土观念和责任意识，才能在边疆线上构筑起一道军民联防的铜墙铁壁。

为此，中央政府应结合边境地区实际，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关怀，组建起一支由当地群众组成的“国土守护员”队伍，中央财政应像对待边防军人一样，从人力、财力、物力上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发挥他们熟悉地方情况的优势，协助公安边防派出所践行护边卫国的神圣使命，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使他们安心守边，进一步筑牢维护祖国边境安宁和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

（四）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区域内道路交通设施、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善区域基础设施条件，有利于区域生产要素及产品的跨地区及跨国流动，打破封闭式发展环境，加快与外界的物质与信息交流，实现经济资源与要素的优化配置。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具有很强的乘数效应，能够拉动国民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基础设施的薄弱表明这些地区的投资环境和条件差，弱化了这些地区市场发育程度和外部区域经济增长对这些地区的辐射作用，使之失去很多发展机会，阻碍与外部环境的交流和沟通。以怒江州为例，据统计，建州以来国家和省对怒江州的基本建设投入约为36亿元，仅占云南省同期投入的1%左右。在水

电、矿产两大优势资源因环保原因而开发困难时，亟需大力发展的旅游产业却受到以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制约。全州境内无机场、铁路、航运、国道，道路等级低，通达能力差，城市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因此，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该地区的交通网络。在公路、机场、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中，加大主要运输通道、运输枢纽建设力度，努力形成以公路运输为主体，以空运为辅的综合应急输送保障网络，在维护边疆安全、社会治安、防汛抗旱、森林防火、矿山救护、医疗救护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五）促进生态农业快速发展

农业是目前该区域的支柱产业，要从根本上化解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这对矛盾，就必须改变整体思路，同时也要政府发挥财税政策的引导作用，发展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于一体的生态农业。生态农业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多层次综合利用和系列化深加工，实现经济增值，实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降低农业成本，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持续性，保护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创造内部就业机会。这既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又能使当地农民受益，可以极大地缓解自然保护区与周边居民之间的矛盾。

围绕增强农产品竞争力，加快优势农产品向优势区域集中，发展壮大一批对农业主导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发展订单农业并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构建政府-产业协会-龙头企业-专业农民等“四位一体”的产业化经营体系，采取“公司+协会+农户”的形式，形成原料、加工、销售连接优化的产业链，重点发展芸豆、马铃薯、中药材、蔬菜、花卉等优势产业，构筑农特产品生产的生态链。

（六）做大做强旅游产业，打造世界知名生态旅游品牌

生态旅游是一种能够保证生态环境可持续利用与发展，有效提高旅游业发展能力和居民福利水平并使其承担相应责任及义务的旅游方式，是一种共赢、共享、可持续的旅游发展模式。只有从战略高度认识旅游地的生态问题，运用生态学的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来规划和开发旅游地，做到旅游区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才可能使旅游业真正成为“无污染产业”，成为区域产业链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该区域发展生态旅游业要按照“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对生态旅游的各个环节全面规划、综合开发，实现旅游资源的再生循环，达到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统一。

首先，加大旅游资源保护力度。由于该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品位和级别高，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势在必行；但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在开发利用与保护矛盾相冲突时应以保护优先，坚持“分级保护”、“分区保护”和“分类及要素保护”的多类别保护，树立整体保护的思想，保护其自然景观的完整性、人文景观的独特性以及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和

谐统一性。

其次，开发民族文化风情游，发展生态旅游。不同的民族文化民族风情，给该区域带来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充分发掘民族文化的前提下，积极开发民族文化风情游，把旅游业作为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主导产业来培育建设，围绕原生态旅游目的地要求，加快推进世界知名生态旅游品牌建设进程，把旅游业与民族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旅游发展机制。

最后，改革分散的管理体制，为打造世界知名旅游品牌提供保障。针对目前保护区内所形成的横向分部门管理、纵向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格局，生态系统各要素的关联性被管理部门界限、行政区界限等人为因素割裂开来。分部门、分级别的管理体制，决定了保护区管理事权划分的格局，也进而决定了资金分配的格局和方式是割裂的、缺乏统筹安排。因此，为了打造世界知名旅游品牌，需要建立相对独立的社会性管制机构。该机构既可以排除地方政府受地方利益的驱动而片面追求本区利益而采取政府意志干扰，也可以避免多个行政管理部门共同执法、职权不明、执法尺度不一、重复执行的突出问题，同时维护了执法的专业性、独立性，提高执法效果。

参考文献：

1. 王德强、廖乐焕，2011，《香格里拉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 何忠俊、王立东、郭琳娜等，2011，《三江并流区土壤发生特性与系统分类》，《土壤学报》48(1)。
3. 王金亮，1993，《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北段森林土壤垂直分异规律初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3(1)。
4. 王晶、何忠俊、王立东等，2010，《“三江并流区”不同类型土壤腐殖质特性的研究》，《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5(5)。
5. 王金亮、角媛梅、马剑、郝维人，2000，《滇西北三江并流区森林景观多样性变化分析》，《林业资源管理》(4)。
6. 刘伦辉、余有德、张建华，1984，《横断山自然植被垂直带的划分》，《云南植物研究》6(2)。
7. 陈砮、曹礼昆、陆树刚，2004，《三江并流的世界自然遗产价值——生物多样性》，《中国园林》(2)。
8. 郭立群，2004，《云南三江并流区森林地理分区》，《西部林业科学》33(2)。
9. 朱振华、毋其爱、杨礼攀，2003，《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资源现状及保护》，《林业科技》28(6)。

责任编辑：晨乔

· 案例研究 ·

华为：开放式创新打造世界一流 高科技型跨国公司

王子先

摘要： 华为通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逐步形成了适应经济科技全球化的开放式创新路径与做法，并迅速发展成为国际一流的高科技型跨国公司。华为开放式创新战略的成功经验，值得国内企业广泛学习和参考，也为我国新形势下正确处理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 华为 通信设备制造商 ICT解决方案供应商 开放式创新

作者简介： 王子先，商务部驻深圳特派员办事处特派员。

华为从一个从事通信产品销售代理的民营企业，成长为全球第二大通信设备制造商和世界500强企业，并正向ICT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功。华为的成功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也是自身不懈探索和不断提升创新能力的结果。正如公司总裁任正非所言：公司运转主要依靠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商业模式，一个轮子是技术创新。华为开放式创新体系恰恰形成两个轮子的聚合，对公司的跨越式发展发挥了支柱作用。近年来，华为一直处于全球通信行业第二，2012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1027亿元，同比增长5.1%，整体销售收入首次超过爱立信，成为全球第一。华为海外营收从2000年的1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219亿美元，目前海外营收占整体销售收入70%以上，成为国际一流的高科技型跨国公司。

一、华为开放式创新的成就与理念

（一）华为开放式创新的主要成就

1. 长期持续高水平的创新投入。华为是从创立之初就重视创新的企业，把创新看做企业的灵魂。1998年制定的《华为基本法》规定，每年以不低于销售额的10%用于研发，

并一直坚守这一原则，不间断地投入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他们一开始就把目标锁定在通信核心网络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上，明确技术创新是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生命线，把创新作为培育核心竞争力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持之以恒付出努力。目前，华为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达12%，自2000年以来累计研发投入超过150亿美元，收获大量的技术成果。这些投入所产出的创新性产品，使全球1/3人口享受到了华为便捷优惠的服务。

2. 国际化人才队伍和创新体系。截止2008年底，华为近8万员工中，海外员工超过22000人，其中海外本地员工超过12500名，包括高层次技术、管理人才，华为员工本地化率达57%。华为有着庞大的研发队伍，目前从事产品和解决方案的研发人员有62000多名，占公司总人数的44%。华为在各领域吸收了许多世界上顶尖的一流科学家。为了整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与人才，配合公司国际化经营，华为不断推进研发国际化进程，建立开放式创新体系。1999年华为在印度班加罗尔成立华为印度研究所，迅速提升了自己的软件开发水平；2000年之后，华为陆续在美国、瑞典、俄罗斯建立研究所，通过这些前沿的触角，吸引国际先进的技术和智力资源，为提升研发创新水平提供了支撑和服务。目前，华为在全球设立23个研究所，在3G等产品领域实现了全球同步研发。华为还与全球领先的运营商建立了34个联合创新中心或实验室，拓展企业价值链，把领先技术转化为客户的竞争优势和商业成功。

3. 研发成果和发明专利跃居全球领先地位。华为与对手的竞争首先是核心技术的竞争。从1992年开始，华为就紧跟世界数据通信技术的最新趋势，全力研发数字程控交换机，并取得成功。华为独创的SDH同步数字通信接口技术，使程控交换机性能大大提升。交换机取得成功后，华为将研发集中到以SDH技术为核心的光网络传输产品上，随后又根据市场变化将重点从有线转到无形，从CT2、ETS等第一代模拟技术起步，转向第二代GSM，然后转向3G技术，如今在4G（LTE）方面华为已跻身全球第三位。在全球无线技术的竞争中，华为已经从2G的跟随者，跃进为3G的竞争者，进而成为4G的领跑者。华为在研发创新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到2011年底累计申请中国专利36344件，国际PCT10650件，获得专利授权23522件，其中90%以上为发明专利。在云计算技术上拥有中国专利685件，欧洲专利226件，美国专利107件。在国家专利局发布的发明专利授权量排行榜上，华为多年来一直居首；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08年排名中，华为《专利合作条约》申请量达1737件，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大国际专利申请公司。华为连续6年夺得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第一，连续3年占据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第一。2010年，美国著名媒体评选的全球最具创新力十大公司，华为赫然在列，并位列第五。在业界眼中，华为已成为全球通信领域技术创新的样板和典范。

4. 知识产权战略成为公司的核心战略。为了完善创新管理体系，华为建立了强大的知识产权队伍，拥有300多名专门从事知识产权相关工作的技术专家、专利工程师和负

责版权、商标、许可等业务的律师；华为知识产权部于1995年成立，部门专业人员230多人。华为制订了全面严格的知识产权、版权保护制度和流程及相应的操作手册；出台了一系列专利创新鼓励办法，较好地调动了员工创新的积极性。如今，知识产权战略已成为华为的核心战略，不仅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成为公司创新文化，而且形成了持续创新发展的有效机制。目前，华为知识产权战略形成三大抓手：一是主攻有优势的核心领域，强化核心竞争力、知识产权和品牌实力，拓展全球专利布局，提升全球竞争力；二是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推动所有技术方案纳入标准，积累基本专利；三是始终以开放的态度学习、遵守和运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通过协商谈判、产品合作等多元途径处理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四是用专利换技术，通过交叉许可实现对全球范围内创新成果的整合应用，华为每年花费数千万美元在全球申请专利，但经过交叉许可后，每年节省的专利许可费达数亿美元甚至十亿美元以上。因此，单纯的专利申请也许对企业并无效益，但当企业将这些知识产权及技术与领先的跨国公司进行交叉许可时，不仅大大降低单向的专利许可费用，而且能促进专利技术的广泛使用，带来巨大效益。

5. 从通信设备制造商向ICT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从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民营贸易代理商成长为全球通讯设备第一大制造商，是巨大的跨越。但是，华为并没有因此止步，适应全球跨国公司向高端服务环节转型新趋势，以IBM转型为蓝本，华为开始了新的转型。华为在2011年公司年报中表示，该年是其业务重新布局之年，新业务取得了蓬勃发展，开启了向运营商网络、企业业务、消费者业务的端对端的ICT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并相应优化了面向未来的业务架构和管理流程。如任正非最近所强调的：IBM横向整合很成功，苹果是纵向整合的成功案例，华为选择沿着通信网络管道来整合，通信网络管道是太平洋，是黄河、长江。我们相信，华为能够打造新的全球资源整合网络，搭建沟通制造与服务、供应商与消费者的新的运营体系和商业模式，成为中国ICT领域的IBM。

6. “2012实验室”准备新跨越。“2012实验室”是华为专事创新基础研究的一个部门，其名字来源于电影“2012”，任正非在看了这部电影后说：以后信息爆炸像数字洪水一样，华为想生存下来就得造诺亚方舟。作为华为创新、研发和平台开发的平台，该实验室致力于构筑华为未来技术和研发能力的基石，是为其业务集团（BG）提供支撑和服务的端对端的责任中心。它是基于ICT产业的巨大转型而做出的决策和行动。智能终端的普及、云计算的出现，推动了IT与IC的加速融合，宽带时代带来洪水般的数据流量，带来ICT时代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华为必须加强对前端技术的研究，破解从行业跟随者向领跑者转身之后的难题，更好发挥行业创新引领者的作用，抢占技术创新的制高点。

7. 与世界跨国巨头建立技术战略联盟。华为专注于自己优势领域的研发创新，同时与国内外广大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与一些跨国巨头共建研发中心，形成长期战略合作联盟，建立了开放式创新体系，实现互利共赢。到目前为止，华为与领先

运营商建立了34个联合创新中心。2012年7月，华为与SAP签署合作协议，达成全球技术合作伙伴关系，合作内容包括深入研发合作、深化技术整合与技术支持，建立互操作性测试中心，构建有竞争力的企业应用解决方案并开展全球共同的销售和营销活动。SAP拥有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创新、前沿实践和宝贵经验，尤其是在企业应用、商务分析、移动商务、云计算、数据库及技术平台等5大领域，形成了针对企业客户管理信息化需求的整体解决方案和产品体系；华为则在ICT基础设施方面有着深厚的技术积累，并正致力于向ICT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双方的合作将为客户提供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和更易管理的融合解决方案，让IT更便捷，让业务更轻松。可以说，华为与SAP达成全球技术合作伙伴关系，既是华为致力于建设更加开放的全球化创新体系的战略选择，也是借助SAP的平台和操作经验，找到一个加快向ICT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的战略推手。

8. 在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逆势而上。华为持续不断致力于开放式创新，大大提高了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市场美誉度，赢得了全球客户的信任和支持，推动了华为业务收入的高速增长。但是一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才是真正考验华为的时刻。在世界经济衰退、众多国际巨头业绩滑坡的大背景下，华为逆势而上。2008年，华为合同销售额达230亿美元，实现同比增长46%，2009年销售收入继续快速增长。而2008年，沃达丰、爱立信等世界电信巨头营业额纷纷滑坡；此后，诺基亚、摩托罗拉等跨国巨头都经历经济衰退的煎熬。

从一家小型民营企业到与跨国巨头同台角逐、与狼共舞，华为只用了21年的时间，其成功的背后是华为独特的发展模式：开放式创新。开放式创新造就了华为的辉煌，实现了华为跨越式升级，也将为华为带来更大的跨越。

（二）华为开放式创新的经营理念

1. 从跟随式创新为主发展到与国际巨头同步的开放式研发。中国通信行业发展较晚，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因此，华为在研发上一直采取跟随策略，即在行业领先厂商首先研发出新技术、新产品，并证明有商业价值时，华为才全力投入资源进行产品开发，研发投入90%以上投入到应用技术的开发，只有10%投入到基础研究；华为的基本做法是，以客户需求驱动研发流程，围绕提升客户价值进行技术、产品、解决方案及业务管理的持续创新，广泛推行集成产品开发流程（IPD）。在技术和市场实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实现“弯道超车”；同时，华为还充分利用国内人才的低成本优势，使得自己的研发成本大大低于欧美，他们用低得多的成本研发出与欧美相比性能更好的产品；同样，在新产品营销上也是以低价为起点，发挥中国劳动力和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逐步积累资金、技术、人才实力，稳扎稳打，先在国内市场上立足再开拓国际市场，先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再图跨越。如今，华为在3G等产品领域实现了全球同步开发，开始了从跟随者

向领先者的转变。

2. 确定国际一流企业的定位，站在巨人肩膀上高起点起步。华为很早就确立了做国际一流企业、实现与国际接轨的目标定位，但他们也认识到中国企业与美欧日企业差距巨大，特别是在高端技术和管理领域，而在通信技术领域西方更是遥遥领先。为了生存，华为只有站在巨人肩膀上努力追赶，力争与世界同步。华为的选择是，把国际一流运营商作为全方位学习的榜样，与其长期合作。华为在技术上推行跟随式创新，很早就与德州仪器、惠普、IBM、摩托罗拉等建立联合实验室，以获得他们的技术支持。与对手联合起来搞研发，既可降低成本又可加快创新步伐，还更易打开市场。特别是中国“入世”以后，华为进一步确立了与对手互利共赢的竞合战略。同时，华为的规划和流程管理同样也向西门子、阿尔卡特、爱立信等业界最佳企业靠拢，借船出海；华为很早就请国际著名企业为其做管理咨询，重组管理与业务流程，基本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管理运作体系。正如任正非所指出的：华为要首先承认技术上的差距，广泛吸收世界电子信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虚心向国内外优秀企业学习，在竞争中学会竞争，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开放合作地发展领先的核心技术。

3. 实行“拿来主义”与自己研发相结合。华为的技术路线总体是基于对“拿来主义”的实践应用，在“拿来”基础上有所创新。华为这种技术路线也是经历巨大改进的过程。最初，华为大力推行自主研发，以实现向“技术华为”的转型。但是，这也导致华为研发效率低下，难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质量和竞争力较差。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华为开始实行新的技术路线，将“自己研发”与“拿来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作为企业的发展方向，不管白猫黑猫，凡是有利于华为的发展就是好猫，目标是紧跟世界先进技术的潮流，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公司占领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服务。实行“拿来主义”的途径多种多样，通过谈判支付合理的专利许可费是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途径，技术合作、战略联盟、跨国并购、投资合作等等，都是迅速实现技术积累的重要手段。

4. 坚持创新的市场和客户导向。随着技术路线的变化，华为也实现了从技术驱动向市场驱动的转变，务实成为华为技术路线的新特色，满足客户需求成为创新的根本宗旨。由此，华为逐步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文化。新的研发体系有两大特点：一是保持持续领先；二是以客户的价值观为导向，强化客户服务，追求客户满意度。正如任正非2002年所强调的：我们的结构调整要完全以商业为导向，而不能以技术为导向。目前，华为投入1万多人研发队伍，70%的研发经费，用于基于当前客户需求的产品研发，保证了华为在NGN·VADSL宽带、光网络和3G等领域在全世界处于同行第一阵营的位置。

5. 封闭系统必然死亡，开放才能提高创新活力。华为奉行的开放式创新，是在“拿来主义”基础上的创新。与开放式创新相对的是封闭式创新。所谓封闭式创新，是指完全依

赖自己研发，忽视该领域已有的先进创新成果和成熟技术，闭门造车，将造成重复劳动和研发的低效落后。国内外有很多失败的例子，如日本在开发2G移动通信技术时，就犯了封闭式创新的毛病，最终导致日本2G网络与全球其他网络无法对接兼容，付出巨大代价。而任正非在最近一次讲话中强调：我们今天的创造发明不是以自力更生为基础的，我们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向全世界开放，而且通过互联网获得巨大的能力，华为也获得了巨大的基础。如果我们不用供应商的系统，就可能是建立了一个封闭的系统，封闭系统必然要能量耗尽，必然死亡；人力资源不能做封闭系统，技术系统也不能做封闭系统。我们在创新的过程中，强调只做我们有优势的部分，别的部分我们应该更多地加强开放与合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真正的战略力量。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特别是硬件体系更要开放。如果我们不向美国人民学习他们的长处，我们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

二、华为开放式创新的路径与做法

华为通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逐步形成了适应经济科技全球化和世界通信领域发展潮流的开放式创新路径与做法。

（一）专注优势领域，提升核心竞争力

在实力很弱的时候，华为便将未来定位于“做世界级的领先的通讯设备供应商”。此后，华为抵制住各种诱惑，集中所有资源于信息技术领域，致力于打造世界级品牌。华为还将这一点写进《华为基本法》，规定华为不从事任何分散公司资源和高层管理精力的非相关多元化经营，甚至永不进入相关的信息服务业。当然，后来随着ICT领域制造与服务的日益融合，这方面逐步改变，甚至现在的定位变成向ICT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但是，华为始终遵从专业化分工规律、专注优势领域的基本原则一直未变。在明确的专业化目标定位下，华为坚持以占收入10%以上的经费持续投入技术研发，在对国际通信技术进行系统跟踪的基础上，在一些关键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带来核心技术的突破。20世纪90年代末，在2G还在大行其道的时候，华为就开始将研发目标瞄准3G。由于专注于专业化道路，华为放弃了做终端小灵通的市场机会，不做3个月可以开发出来的东西，而连续3年主攻3G。到2003年底，华为3G终于进入商业运营，并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为华为未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集中力量做好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2001年华为将其电气业务部门——现在的安圣电气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作价7.5亿美元出售给美国的艾默生电气。华为把技术、营销和客户关系都列入核心竞争力的范畴，把市场作为检验的标准：客户选择就是核心竞争力。在华为眼里，技术与产品是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方面，管理与服务的进步远比技术进步重要。在这个中心思想指导下，华为在技术、销售模式和服务等领域都逐步形

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并不断巩固和提升了自己在通信设备领域的竞争优势。不搞多元化，走专业化道路，走稳健的道路，成为华为一以贯之的经营战略。

（二）注重服务外包，提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

为了专注于优势领域、提升核心竞争力，华为将一些通信设备制造环节外包给国内的供应商，在芯片等一些高端领域与跨国巨头建立长期稳定的采购供货关系，实现了制造环节的外包化；随后，华为还将信息服务、软件、培训、数据恢复、管理咨询、设备测试维护及后勤等非核心服务环节广泛外包。华为一直致力于淡出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等技术要求不高的环节；为了生产和销售3G手机，华为将其移动终端业务分拆出去，成立了“华为移动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华为与国内外众多的信息软件服务商建立了外包协作关系，为公司运营信息化、网络化和配套服务提供了资源支撑；华为还与国内外高端管理咨询及培训服务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由后者提供相关服务。通过广泛的服务外包，不仅优化了业务及管理流程、降低了成本，而且搭建了聚集全球优势资源的平台，提升了全球资源整合能力，促进了从技术到管理和服务的全方位创新。

华为认为，必须以开放心态整合业界的各种资源，高度重视与供应链上企业的合作，并藉此建立整合全球资源的平台。华为上下游关联企业多达数千家，包括很多国内外知名企业。华为将自己的供应链视为与客户、制造商、供应商、渠道商共处一条船上，只有加强合作，关注客户及合作者的利益，追求多赢，才能可持续发展。正如任正非所说，未来企业的竞争，再也不是单一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三）以合资合作及技术联盟实施技术和市场拓展双核路线

华为很早就认识到，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努力找到相关的战略合作者，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协同竞争群，才能立足，并达成共赢式发展。所以，华为在不断加强自身核心竞争力建设的同时，一直致力于与更多的优势企业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发展战略联盟。这样的路径在全球化时代具有普适性，光想着吃独食，企业难以存活。但华为有自身特点，选择了以市场拓展为起步、技术和市场拓展并重的双核路线。

1997年，华为进军国际市场的第一步选择了俄罗斯，他们在当地建立了合资公司，以本地化模式开拓市场。尽管最初并不顺利，但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从2000年开始终于迈出了关键步伐，营业收入每年以100%的速度增长，2001年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市场占有率达14%，成为该市场主导品牌；2003年，在独联体国家销售额超过3亿美元。在泰国，华为通过与移动运营商AIS的业务合作逐步在当地市场站稳了脚跟。2001年，华为与松下、NEC合资成立宇梦公司，打开了日本市场。借助“他山之石”，成立合资公司，投入很少的资金，既可以学习对方的长处，又进入对方的市场，可谓一箭双雕。

华为在推进国际化经营上不断取得成功，通过合资合作打开了国际市场，2004年华

为海外销售额突破20亿美元。同时，通过合资合作和战略联盟，华为也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正如任正非指出的：如果我们和对手联合起来搞研发，共同研发一个产品，研发成本降低一半。华为很早就与德州仪器、惠普、IBM、摩托罗拉等公司建立了联合实验室，以获得他们的技术支持。2003年3月，华为与美国3COM公司宣布成立合资公司，8月与西门子合作共同研发3G，9月与欧洲著名半导体公司——英飞凌科技公司合作开发低成本WCDMA平台；2006年7月，华为与摩托罗拉宣布合作计划，在上海成立研发中心，致力于3G产品解决方案和高速分组接入方案的研发。2003年，华为曾与思科打得不可开交，但后来双方决定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2012年，华为与SAP的合作更是揭开了与跨国巨头战略联盟的新篇章。华为的创业创新之路，成为一条广结同盟的战略之路，藉此华为创造了一个无边界的整体解决集合器。

（四）以管理和服务创新支撑开放式技术创新体系

中国企业与国际一流巨头相比，不仅存在硬件技术上的差距，更有经营理念、战略思维、管理方法和商业模式上的巨大差距。这方面华为的成功尤其难得，因为华为很早就确定了与国际先进管理体系接轨的目标，像重视技术创新一样重视管理和服务的创新，实现从技术、产业到管理和服务的全方位创新，成为华为开放式创新的最大特色。从1997年开始，华为就引入国际著名企业为其做管理咨询。最初，华为与合益集团合作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变革，建立新的职位体系、薪酬体系、绩效管理体系及员工素质模型；之后，引入德国国家应用研究院做质量管理顾问，聘请普华永道做财务顾问，聘请KPMG做审计等。1999年，华为又与IBM合作，重组了业务流程，建立了集成产品开发流程和优化集成供应链。随着信息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华为”Intranet网络专线连接了其国内所有机构和拉美、独联体、欧洲、海外研究所等海外机构。

华为一直致力于构建与世界一流企业接轨的管理体系，2000年任正非提出“十大管理要点”，1998年引入IPD（基础产品开发），2000年引入ISC（集成供应链），推动了华为在公司运作、质量体系、财务、人力资源等方面持续不断的变革。如今，华为基本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管理运作体系。

同时，服务创新也迈出重大步伐，并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的最终保障。通过建立满足客户多种流程的服务供应链，来准确把握客户需求，提供增值服务，达到发现和创造市场需求的目的。华为建立了规范的服务体系和流程，为一流运营商提供完善的专业化服务平台和职业化服务队伍，并不断优化服务质量，使华为的公司能力和品牌的影响力得到提升。

（五）以人才国际化支撑开放式创新平台

技术和管理的创新最终都依靠人才。在华为看来，公司最宝贵的财富是人才，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是人才，要抢占高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必须抢占人才高地。正是由于重

视人才，华为得以聚集了愈来愈多的优秀技术、管理和服务人才。华为既重视内部培训培养人才，同时也大量引进海外人才，引进国际上先进的人才培养机制，采取国际通行的人才考核标准。特别是伴随华为国际化经营，华为开始探索人才国际化之路。聘请国际先进的企业充当管理顾问，既为华为带来好思想、好方法，也锻炼了华为人的国际化思维能力。伴随公司国际化业务的拓展，华为还在进一步加大人才国际化步伐。根据华为官方数据，近年来，华为聘请海外人员每年增长15%以上。外籍员工的大量加入，特别是高端海外员工的加入，成为华为拓展欧洲和其他市场的重要武器，愈来愈多的海外人才进入华为中高层管理和技术专家队伍。

（六）基于市场需求和客户导向的开放式创新

苹果乔布斯的成功主要是基于客户互动体验的技术应用合成创新，而不是简单的硬件创新。任何技术和管理创新只有经受市场检验和客户认可，才能真正创造价值、实现增值。正如任正非所强调的：一定要强调价值理论，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一定是为了创造价值而创新。华为的技术与管理创新，就是要建立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运营体系，建立长期稳定地为客户服务的价值观，将争取更多的客户满意度作为核心竞争力。华为建立了专门的客户需求研究部门，将全球客户声音反馈到研发部门，形成产品发展的路标，开发出优质新产品。华为在国内市场上的成功，依赖的是客户导向的核心价值观；华为进军国际市场，短期靠低价策略，长期也同样坚持这一价值观，把握客户的不同需求，把握行业的脉搏和时代的发展趋势，按需应变，才是赢得未来的关键。华为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成功把握了这一导向。

华为的开放式创新体系建设也面临着从跟随者向领先者转变的挑战。依靠低成本的研发能力，中国的一些高科技龙头企业实现了大跨越，但是要成为国际一流巨头，他们还必须克服过去起步阶段的路径依赖。对于这些企业而言，一般都存在前沿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的不足，形成对低成本、高速度的过度依赖，比较容易使他们在下一次变革浪潮中从领先变为落后。摆在华为等龙头企业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提升自己的战略决策能力，基础研发能力和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显著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真正完成从追赶者向领先者的角色转变。

三、几点启示

华为长期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开放式创新战略是其成功的重要保证，值得国内企业广泛学习和参考，也对中国新形势下正确处理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进一步走好以开放促创新之路，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开放式创新顺应了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

当今世界，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成为大趋势，经济全球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继贸易、投资、生产、金融全球化之后，信息全球化突飞猛进，研发设计全球化取得重大进展。跨国公司全球化已从降低成本、开发市场等应用性领域发生战略性转折，研发全球化逐步成为其核心战略，目标是整合利用全球优势要素和科技资源，为增强其核心能力、提升全球资源与市场掌控力服务，以此适应全球技术创新周期不断缩短新形势，迅速占领国际竞争制高点。继农业、工业革命之后的服务业革命，更带来全方位的技术、管理、理念和商业模式的变革；日益强大的供应链网络支撑服务全球化蓬勃发展，形成了更广、更深的全球分工与生产服务网络体系；服务外包成为战略推手，信息软件等成为技术和管理创新更密集、更频繁领域，同时作为产业粘合剂还极大推动了整体产业组织的革命，形成生产制造与服务既高度分工、又密切融合的格局。制造业信息化、智能化与服务业数字化、模块化、工厂化并存，使得全球技术管理创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全球化大格局下，只有建立开放式创新体系，才能与全球庞大的生产服务体系互联互通，最大程度上整合利用全球技术发明成果、知识、人才和优势要素，站在巨人肩膀上高起点起步，运用后发性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与创新。任何单个国家、企业、机构或个人在浩浩荡荡的经济科技全球化大潮下，想关起门来自己完全独立搞发展和创新都是不可能的。尽管不同行业和领域全球化程度也有不同，不同国家国情和经济技术实力差异很大，可以结合实际，选择本国技术管理创新的战略路径和方法步骤，但更好、更充分利用外部创新资源、成果和人才是必然选择，走开放式创新之路是大势所趋，除此别无选择。

(二) 开放式创新符合中国国情，是新形势下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必然之选

过去30多年，中国开放与改革互动、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巨大成功，不仅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而且也创造了以开放促体制转型和技术创新的成功范例。中国成为经济贸易大国，并正向经济贸易强国迈进。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型经济的历程在世界经济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至今已成为很多新兴经济体学习的榜样。同样，以开放促创新也一直是中国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的重要途径，在一些沿海地区甚至成为主渠道。从引进技术、学习世界先进管理方法，到贸易投资的竞争外溢效应，到企业对外技术许可、合作与战略联盟，再到“走出去”与狼共舞，我们在开放与合作中提升水平，在竞争中学会竞争，在遨游大海中学会搏击，不断提高了利用外部科技成果、知识、人才和资源的程度与能力。开放还是打破垄断、催生制度创新的关键途径，释放出巨大创新活力，中国从微观企业到中观产业及区域经济，再到宏观体制机制，都留下了以开放促创新的轨迹。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综合国力与经济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坚定不移坚持对

外开放基本国策，是吸取过去30多年成功经验的选择，更是经济科技全球化和服务革命时代大潮下的必由之路。在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变过程中，以开放促创新是新形势下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新体现、新要求。

（三）开放式创新更具效率

从全球范围看，在过去10多年里，为了更广泛吸收全球创意、加速创新，更好地掌握顾客需求、把握市场机会，“开放式创新”进一步成为世界潮流。IBM、宝洁等公司为开放式创新提供了新的典范。大量案例证明，“开放式创新”可以减少重复浪费，大大加快创新速度，提升创新效率。2000年，宝洁公司CEO雷富礼建立了“连续与发展”的开放式合作战略，推行与外部创新者甚至部分竞争者之间信息共享、项目联合开发，率先实践了“共赢式合作”的创新理念；IBM进入开放源代码世界以后，通过论坛、维富和其他网络，使得研发者能够较早与更大范围的人员取得联系，公司成百上千的项目可以让公司以外的顾客、竞争者和其他设计者参与进来，每个项目都利用规模庞大的开放式团队的智力成果，以分散摊薄软件开发成本。同样，中国的华为选择了“开放式创新”模式，成就了世界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老大的位置。这些成功的实践使得开放式创新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更加规范，将引领研发创新全球化潮流，促进全球创新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四）开放式创新已经成为新的商业文化

从成立之日起，华为一直高度重视技术创新，把创新作为立足之本，认为不创新才是最大的风险。但是华为人也认识到自己实力不足，在通信领域中国与世界存在巨大差距，最终没有选择全方位追赶，而是紧紧围绕核心网络技术的进步，投注全部力量，同时抓住核心网络中硬件与软件关键中的关键，形成核心技术。华为坚持“拿来主义”与自己研发相结合，在广泛技术合作与联盟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自己的核心能力。与IBM等很多国际巨头一样，“开放式创新”不仅是技术路线，更成为企业的商业文化，成为指导员工行动的方法论与世界观。任正非最近重申的“封闭系统必然死亡，开放才有活力”的理念，实际上成为华为的经营哲学，渗透到经营管理活动方方面面。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企业必须专注于优势领域，专注于核心技术，专注于核心能力，专注于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建设，有效提升对全球生产服务体系的掌控力，更充分利用外部知识、人才和各种创新资源，与广大客户、供应商、渠道商、运营商加强开放式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的竞合新格局，才能在开放中实现跨越，在开放中实现全方位创新，打造出一批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行业巨头。

责任编辑：刘英奎

2013年全球和中国经济展望

——专访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

本刊记者 牛铁航

记者：屈先生，您每个季度发布的汇丰PMI指数已经成为业界分析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走向的风向标，请您就此分析展望2013年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形势？

屈宏斌：展望2013年的全球经济，可以这样概括：复杂、缓慢和曲折。

在分析世界经济形势走向中，我先讲对欧元区的看法吧。欧债危机尚未完结，会继续对实体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欧洲经济基本面仍然疲弱，GDP环比小幅收缩的情况在2013年还将持续，我们对于欧元区GDP的预测为今年-0.2%，经济仍将在衰退边缘运行，从而欧洲对中国的进口需求疲软的状态仍将持续。欧债危机方面，欧洲央行去年9月6日出台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今年1月开始探讨具体执行去年10月欧盟峰会一致同意的采用单一银行监管体制的立法框架协议。尽管实际的执行要到今年更晚些时候，市场信心在去年三季度之后恢复明显，受债务危机影响大的几个成员国国债收益率明显下降，欧元区债务危机有所平复，但显然远未结束。

前瞻地看，欧债危机恶化的可能性虽然有，但已经不大。一方面，前面提到欧元区各国对银行业一体化等方面已经达成了一致。且欧洲央行的OMT尽管不是治本之道，但对于缓解短期的市场动荡冲击还是很有帮助的。另一方面，欧元区政治层面对于未来走向财政及政治一体化也有了一定的共识。明确了这样一个大的方向，也是弥补欧元诞生之后，货币同盟先行，但财政及监管体系一体化滞后的先天缺陷。

由于以上因素，我认为，今后不会发生欧元区解体以及成员国退出这样的尾部风险事件。

记者：展望全球经济，不得不看美国经济。美国一手推行货币宽松，甚至发明了QE infinity（无限宽松），另一手搞所谓的出口倍增和再工业化，其实质是否在实行“弱美元”政策？这会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说美国虽然向全世界释放流动性，造成流动性泛滥，却自己掉进了流动性陷阱，请您就此评述2013年的美国经济及对全球的影响。

屈宏斌：2013年美国经济复苏的道路仍然是曲折的。日前公布的美国2012年四季度GDP折年率收缩0.1%，大大弱于市场1%的增长预期。经济差于预期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防支出的缩减以及存货调整的影响，不会是持续性的影响。财政紧缩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尽管程度和冲击有所缓和，但总体仍然是负面的。而财政状况不好，决定了政策层面难以进行逆周期调节。需求方面，消费信心近期又有所回落，就业市场的改善也非常迟缓。企业对投资及雇佣仍会继续保持谨慎。因而我们预期今年美国经济复苏仍然乏力，GDP预测增长1.7%。货币政策方面，我同意克鲁格曼的判断，即美国经济目前是在流动性陷阱中，世界经济也仍然在下行通道。

从欧美的情况来看，实体经济疲弱的状态仍将持续，私人消费需求以及对资本品进口有直接影响的企业投资低迷可能持续到今年上半年，进而继续拖累中国出口增长。另一方面，货币量化宽松对于全球资本市场风险偏好提升的影响已经表现为对新兴市场资产偏好的上升，流入新兴市场资产不论数量还是收益都将有明显提升。

美国提出的出口倍增计划以提振经济归根结底也还是要看中国需求的走势。有人说美国的汇率政策是名义上的强势美元，实质执行弱势美元。弱美元显然有利于出口，但强美元对于维持其世界货币体系核心地位、保持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很重要。因而，美元汇率不会有大幅的贬值。新兴市场国家相比较而言会成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实际上，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尽管有所放缓，尤其是去年7.8%的增速更是回落至10多年来的低点，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在过去10年仍是持续上升的。

记者：巴塞尔资本协议III将推迟执行，这对全球经济是利好还是相反？

屈宏斌：巴塞尔III是一个控制风险的标准，但目前欧美银行体系惜贷的情况仍在持续。如果按照原计划实施巴III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一问题，对实体经济的恢复不利。过去三年，各国央行都在通过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但同时，商业银行因自身资产负债表问题以及去杠杆化而惜贷，加之实体经济需求疲弱，因而央行所注入的流动性实际并未有效流入实体经济。这就造成了流动性积聚于银行金融体系的“金融堰塞湖”的现状。实体经济需求的实质改善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目前全球经济仍在通缩区间，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如能保持流动性相对宽裕，在需求恢复方面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定的帮助。因此，我认为，巴III的推迟执行近期利好，有助于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但从长期看，金融体系还是需要更为严格的风险控制标准。

记者：印度人口的增长将在今后30年超过中国，有人说，人口和版图的大小是决定大国地位的根本，因而据此提出2013年起，全球视野中将出现一个新词汇，叫做“亚洲双雄”，意指印度将与中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中国，您怎么看？

屈宏斌：我对印度的乐观情绪相对谨慎。印度经济目前供给面的瓶颈制约已经很严重。我们的预测2012年印度的GDP增长5.3%，而对应的消费物价指数9.9%。印度需要新一

轮改革对供给面进行实质性的调整才可能实现其所提出的“双位数”增长目标。而与中国相比，尚没有出现变革制度的契机。

人口结构方面，尽管印度人口年龄相对中国更年轻。但中国的基础教育比印度要好得多。中国的劳动人口识字率94%，而印度仅为65%。印度几个未来发展的可能局限因素：语言不统一，边远地区的农民受教育年限很短，人力资本方面积累的欠缺对于未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可能构成障碍。

将印度和中国并列为“亚洲双雄”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从西方社会的角度来讲，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联系，愿意看到印度发展更快一些。但印度经济规模目前仅为中国经济规模的1/4，去年中国GDP总量8万亿美元，印度不到2万亿，这双雄之间的规模差距过大，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全球而言，还要看中国经济。

记者：观遍全球看中国。汇丰PMI指数显示，中国经济自2012年底开始触底回升，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果若此，2013年中国经济将面临何种新的挑战？

屈宏斌：全球背景下看中国，2012年中国超出世界预期的完成了软着陆，避免了硬着陆。自去年5月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其中货币政策层面包括两次准备金率下调及两次利率下调及公开市场操作逆回购，实际贷款利率有所回落，信贷增速小幅回升。年中以后，发改委集中批复了一批基建项目，财政支出也相应扩大。9月以后经济企稳回升，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等高频数据也显示经济触底回升态势的确立。2013年关键是复苏势头能否持续？会不会出现“W”形的双底复苏？最主要还是要看政策。

外需出口仍然偏弱的背景下，今年中国经济复苏能否持续主要还是看内需。而内需之中还看投资。

记者：中国经济继续面临外需萎缩、内需增长有限、投资成为最大变量的局面。您认为2013年，投资能够担起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强劲增长的大任吗？

屈宏斌：应该可以，但投资的几大构成部分中，工业制造业投资由于生产活动主要面对外需，因而外部需求下滑持续决定了在制造业领域难有以扩大产能为目标的投资提升。实际上，从月度数据走势来看，制造业投资的下滑已经比较明显，尽管2012年全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仍为23%，略高于整体投资20.7%的增速，但12月单月数据已经下滑至14%。房地产投资由于政策调控仍然持续，投资增速自去年年初30%左右下滑至7月的个位数增长，但在下半年企稳回暖。今年调控政策保持力度的背景下，房地产投资有望保持平稳而难有大的反弹。从政策层面，要稳投资并避免出现“W”形双底复苏还是要靠公共投资的加速。去年二三季度，为应对外需超预期下滑的冲击，政策层出台了一系列货币及财政刺激政策。

我们预期今年基建投资增速有望继续保持强劲。主要是基于这样几方面的理由：

一是，今年是十二五计划的第三年，从历史经验来看，第三年也是五年之中投资增速最高的年份。2011年投资增速24%，去年大约在20%左右，尽管有所放缓，但都处于相对高位，从去年年中以来国家发改委集中批复的投资项目构成来看，仍是以地铁、城际轨道交通、港口、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为主，总计投资额超过1.5万亿，平均期限5年。预计今年随着前期集中批复的投资项目进入建设高峰期，政府主导的基建项目投资增速可能继续保持强劲的势头。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基建投资的这一轮加速与2009年单月同比增速曾一度达到50%的峰值，年度平均超过40%的增速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上一轮4万亿刺激政策的后续影响仍在，而本轮经济放缓相对温和并未造成大面积失业增加的负面影响，都决定了今年基建投资的回升可能相对平和。

二是，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仍然热烈，项目需求旺盛，但今年基建投资的增长可能更多的取决于融资方面的支持力度。基建项目的主要融资渠道之中，传统的银行贷款之外，财政资金占比25%-30%。整体财政支出去年前11个月增长了18%，其中交通运输建设相关财政支出增长11%。简单估算，今年我国财政投资同比超过16%就足以支持之前已经批准的基建项目的部分资金来源。财政资金之外，2012年企业债的发行创下纪录，净增2.25万亿，其中70%-80%为地方政府平台债。受其拉动，债券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也从2011年末的10.7%升至2012年末的14.3%。鉴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今年将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的表述，企业债、平台债发行扩容这一趋势有望在今年持续。传统的银行贷款资金渠道在今年所能发挥的作用大小仍要看央行对于稳健货币政策的把握。

记者：全球目前都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您认为，中国会否引燃通货膨胀这个火药桶？

屈宏斌：有人担心货币宽松的通胀影响，我认为不必过虑。2013年的CPI可以控制在3%以内。首先，目前市场预期认为，今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为13%-14%，与去年基本持平，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可能继续下降。其次，本轮复苏相对于2009年而言幅度温和。经济增速从第三季度的周期低点7.4%反弹至四季度的7.9%，仍然是在潜在增长水平之下运行。因而货币宽松对通胀影响也相对较小。经济回暖对需求拉动方面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从财政的实力角度来看，财政收入增速尽管有所放缓，但仍连续超过GDP增速，这意味着积极财政政策空间仍在。而通过适度的政策宽松支持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稳定，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全球经济都是好事。

记者：中国经济在新的一年里，仍然充满了风险和挑战，您是否也有担心？

屈宏斌：当然有。首当其冲的是房地产，然后是中国出口市场的份额。两者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新一任总理李克强强调，城镇化是支持未来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是扩大内需的重

要抓手。但显然高房价是阻碍这一进程的因素，因而现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仍将继续。但为避免出现房地产市场暴跌对于经济基本面的负面冲击，决策层面也没有动力出台更严厉的调控政策措施。未来结合房产税试点的扩大，对于抑制部分地区房价上涨和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将有帮助。当然从需求方面来看，城镇化的继续推进决定了每年仍有超过千万的人口从农村转移至城市，而人口结构中适婚年龄人口占比保持平稳也支持中长期住房需求的增长。

外部环境疲弱的背景下中国出口的市场份额仍在增加。目前中国出口占全球11%，而劳动力数量占世界20%。与美国当年以占世界5%的劳动力数量，分得30%的市场份额相比较还是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记者：冯国经先生曾向WTO拉米主席提出，建议采用国际贸易增值链方法重新统计国际贸易，您同意吗？

屈宏斌：我完全同意。应该纠正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中国经济过去过于依赖出口，未来外需没有空间了，因而要转而更注重内需拉动。但实际上，中国出口统计数字高是与国际贸易统计的不完善密不可分的。中国所处的全球产业链终端的位置决定了在现行国际贸易统计中出口往往更容易高估。处于产业链中间阶段的各国家地区的附加价值重复统计到了中国出口中。目前WTO和OECD提出用产业链的方式统计附加价值。这一改变显然更为科学。我们的测算认为，中国在产业链中的附加价值应低于20%。

整体而言，我国出口产业仍有规模效益，效率和竞争力也仍然很高。通过30年改革开放政策引进的外资，利用外资过程中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对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因而考虑未来出口发展战略之时，我们首先要纠正认识上的误区，先“自己给自己松绑”，不要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人民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吗？

屈宏斌：人民币汇率已较接近均衡水平。不论是从购买力平价还是从国际收支贸易项下更加平衡的情况来看都是这样。所以汇率升值差不多到头了。未来在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方面更多强调汇率的双向波动，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不可谓不迅猛，但相对于我国的贸易发展和经济规模而言，仍然是滞后的，需要通过加快推进，为人民币国际化扫清制度上的障碍。过去两年这方面的进展很快。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可以互相促进的。我们认为，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有望在未来三五年内实现。

责任编辑：李文政

· 智库言论 ·

中国信息化发展的机遇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杨学山

信息化机遇不是新机遇，而是一个历史机遇。这一机遇源于新的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转变的推动力是信息技术，转变的主要标志是信息化。

2003年“非典”时期，马云和他的同伴不能外出，考虑发展电子商务，由此产生了淘宝。十年以后，淘宝年销售额达到了1万亿元，创造了1000万人的就业，大体上每个中国人一个月在淘宝网上购物三次。一天最大的零售额，2012年11月11日达到了190多亿元，因此改写了零售业的版图和竞争方式。

传统的零售竞争，比如沃尔玛的采购、物流、库存管理和销售等各项经营活动，如果没有一个全球的网络平台，沃尔玛一天都不能支撑。制造业，我们以航空业为例，从飞机的设计开始，到零部件制造、总装、测试、试用、运行管理维护，到营业状态的监督，一直到故障排除，都在统一的平台之下。在这样的平台支撑之下，波音公司成为巨型飞机制造公司，但它没有一个制造厂。

阿里巴巴正在策划10万亿的电子零售，在规划支撑10万亿物流经营服务，甚至会转向以电子商务为基础的生产。这种业态的竞争方式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而

这种变化的支撑是一个统一的信息平台，如果把这个信息平台转到其他的地方，比如农业，如果集某地分散的农户形成一个集中统一的市场，使得生产和销售之间建立市场关系，这样的平台大有希望。

再看现代化城市管理。如果说有洞悉一切的平台，我们的管理将会怎样？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每一台汽车都有一个唯一的电子标签，在北京的街道上就没有那么多挡号的车及把牌子摘去行驶的车，也没有摘去牌子闯红灯的车，高速收费站也可以实现没有栏杆的通行。我们从日常生活到看病都会有不同的模式。这是一场变革，背后是信息技术。

由于信息产业、信息技术、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安全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才取得巨大进步。宽带网络、移动互联、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的概念的背后都展示着技术发展的变化，这种变化给中国的技术发展、产业发展、应用发展都带来了新的机遇。

机遇总是与风险、挑战并存。中国的信息发展机遇同样面临着严峻的风险和挑战，那就是我们的技术还受制于人，我们的产业还是大而不强，我们的应用无论是用户本身还是IT企业支撑能力和发展能力还不够，我们会产生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我们会产生世界上最大的大数据，但我们的能力还不足以支撑。同时我们的信息安全还面临非常严峻复杂的挑战。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年会（2012-2013）”上的发言，有删节。

责任编辑：刘英奎

保障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五个思路切换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贺铿

经过34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最近15年，又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教训和问题也暴露了出来。这一时候是深入思考进一步改革的最好机遇期，而改革又是发展的最大红利。

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发展？我认为要切换发展思路：

第一，要切换用投资保GDP增长的发展思路。我始终认为投资是由需求来决定的，是由内需、外需的规模决定的，没有需求规模，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投资。政府可以考虑和决定的投资是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产能投资是投资当中最大的一块，是由内外需决定的。还有房地产投资，也应该由市场决定、由需求决定。现在一旦经济发展不顺利的时候，就用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这种思路必须改变，否则，我们的环境会受到更多的污染，高消耗换高GDP的模式，问题会越来越多，不可持续。

第二，要改革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政府公司化的模式。我把政府说成公司化，虽然有点尖锐，但事实就是这样。这些年来我走了不少省市，也参观了一些地方，有一个深刻的感受，我们的书记就是董事长，省长就是总经理。这种模式对于经济干预得那么细致、那么具体，这不是好事，是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形成的根本。

第三，要调整我们的财政货币政策。

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应当终止，我们的货币政策从国内来说，应该进行市场化改革；从国外来讲，为了维护自身外贸的利益，应该稳定汇率。我们的货币应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而不能单纯为赚钱而搞这种产品、那种产品。这样做不仅有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而且出现了我国企业融资成本越来越高的问题。所以，必须坚持货币政策为实体经济服务，财政应当保持收支基本平衡。

第四，既要抓内需，又要促外需。有人总觉得过去一段时间是外向型经济害了我们，我不这么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离开了外贸是不可能的。哪一个发达国家不是通过外贸发展起来的？为了争夺外贸市场，美国和英国差点发生战争。我们的外汇储备是多了一些，不改革外汇储备制度而说是外贸出口太多，这种观点不能接受。所以，内需、外需要两手抓。

第五，让城镇化健康发展。过去的城镇化存在许多问题，大城市化要转为小城市化。城镇化的根本是要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要让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不能让多数人离乡背井。现在城镇化炒得很热，要让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防止城镇化成为第二轮推动房地产泡沫化的阵地。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年会（2012-2013）”上的发言，有删节。

责任编辑：刘英奎

我国对外开放的四大机遇和四大举措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马秀红

一、我国对外开放的四大机遇

金融危机虽然经过了5年，但是世界经济还在艰难恢复中，外需的疲软正在成为一个常态，整体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的对外开放确实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同时仍然面临着非常多的机遇，仍处于对外开放的战略机遇期。

第一，世界经济在艰难复苏中将逐步恢复增长。根据IMF最新的预测，全球经济总量将从目前的70万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90万亿美元，2013年全球增长会实现3.6%，到2017年将实现4.6%的增长。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幅度将大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幅度，到2017年将实现6.2%的增长。世界经济的走势在不断提供着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并显现出新的特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中产阶级的壮大、世界能源供给与消费格局的变革，全球投资、生产、消费重心的深度调整，将从根本上改观全球化的模式、方向和发展进程。

第三，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正在形成。新一轮科技浪潮的形成使信息技术和传统产业融合，物质密集型的加工方式迅速向数据密集型加工方式转变。新兴产业的出现，商业模式、管理模式创新，破除了传统的发展路径和资源能源的束缚，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四，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兴起。尽管世界贸易组织多边的贸易体制发展遭遇了一定的挫折，但在一体化进程方面有一些新的发展。

最重要的一点，党的十八大规划了中国未

来10年改革开放发展的蓝图，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改革的红利进一步显现，都将为新形势下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创造良好的环境和空间。

二、抓住开放机遇的四大举措

第一，要研究制定对外开放顶层设计。未来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最重要的消费市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一开放优势，牢牢掌握主动权，以扩大开放换取全球对中国的持续开放，以此化解利益分歧，谋求更加公平合理和稳定的发展环境。

第二，把握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开放目标。目前特别需要深入研究外商投资准入的国民待遇、国有企业竞争中性、海外投资权益保护、深化涉外投融资体制改革等问题。在对外投资中要取消审批，要给投资者以充分的自主权。人民币的国际化，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和国内开放空间布局等重大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为进一步扩大开放作好准备。

第三，打造引领未来开放发展的国际化平台。要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发展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支持更多的民营和中小企业成为对外开放的新生的力量，要积极引导国内的大型展会和各类交易场所走向国际化、品牌化和信息化，成为影响全球重要商品价格走势、贸易投资流向的载体。

第四，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以提升竞争力和综合效益为核心，采取有效措施，加速形成以创新技术品牌、绿色低碳、优质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份额和地位，坚持进口与出口并重，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促进对外经贸平衡发展。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年会（2012-2013）”上的发言，有删节。 责任编辑：刘英奎

对金融业的作用及利率市场化的认识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 杨凯生

一、不应把实体经济和金融业对立起来

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关注实体经济的声浪多起来。原因是在此前，美国金融市场上衍生品的交易量过大，一些衍生产品层次过多，结构过于复杂，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越来越模糊，许多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众多投资者对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的内容和风险，大多是不甚了解。因此，这些国家提出金融要更多地回归实体经济，有一定的道理。

当然，我不赞成金融危机的出现完全归咎于所谓虚拟经济的构想。实际上一些售汇制度的不合理，一些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一些国家货币制度的不正确，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完善可能都是其中的原因。重要的是现阶段我国究竟如何看待金融业的本质以及实体经济和金融业的关系？否则这个关系处理不好，所谓抓住发展的机遇，所谓应对发展中的危机，恐怕都难以做到。金融活动本身就是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小平同志说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实际上这是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关系中的正确概念。

有的同志对十八大提出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的要求，理解得不全面或不透彻。难道金融业不是实体经济？金融业的运行不是宏观经济的组成部分？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金融业

这些年来和实体经济的运行一直是密不可分的，在连续30多年来高速增长中，实际上金融业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不断增长，2011年是116%，1979年仅占60.2%。

实际上，并不是说经济运行依赖信贷越多越健康，过分依赖信贷也是有风险的。金融与其他产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相互促进。百业兴则金融兴，金融稳则百业稳，金融和实体经济是血液、骨骼和肌肉的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是不是搞虚拟经济？是不是不能搞金融衍生产品？西方这些年出现了很多衍生产品，衍生产品不可能消失也不应该消失，运用得好可以对冲风险。实际上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衍生产品的交易活动并没有减少，关键是以衍生品为基础的再衍生品层次过多，结构很复杂，这是有问题的，这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我们现在不需要也不应该发展这样的衍生产品。

二、对利率市场化要有理性认识

利率市场化既是一个目标，更是一个过程，近几年来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在加快。2012年中央银行两次扩大了存款利率上浮的区间和贷款利率下浮的区间，这都是利率市场化重要的步骤。利率市场化是为了有效利用资源，而不是简单地扩大或收窄利差。利率市场化和银行存贷利差的高或低有联系，但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年会（2012-2013）”上的发言，有删节。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中国经济最后一次软着陆？

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 史蒂文·罗奇

中国又一次证明，不看好她的人是错误的。2012年最后一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提速至7.9%——比第三季度的7.4%高出0.5个百分点。经过连续10个季度的减速后，这次提速意义非凡，标志着中国经济在略短于4年的时间内第二次实现了软着陆。

中国有几个实力来源，让她能够在过去4年里承受严峻的外部冲击。大量储蓄（占GDP的53%）所构成的缓冲及外汇储备（3.3万亿美元）是其中最重要的。此外，中国还保持着财政及货币政策调整的巨大空间。同样，强大的城市化动力继续为中国的高投资经济提供强力支持，并让相对贫穷的农民工能够通过在城市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来增加消费。

然而，这也许是中国最后一次能够在增长不受影响的情况下避过外部冲击。温家宝总理早在2007年3月就指出：看似辉煌的中国经济已变得“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并最终不可持续”了。自那时起，中国的许多固有优势被频繁的外部冲击削弱了。中国经济确实已变得更不稳定，实际GDP增长于2009年大幅放缓，2012年也是如此。发展不平衡也变得更严重——投资占GDP的比重接近50%，而私人消费下跌至不到GDP的35%。

同样，中国也变得更加不协调或者说碎片化。这是因为其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而发展的可持续性正被环境退化和污染破坏，

这对中国的大气层和水供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简而言之，中国的增长模式被前所未有的地扩展，就像一块布料一样，它被拉伸的时间越长，要回到原来有弹性的状态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而且越有可能在下次出了什么差错时，再也恢复不到原有的状态。

从来没有任何时候像现在这样迫切需要大力进行再平衡和改革。实施加速经济过渡到更为以消费者为导向经济的措施，现在正是时候。要做的事很多，包括发展服务业、资助社会安全网、放宽过时的户口政策、改革国有企业等。

如果不能迅速地实施这些措施，在这个饱受危机冲击的世界，中国可能经不起下一次不可避免的冲击。若没有进行重新平衡，几个潜在临界点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严重危害中国经济实现另一次软着陆的能力：银行体系信贷质量的恶化；因工资上涨被削弱的出口竞争力；关键的环境、治理和社会问题（即污染、腐败和贫富差距的问题）；当然，还有例如与日本之间不断升级的问题可能带来的外交政策失误。

如果不进行再平衡和改革，中国自动软着陆的好日子也许就再也不会有了。对中国来说，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摘编自《世界报业辛迪加网》2013年2月6日。

责任编辑：刘英奎

人民币国际化应把握住伦敦机会

中国安邦集团研究总部

人民币国际化在海外市场上引发关注，被认为是“21世纪国际金融业最重要的机遇”，香港、新加坡、伦敦争当人民币离岸中心。从地缘因素看，香港近水楼台先得月，无疑将成为离岸人民币最重要的集散地。但若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应当承认，伦敦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真正关键的舞台。

伦敦对之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从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名看，伦敦是全球排名第一的金融中心；纽约第二，香港、新加坡分列三、四位。伦敦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也为全球最高。其中，伦敦市场发放的国际信贷约占全球的20%；伦敦证券交易所（LSE）交易的证券中，约有50%为外国证券；伦敦外汇市场是世界最大的外汇市场，交易量约占全球的1/3；伦敦金融城的劳合社则为全球最大保险业中心，2/3的业务来自海外。人民币若能登陆伦敦形成离岸的欧洲人民币市场，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里程碑。

在此前几个主要币种的国际化过程中，伦敦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比如美元，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以及美国成为重建后欧洲的最大出口市场，大量的美元存款流向欧洲，尤其是伦敦，形成“欧洲美元”。这为美元的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由于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欧洲美元”逐渐扩散到全世界，这才有了美元当前的“本位货币”地位。从这段金融史

看，美元国际化始于伦敦。

日元的国际化同样离不开伦敦市场的襄助。上世纪70年代，随着日元国际地位的提升，欧洲日元市场逐渐成型，其中以伦敦最为重要，占全部市场份额的60%左右。在80年代，日元国际化加速发展，欧洲日元市场反过来促进了日本国内的金融开放，促使日本政府在国内创设离岸金融市场，交易欧洲日元。

同时，英国金融监管层的监管技术，以及伦敦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在全球皆首屈一指；伦敦也是最早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地区——这令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中抢占了先发优势，更为舒适的金融环境有利于吸引资本流入。

当前，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走向欧洲的步伐加快，欧洲市场对于人民币的需求正在大幅增加，这令伦敦市场上的人民币交易具有了真实的需求。在数个公开场合，英国及伦敦金融城高层高调宣称，要建成主要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今年2月22日，英国央行表示，中国央行研究设立货币互换安排，凸显出中英两国高层对伦敦发展初期的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支持。

伦敦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对中国人民人民币及伦敦来说可谓相得益彰，双方都能从中获得不菲的收益。尤其对于中国，伦敦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舞台。只有把握住伦敦的市场机遇，人民币的国际化才可水到渠成，甚至反过来促进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成熟。迄今，人民币在伦敦的发展十分顺利，但也要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

摘编自《金融时报》中文网2013年2月25日。

责任编辑：刘英奎

ABSTRACTS

(1) Forming a Consensus about the Mode of Development

Zheng Xinli·004·

In order to stride into the rank of the high income countries, China must achieve the change of mode of economic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we must strive to form a consensus of reforms in five aspects: income distribution reform, taxation reform "from sale tax to VAT", reform of administration system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o speed up the setting up of unified development of both rural and urban areas, and to deepen the financial reform.

(2) Solving Two Major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hen Xiwen·011·

Urbanization in China will become very powerful dynamics for the economic growth, in which serious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two major problems: first, must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ship of grain and other maj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second, must solve the urbanization problem of farmers.

(3) Primary Distribution should be the Key Point in the Refor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laws of market, primary distribution is based on market adjustments. But due to various reasons, in China there has been no distribution based on the economic laws of market, therefore the injustice exists in primary distribution. That's why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should be the key issue in the reform of distribution.

(4) The Mid-Term Tendenc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cy Proposals

Wang Yiming·017·

From a mid-term point of view, there are still many favorable conditions, but dragged down by both demand and supply factors, Chinese economy is undergoing a downturn; so there has been a periodic change, and the steady growth of mid and long term will face new challenges. Our policy proposals are as follows: while emphasizing the management of supply, the focus of the economic work should be turn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rowth and the sufficiency; to strengthen market function; to stimulate equal competition, and to put in even greater efforts in cultivating new dynamics for growth.

(5) The Research of Financial Roots of Poverty in Rural China

Yan Kun and Liu Xinbo·025·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s from the latest Poverty Relief Conference in 2011, also taking into account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poverty, taking paper studies the origin of rural poverty, this essay digs ou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rural poverty. Meanwhile, with basic public service as a key subject of research,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basic rural public services on the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by building rural poverty equations. It is shown that rural poverty in China today results from the insufficiency of basic rural public services. Only through the

reform of public finance system, the financial redistribution will contribute to the reduction of rural poverty.

(6) Evaluation Results and Related Analysis of the Asian Competitiveness 2012

CCIEE Research Group·037·

In order to objectively and scientifically reflect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sian economies and enterprises, CCIEE has developed the Asian Economies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Index. According to the ranking results of the Asian Economies Competitiveness 2012, “East Asian Tigers” dominate the top four, namely Hong Kong, Singapore, Chinese Taiw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followed by Australia,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Bahrain, New Zealand and Japan. China scored 10th in a comprehensive ranking among 37 Asian economies, the same as in 2011.

(7) Services Globalization Trends and China's Policy decision

Yao Zhanqi and Xia Jiechang·049·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the globalization index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improving significantly, investment of China to foreign countries moves gradually to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foreign investment of non-traditional service industry grow fast. In the process of service globalization, due to the weak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and lack of experience and global strategy, China's enterprises face more challenges, so China's enterprises must adapt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servic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overall planning for the strategy of going out. The enterprise should exert comparative advantage, optimize the motivation of investment of China to foreign countries and cultivate talents to adapt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8) The Present State and developing Tendency of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 Outsourcing

Wang Xiaohong, Li Yu and Wang Hai·060·

Outsourcing in financial services is the largest field of global service outsourcing. This paper defines the meaning of outsourcing i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focuses 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ing trend of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 outsourcing market space, contractor and subcontractor's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Then points out the main existing problems, put forward the proposals and suggestions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 outsourcing.

(9) The Planning of Capital Economic Zone and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Xiao Jincheng and Liu Baokui·072·

National Twelfth Five-Year Plan proposes to construct the capital economic zone, and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and regularity of the capital economic zone from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lanning scope and problems faced are discussed and proposals for integration put forward.

(10) Coping with New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Improving Energy Strategy of China

Li Xiaoxi·082·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new situ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ergy supply, and

of both strong and weak points of our own energy strategy, the essay concludes “energy saving,green technique,structure,safety and reform”should constitute our energy strategy before 2030 .

(11) “The Three parallel Rivers” and its Protected Area:the Present,Problems and Proposals

Liu Xuemin and Song Min·092·

Due to these phenomena of lagg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much poverty, low degree of social undertakings, abundant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three-parallel-river area, the paper puts forward proposal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rea; promote the project of ecological immigrant, and acquire wealth by means of ecology; and rapidly develop the economy in bordering area; increase the degree of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to improve infrastructure;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increase the dominance of tourism industry to make it a famous brand in the world.

(12) Huawei: Opening-up Innovation Has Forged a World Class High-Tech Transnational Company

Wang Zixian·102·

After a long probe and practice,Huawei has formed an opening-up innovation practice and method which has fitted into the global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reached the level of the first class international transnational high -tech company. Huawei’s opening-up innovation has provided successful experiences for China’s enterprises to study, and also an inspiration for solving proper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opening up.

Editor:Li Wenzheng
